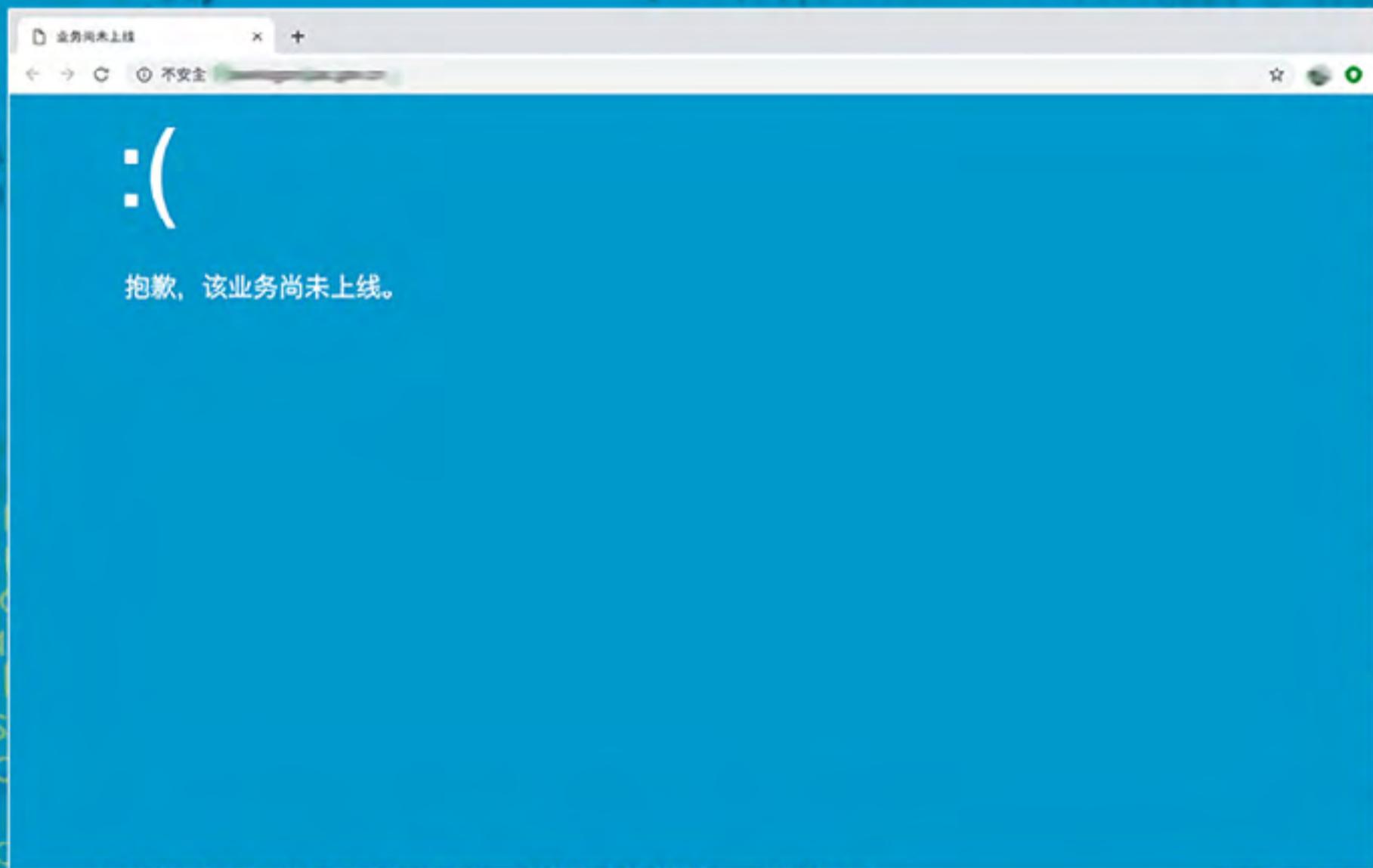


# 热风学术

月刊

春

2019年3月



```
@media screen and (max-width: 600px)
```

```
pyplot.figure()
```

```
for group in groups:
```

```
    pyplot.subplot(len(groups), 1, i)
```

```
    pyplot.plot(values[group])
```

```
    pyplot.title(dataset.columns[group], y=0.5, loc='right')
```

```
    i += 1
```

```
pyplot.show()
```



# 目录

● 点击文章标题  
自动跳转至内容

- 5 **编辑手记**
- 9 **内容提要**
- 16 **专题一 \_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数字时代的劳动转型**
- 17 **编者按**
- 23 **数字劳工与下一代互联网**  
文森特·莫斯科 著 徐偲骞, 张岩松 译
- 40 **知识劳工、身份认同与传播实践: 理解中国IT 程序员**  
孙萍 著 姚建华, 杨睿 校
- 66 **中国媒介产业中实习生的困境研究: 以 S 和 X 两家大型互联网公司为例**  
夏冰青
- 81 **专题二 \_ 《一丝偶然》: 中国崛起与性 / 别政治**
- 82 **编者按**
- 84 **由《一丝偶然》重新看“种族歧视”与“性别“问题**  
刘奕德 ( Petrus Liu )
- 89 **一个中国故事 —— 还是一个有着中式扭曲的阿根廷故事?**  
萨拉·哈尼施 ( Sarah Hanisch )
- 92 **《一丝偶然》之我见**  
罗丽莎 ( Lisa Rofel )
- 96 **陌生人之爱**  
郑诗灵 ( Sealing Cheng ), 马里奥·帕切内 ( Mario Pecheny )

- 100 **《中式外卖》：中国与拉美的底层故事**  
劳拉·韦斯碧 ( Laura Trajber Waisbich )
- 103 **谁是拯救者和被拯救者？**  
蔡一平
- 106 **纠葛而非团结：关于《一丝偶然》的一些想法**  
向在荣
- 109 **《一丝偶然》（又名《中餐外卖》）**  
玛丽亚·阿梅莉亚·比特利 ( Maria Amelia Viteri )

### 特稿 \_

- 111 **一个巴基斯坦的民族文化：争议中的政治经济**  
萨迪亚·托尔 郑圣勋 译

### 殊音 \_

- 152 **一个离开“网络文学”的网文爱好者的回应**  
陈静
- 160 **《流浪地球》的社会想象力：“先天特色”与“后天不足”**  
罗小茗

### 现场 \_

- 167 **一场真实的虚拟对谈（2018 国际文化研究双年会访谈录之一）**  
郝玉满，许超

## **n 地域 \_**

- 182      **危机感与互助：一个美国博士生在中国的访学感想**  
Jennifer Macasek
- 187      **大学 / 城：考文垂随记**  
毕文灏

## **书讯书评 \_**

- 197      **反戈一击：一个来自“亚际”的故事**  
211      **《反戈一击：亚际文化研究读本》目录**

- 213      **征稿启事**  
文化研究 ROUTER [又穷又厌世：当代青年的情感政治与贫穷化问题](#) 论坛

- 215      **《热风学术（网刊）》稿约**

- 216      **封面故事 & 网刊信息、下载方式**

## 编辑 手记

又是春天。

让我们继续谈谈文化研究的野气。

不知有多少读者会留意本刊每期的封面和与之搭配的小故事，并喜欢它们。这是去年春季刊开始的一个小栏目。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做法是被“逼”出来的。因为在设计封面时，绝大多数照片和图像都被标记了版权，无法免费使用。而那些可以免费流通的图像资料，要么过于“清新”，要么十分“和谐”，深陷在主流文化符号的矩阵之中，很难呈现文化研究的调性。于是，如何在极为有限的图像条件下，用视觉和文字彼此搭配的方式，呈现出文化研究对于相关议题的看法，也就成为每一期我们在设计封面、书写封面故事时的自觉追求。

今年封面设计的做法，则更进一步。除了配合每期专题之外，还希望可以以一年四期“图像+小故事”的方式，记录在我们这个时代思想和学术背后起着支配作用的隐形的“基础设施”。比如，为了实现文化的流通和创造，在背后起着作用的程序编写；为了实现文化的不流通而出现的“404”或“该业务未上线”；为了方便管理而必须填写的“一视同仁”的表格；为了符合财务要求而出现的各种预算名目与类型；为了成为“合格”的学者，必须斤斤计较的绩效计算公式……。所有这些，既并不自动产生思想，也不会导致判断，却构成了今天展开更积极的思

考和更坚实的判断的现实条件。它们介于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看似不过是接续和传递的“帮手”/“帮凶”，实则越来越强势地规定着我们的身心习惯和思路走向，构成了今天“考现”和日后“考古”的必不可少的宝贵材料。

本期封面呈现的便是这样一个基础设施的“前/后台”场景。其中，作为背景的程序语言，翻译过来的意思是“下载数据 导入数据 取出数据 值 分类”。这套语言和随之呈现出来的“前/后台”场景，既和本期的主打专题“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数字时代的劳动转型”密切相关，也和“殊音”栏目中陈静老师对冬季刊“看不见的网络文学”的回应文章彼此呼应。那就是，当各行各业都在面临着这样一套程序语言的挑战之时，它们带来的数据和分类法，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一系列变化，将带来哪些关于劳动、文学、社会乃至文化的主动或被动的看法？所有这些，理应成为文化研究在思考文化生产、流通和消费时，主动囊括和积极参与的议题。在此，特别感谢姚建华老师让我们分享这个数字时代劳动转型的专辑。也希望这一专辑，可以搅动起更多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之间的互动，让双方都变得更加开阔。感谢陈静老师的回应文章。这篇文章的意义，不仅在于通过提出“电子文学”来反思今天的“网络文学”现状，更在于它让我们的主张——“作为对话的文化研究”，在本刊的呈现变得更加具体可见。

专题二“《一丝偶然》：中国崛起与性/别政治”是对于“中国走出去之后”这个大故事的后续讨论。正如专题的“编者按”中所言，在这个出走的故事中，人文学科的观点一直很是匮乏。这种匮乏，在春节档《流浪地球》的热潮中，同样可以鲜明地感受到。只是，在这样一个“中国走出去”的大故事中，除了自己怎么说、说得好不好之外，别人正在怎么想和怎么说，恐怕是任何想让这个故事真正区别于情感狂欢的人们，必须认真倾听和仔细回味的。

“特稿”一栏，本期刊登的是一篇无法在《反戈一击：亚际文化研究读本》中付印的文章，也是圣勋最迟出版的译文。希望以这个方式，在三周年之际，对他略表纪念。至今记得，2014年的冬夜，我们两个人在便利店外喝着冰啤酒。他突然说，我们是活下来的那一批啊。这才发现，一路走来，很多因为“亚际”而相识的朋友，在此过程中，渐行渐远，慢慢失散。这倒不是说，一定要从事学术工作、教书育人，继续聚拢在“亚际”的大旗之下，才算是所谓的存活。显然，对文化研究来说，存在的方式，要多样和宽泛得多。不过，对我们来说，既然受惠于亚际的文化研究，又在近乎荒诞的学术制度中生存下来，那么，如何继续想象和进一步承担的责任，便不可推卸。从圣勋过世到现在，三年过去了。回头看时，世界发生了大变。我们这些继续生存下来的人，恐怕也到了把这些焦虑感和责任感，更具体有效地转化为现实的时刻了吧。

于是，今年的“n地域”，将在访学交流积累的经验之外，试图展开另一方向，即征集在学术体制之外展开文化研究，从而“学以致用”的各色经验。如果说，文化研究不应该局限在大学课堂和学术论文的话，那么，经历了文化研究的学习，投入到社会各行各业之中的那些文化研究的“种子”，正在如何发芽、生长和结果？它们如何展开和不同行业的对话和角力？如果说，文化研究不是一味的理论和情怀，而是希望和现实短兵相接的话，那么，散播在各行各业里的这些实战经验，如何被呈现、讨论和思考，并成为文化研究在学院建制之后继续前行的宝贵经验和鲜活刺激？当学院体制里的空间日益缩小，变得越来越和其他行业一样的时候，这样的积累，既是对于之前文化研究的正视和修正，也是后续进步必须澄清的现实条件。在此，欢迎有这样经历的或者认识有这样经历的朋友的读者们，相互推荐，积极投稿。让我们彼此互通有无，共同开启这一项必不可少的积累工作。

最后需要特别推荐的，是本期的“现场”栏目。去年大会的有一项工作，是访谈与会的十数学者，抛出一些我们觉得重要的文化议题，请他们提供自己的看法。本期现场，便是这一访谈的成果之一。在此，特别感谢参与访谈工作中的所有志愿者，也希望这些针砭时弊的回答，可以帮助今天的中国青年们找到主体的位置，对当前各色急需把握的文化议题，展开因卡位准确而具有别样的穿透力的思考。由此，也请各位青年朋友特别注意本期转发的《文化研究》（台湾）的征稿启事。倘若你对这个又穷又丧的时代有话说，那么就不应该错过它。

所有这些，都是春天里的文化研究。

它带来的野气和芬芳，是我们自己的味道。

## 专题 一



9 目前还不能确定下一代互联网对工作和工作质量的确切影响。大规模失业是一种可能,而那些有工作岗位的人也必须学会如何与机器人和其他形式的智能机器一起工作。马克思所说的“活劳动”正迅速被机器的“死劳动”所取代。因此,将为技术负面后果付出代价的政府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应对一场人们一致认为的或另一种将很快席卷全世界工人的危机。

由于新自由主义剥夺了工会一度拥有的大部分权力,如今工人们几乎没有维权的途径,而且在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中几乎没有发言权。一些立法尝试为数百万缺乏病假的零工经济劳动者提供基本的福利待遇,保护他们免受突如其来的伤残带来的经济影响,或者为他们的退休做最起码的经济准备。但目前,这些努力都没有在美国取得成功。

——文森特·莫斯科：《数字劳工与下一代互联网》



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语境下，码农的意涵与上述“创新阶层”的话语正好相反。受访者E强调了工作的“重复性”和“低级性”，自诩为“农民工”的事实更让人感受到他们令人沮丧的处境。这与我们传统想象的“知识劳工”的形象差距甚远。

10

——孙萍：《知识劳工、身份认同与传播实践：理解中国IT程序员》

大学作为社会的缩影，其中不乏来自经济水平和教育资源落后的农村地区的学生，而付出与收获极为不平等的实习生制度让这些原本已挣扎在基本生存线边缘的学生丧失了基本的拒绝机会，更遑论思考实习制度是否合理。而作为学者，当我们批判性地用数字劳工这一理论资源解读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时，是否忽视了我们身边这群近在咫尺的、更值得用数字劳工框架去批判性解读的群体呢？这一问题也值得当下关注数字劳工议题的研究者时时扪心自问。

——夏冰清：《中国媒介产业中实习生的困境研究：以S和X两家大型互联网公司为例》

## 专题 二



11

自“中国走出去”成为国家主导政策以来，中国已成为最大的南南合作供应方，也是非洲、拉美、东南亚和中东欧的主要投资者。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国在全球南方的活动一直是各种批判性评论的主题，而且常常被形容成中国的新殖民主义。然而在这些讨论中，人文学科的观点一直很缺乏，更重要的是学者们对性与性别在“中国在南方”这个议题中扮演的角色一直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中国在南方的发展到底是不是一种变相的新殖民还有其它充满争议性的议题，就必须借助人文学科的观点来重新看待性与性别的问题。中国今天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是文化上的。在这个过程中，电影、文学，跟其它文化产品不断在制造和反映出的叙事提供了非常宝贵，非常有启发性的一些线索。

——《一丝偶然》：中国崛起与性/别政治



此篇论文的研究计划背后有以下几个动机：学术、个人，与政治目的：

——拯救巴基斯坦的学术界与民族 / 文化主义者免于受限于美国例外论的框架，同时展开较为适合的后殖民与民族国家形成的讨论。

——认真地去理解（民族国家的）文化领域里的挣扎，并强调其在巴基斯坦的特定性，尤其是关注“孟加拉问题”。

——挖掘马克思主义左派思想在斗争中的重要角色。

——萨迪亚·托尔：《一个巴基斯坦的民族文化：争议中的政治经济》

## 特稿

## 殊音



13 在网络文学以及为之摇旗呐喊的浪潮背后，却依然存在着一个悖论：人们越来越多的对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新”文学的身份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基于两点，一是网络文学大批量生产、粗制滥造，以及人们在日积月累的阅读中不断的体验到了一种落差，从文学角度来看，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并没有根本上的不同。二是随着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合流和与印刷文学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网络文学似乎越来越不像网络文学。这是我在2009年对网络文学的所做出的观察。很有意思的是，即使在十年后的今天，我依然对网络文学有着同样的判断。尽管研究界对于网络文学如何进行界定和提升，网络文学本身却依然没有走出以印刷和线性书写为基础的传统文学的禁锢。而网络文学创作自身，依然踟躇于对文学的另类形式的延展和利益模式的探索。

——陈静：《一个离开“网络文学”的网文爱好者的回应》

## 现场

吉见俊哉：对于中国来说，可能也是一样，在面对美国的问题时，批判可能是激烈彻底的，但当面对国内的问题时，却变得保守了。当然，在地的批判确实是有风险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找到间接的方式去完成它。总而言之，日本的文化研究要批判“日本”，中国的文化研究要批判“中国”。

米科·莱赫托宁：我很担心批判性学术工作的未来，以及它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影 响。从学术研究的层面上，我担心的是，现在的学者越来越多地甘愿为世界生产脚注，满足于描述表面现实——我认为其他地区应该也有如我们一样的困境，我指的是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和材料，但是没有足够的批判性和综合性的工作。

莱纳·温特：在奥地利和德国，大学也渐渐变成了职业教育的场所，这当然有悖于威廉·冯·洪堡立下的德国教育传统。随着资本市场对大学的入侵，学术自由已无从谈起。面对新自由主义的种种伎俩，我们应奋起自卫，像梅尔维尔笔下的巴特贝一样，无畏地说出“我不愿意”。

白池云：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则要努力不断地把更好的知识变成一般常识，才有可能推动社会的变化。以前的运动总是借助知识精英的哲学、思想，但事实上只有把“哲学”变成内化于大众之中的普遍常识，让更多普通人参与进来，“未来”才有可能。

——《一场真实的虚拟对谈（2018国际文化研究双年会访谈录之一）》

## n 地域



15

在我寄宿的中国家庭，有一次我听到大学毕业的姐姐批评初中的弟弟不努力学习：“你怎么没有危机感？”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要有危机感。几个月以后，我慢慢了解到，危机感其实已经席卷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青年的工作与婚姻，国际关系，学术世界，甚至到小孩的日常生活，而且我发现自己也有危机感，尽管我本来没有用这个词来形容它。

——Jennifer Macase: 《危机感与互助：一个美国博士生在中国的访学感想》

专题一

# 传播政治经济学 与数字时代的劳动转型

```
<meta charset="utf-8">
<meta http-equiv="X-UA-Compatible" content="IE=edge">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 initial-scale=1">
<title>业务尚未上线</title>
<style type="text/css">
  body
  {
    background-color: #0099CC;
    color: #FFFFFF;
    font-family: Microsoft Yahei, "Helvetica Neue", Helvetica, Arial, sans-serif;
    margin-left: 100px;
  }
  .face
  {
    font-size: 100px;
  }
  p
  {
    font-size: 24px;
    padding: 8px;
    line-height: 40px;
  }
  .tips
  {
    font-size: 16px;
  }
  @media screen and (max-width: 600px)
  {
    body
  {

```

## 编者按<sup>1</sup>

姚建华\*

文森特·莫斯科 (Vincent·Mosco) 在《传播的劳动》(The Laboring of Communication) 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说道：“除了极个别的文献以外，传播劳动是传播研究中的一个盲区。”(Mosco,2006,p.493) 然而，随着企业兼并和信息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技术和制度革新，全球范围内 IT 产业的迅速崛起，以及传播产业中雇佣劳动力数量的不断上升，传播学者愈加关注数字经济背后的劳动议题，特别是劳动和劳工组织的变迁，并尝试将它们置于宏观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观照，后者对媒体和传播领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此组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姚建华博士发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孙萍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夏冰青博士，以及加拿大女王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文森特·莫斯科合作完成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数字时代劳动转型”专题研究，旨在运用政治经济分析这一工具，聚焦数字时代的劳动转型议题以及在上述转型过程中，劳动者所面临的诸多困境。此组专题研究立足于厘清这些困境与数字时代劳动者所处的

.....  
\* 姚建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与研究基地研究员、加拿大女王大学社会学系博士。

1 编辑注：此专题原载于全球传媒学刊第5卷第4期，2018年12月。在此特别致谢姚建华老师及其团队的无私分享。

权力关系网络和制度背景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将数字时代劳动转型的议题与中国加速进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进程勾连起来，从而更为准确地理解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数量庞大的劳工群体在全球化、信息化和数字化浪潮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发挥的关键作用。该专题的研究成果力求丰富和拓展当前学术界在数字时代劳动转型议题中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及核心议题，尤其是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希冀能在一定程度上拓宽对相关问题感兴趣的研究者、从业者与公共政策制定者关于数字时代劳动者的一般认知，并对数字劳动的意涵进行更为多元化的解读和阐释。

### (一)

丹尼尔·贝尔 (Bell,1999) 在 20 世纪末曾颇具洞见性地指出，随着知识技术型社会的崛起，尤其是当社会开始依赖于理论信息 (theoretical information) 的形成与传播的时候，一个新的领导阶层，即有良好教育背景的科技工人所形成的知识阶层正日益凸显其重要性，不断成为全球新的政治与经济体系中的核心角色——他们在总工作岗位中所占的比重不仅在发达国家中稳步上升，在相对贫困的国家更是迅猛增长，资本主义主要的积累空间因此也从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工厂车间”转变为以大都市写字楼为主的“社会工厂” (Mosco&McKercher,2008)。

然而，由于技术融合 (technological convergence) 和企业兼并 (corporate convergence) 共同导致了劳工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下降，包括知识劳工在内的劳动者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 (Winseck,1998;Ross,2009)。即使在传统的专业领域，终身制的雇佣模式也已大为萎缩，而弹性雇佣关系 (contingent employment) 变得更为普遍。因此，无论是“低端行业”中的产业工人还是高薪岗位的知识劳工都面临着巨大压力，他们都不得不为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做准备。知识劳工普遍面临的压力来自长时间的工作、不断提前的最后期限、由劳动分工

导致的自主性降低等，同时，他们还深陷对自身未来强烈的不确定性、临时的劳动合同，甚至无法从任何保障性的社会保险中得到援助的困境(Yao,2014)。

在中国小型互联网公司就业的IT程序员作为全球化数字劳工体系中末端的一环是上述知识劳工的重要组成部分。孙萍博士的《知识劳工、身份认同与传播实践：理解中国IT程序员》一文，正是基于知识劳工的理论框架，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角对IT程序员的身份认同与传播实践进行系统性探究的理论成果。中国IT程序员如何从知识劳工的角度建构自我的身份认同？他们自称为“码农”或“屌丝”的社会文化意涵是什么？这种自我认同与知识劳工的相关性是什么？他们的劳动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拓展我们对“知识劳工”这一框架体系的认识？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探讨，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以中国IT程序员为代表的数字时代劳动者被裹挟进高度不稳定且等级森严的分工体制的现状；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深刻地反思资本对于劳动者的控制从工作领域已延伸到休闲领域，使两者之间的边界变得日益模糊，且不断延展到主体性的建构方面——中国IT程序员戏谑地自嘲为“码农”或“屌丝”的行为是他们表达对自身日渐滑落的社会地位不满的一种方式。

## (二)

数字时代“工作”与“休闲”边界的模糊化是数字经济背景下劳动转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面向。具体来说，工作场所之外的家庭时间早已被“劳动”侵蚀，其一，雇主通过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ICTs)将工作任务延伸至劳动者的非工作时间；其二，劳动者的物质消费和观看行为被不断整合到资本积累和增殖的过程之中。夏冰青博士的《中国媒介产业中实习生的困境研究：以S

和 X 两家大型互联网公司为例》一文敏锐地发现，在数字时代，学生和工人之间的界限也存在日渐模糊的趋势。她以中国互联网内容生产行业中的实习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对 S 和 X 两家大型互联网公司进行案例分析，揭示出中国互联网行业实习生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困境，如低薪酬、低保障和高压力等，并在此基础上，从数字劳工的理论框架出发，对中国媒介产业中的实习生制度进行了政治经济批判。

夏冰青博士这篇论文的另一个重大意义在于她洞察到在中国互联网行业中，实习生和全职员工之间的区隔。通过运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她发现虽然实习生被要求像全职员工一样连续工作，但是他们因在工作灵活性、同工同酬方面遭受诸多不公平的待遇而成为“弱势群体”。与作为控制生产过程的全职员工不同，实习生只是“机械的”执行者，为前者的失误负责，且对他们的“生杀大权”也掌握在前者手中。中国互联网内容生产行业中的雇佣关系所体现出来的分化现象，尤其是当这种差异性和不公平出现在“曾经在相同工作环境中被雇的劳动者”之间的时候 (Fleckeretal.,2009,p.32), 劳动者平等的就业权和劳动权便无从谈起，更为重要的是，劳动者内部不断涌现出的新矛盾和新摩擦，使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变得异常紧张，这会极大地阻碍劳工团结的形成。

### (三)

毋庸置疑，ICTs 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积累方式，由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组成的下一代互联网重新配置了各种生产要素与资源，在扩张性市场逻辑的影响下，带动政治经济向数字资本主义 (digital capitalism) 转型 (Schiller,2006)。在此背景下，莫斯可在《数字劳工与下一代互联网》一文中对下一代互联网所蕴含的劳动的含义进行了深刻反思。

在莫斯科看来，与下一代互联网紧密相关的劳动者包括：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挖掘钶钽铁矿的工人、菲律宾的商业内容管理员，以及数据流产业中的零工经济劳动者等。他们无一例外地受制于高科技生产过程中的“铁三角”关系，即越来越高的产品价值、不断加快的生产速度和更低的生产成本。在上述这种关系中，劳动被加速商品化，同时被彻底降格 (degraded)。此外，莫斯科更是颇具前瞻性地警示道，随着自动化技术的日臻成熟，工作的消亡和人力的淘汰已不再是“天方夜谭”——目前美国有近一半的劳动力受新技术的直接威胁而处于失业的高风险之中，而且这些劳动力大部分是从事教育、医疗、法律、会计、金融、销售和媒体工作的专业人士 (Frey&Osborne,2013)。

面对数字时代的劳动转型，我们应该何去何从？越来越多的个人和组织开始呼吁通过立法的途径保障数字时代劳动者的基本福利和待遇，如保护零工经济劳动者免受突如其来的伤残带来的影响，或者为他们的退休做最起码的经济准备。他们同时强调工会（或行业协会）在劳工的离职津贴和持续的健康福利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作为一项极具建设性的倡议，“全民基本收入 (universal basic income)” 这个全新的概念呈现在公众面前，用来确保数字时代每一位劳动者和因各种原因（如伤残、失业等）暂时或终身无法参加劳动的社会成员的基本收入，对许多无法找到一份维持生计工作的个体而言，这既是一项公民权利，又是弥合社会不平等的一剂良方。令人感到欣喜的是，“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已经得到了全球科技界领袖人物的广泛支持，他们在芬兰、加拿大、荷兰和意大利等国开始了一系列国家和地方层面的试验，这对于从根本上帮助数字时代劳动者消除因劳动关系、劳动过程和劳动保障方面的变化而带来的无措感，以及克服由 ICTs 和数字技术发展导致的对工作消亡和人力淘汰的恐惧感极具价值和意义。

最后，特别感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徐偲骞博士和张岩松博士对莫斯科《数字劳工与下一代互联网》一文的精准翻译，感谢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吴鼎铭博士为此译文专门撰写了导读，感谢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方惠博士和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杨睿硕士对本专题论文的仔细审读，希望大家的共同努力能让更多的研究者关注传播政治经济学，并投身于数字时代劳动转型议题的研究之中。

## 参考文献

- Bell, D. (1999).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 Flecker, J., Holtgrewe, U., Schönauer, A., & Gavroglou, S. (2009). *Value chain restructuring and company strategies to reach flexibility*. Leuven: HIVA.
- Frey, C. B. & Osborne, M. (September, 2013). *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How Susceptible are jobs to computerisation?* Oxford University. Retrieved from <http://www.oxfordmartin.ox.ac.uk/publications/view/1314>
- Mosco, V. (2006). The laboring of communica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1, 494-497.
- Mosco, V. & McKercher, C. (2008). *The laboring of communication: Will Knowledge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 Ross, A. (2009). *Nice work if you can get it: Life and labor in precarioustim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Schiler, D. (2006).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Winseck, D. (1998). *Reconvergence: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elecommunications in Canada*. Creskill, NJ: Hampton Press.
- Yao, J. H. (2014). *Knowledge work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 数字劳工与下一代互联网

文森特·莫斯科 (Vincent Mosco) \*

徐偲骞 \*\*, 张岩松 \*\*\* 译

摘要：本文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批判性地分析了下一代互联网的关键要素：云计算、大数据分析和物联网。文章认为，下一代互联网中的从业者并不都从事光鲜亮丽的劳动，还包括非洲开采稀有金属的工人、在中国工厂生产 iPhone 的工人，以及网站商业内容管理员和零工经济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条件恶劣、收入低廉、缺乏保障，甚至被引导自我剥削。本文还讨论了自动化对工作的影响，包括零售业的萧条及大规模失业，创造性和信息化劳动岗位也朝不保夕，随着下一代互联网的发展，自动化引发的失业预测可能最终实现。最后，文章提供了可能的应对方案，包括重新工会化和各国正在实验的“全民基本收入”政策。

关键词：下一代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物联网；劳动

## 导读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实现信息传播功能之时，更激发了人们对于民主、进步与自由的想象。这种想象产生了强大的“询唤”作用，使当代互联网研究常常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互联网技术与生俱来的政治经济属性。然而，文森特·莫斯科沿袭了其一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人文关怀，在本文的开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下一代互联网可能比它以前的几代家族成员对世界造成更大的破坏。”他从“劳动”的理论视角揭示出信息技术的政治经济逻辑，认为信息技术的推进与转型往往首先是为了迎合数字资本渗透与盈利的需求。也就是说，云计算、大数据分析、

\* 文森特·莫斯科 (Vincent Mosco)，加拿大女王大学荣休教授、国际著名传播政治经济学者。

\*\* 徐偲骞：复旦大学-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生。

\*\*\* 张岩松：复旦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联合培养双学位博士生。

物联网等技术首先服务于互联网企业与政治权力的需求，如脸书利用用户的数据进行精准营销、美国国家安全局与亚马逊合作，进行情报收集等。对技术进行审慎的思考，某种程度上也迎合了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的技术观：技术作为一种历史和社会的设计，其目的和利益绝非是从技术之外强制附加其上的，而是早已嵌入技术结构本身。

传统产业技术化所带来的社会转型体现在劳动形式与资本剥削的变化上，进而加速了劳动力大规模的转型过程。这种转型表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跨地域的交互性，在差异化与多样化的社会中吸纳大众的集体智力与剩余生产力，从而实现了产品生产与内容管理的众包化，于是一些新兴的劳动形式开始日趋规模化，比如净化社交媒体网站的内容管理员、零工经济劳动者等。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们所熟知的“水军”、网络主播、滴滴司机等，都是基于互联网交互技术形态应运而生的产物。这种分享经济虽能盘活闲散资源，赋予网民新的工作机会，但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数字劳工往往处于行业制度和社会保障的真空当中，无法维护自身的劳动权益。第二，重复性劳动力被精准的、不休不眠的机器所取代，即“活劳动”被“死劳动”所取代的趋势日益明显。随着智能机器越来越多地成为人类雇员的工作伙伴，人们将不得不学习独特的互动技能，以维持与机器的一种合理且和谐的关系。换句话说，人们被嵌入到机器体系当中，成为机器顺利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用大量的事实与数据，描绘并解析了技术转型下劳动者所面临的困境，既有微观的经验观察，又有宏观的政策分析；既有批判与解构，又有建言与建构，是互联网研究领域的必读文献。

——吴鼎铭（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 一、技术

正如 30 多年来我们对于互联网的了解，它正在发生变化，下一代互联网 (the next Internet) 可能比它以前的几代家族成员对世界造成更大的破坏。它也还远远没有完全成型，所以仍带有原来的一些特点。尽管如此，不可否认它正在迅速增长，而且已然对民主的、去中心化的和多元化的数字世界愿景构成了挑战。下一代互联网汇集了三个互联的系统：云计算 (cloud computing)、大数据分析 (big data analytics) 和物联网 (the Internet of things)。它允诺了庞大数字工厂中的数据存储服务，从大量信息流中处理和构建算法，这些信息流是通过存储在每个潜在消费者、工业与办公设备中以及生物体内的网络传感器进行采集的。因此，它蕴含着重大的社会挑战，包括重新定义工作场所。

互联网的发展致力于让一个去中心化、分布式的服务器世界相互交流，在这个过程中，用户通过简单的通用软件标准被连接起来。随着云计算的发展，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其最佳的象征便是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巨大的数据中心。云是一种用于存储、处理和分发数据、应用程序和软件的系统，使用远程计算机按需提供有偿的 IT 服务。熟悉的例子包括谷歌的 Gmail、苹果的 iCloud、微软的 Office365 以及全球最大的云计算公司亚马逊的网络服务 (Amazon Web Services)。云计算使企业、政府机构和个人能够将数据从本地的 IT 部门和个人计算机转移到全球范围内的大型数据中心。存储空间中的内容也为一些企业开创了快速增长的业务，这些企业依靠存储费用来提供在线服务，通过将消费者数据售卖给对推广其服务和产品感兴趣的公司来获利。像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 和中央情报局 (CIA) 这样的政府监控机构也与云计算公司，尤其是亚马逊密切合作，以满足它们的安全和情报需求。为原有互联网提供基础的各种服务器集合已经发展成为集中的、覆盖全球的数据中心系统，每个系统都包含成千上万

个连接在一起的服务器，它们通过电信系统与世界相连。

大数据分析是下一代互联网的第三根支柱。大量产生的各种花哨的新头衔激发了人们的热情，如数据科学专业人士，但是在大数据方法中，社会科学家却鲜有新的发现。大数据分析通常涉及规模庞大且几乎都是定量的数据集，以及检视使数据一致或者相关的具体方式，最终得出有关当前行为和态度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做出预测。大数据的目的是生成算法或一组规则，以规定在特定条件下得出结论或采取行动。

例如，脸书获取了其 20 亿左右用户所产生的数据，将与名人、公司和政治家等各类事件相关的“点赞”与人们对社会、产品的观点联系起来。这使得该公司能够开发用户的个人资料并售卖给营销人员，后者将定制广告发送到目标受众的脸书页面上，在多年前的前社交媒体时代，奥斯卡·甘迪 (Gandy, 1993) 称此为“全景式的分类” (panoptic sort)。谷歌对搜索主题和 Gmail 的内容做了同样的工作，而亚马逊则根据其网站上的搜索和购买记录创建了用户的个人资料。考虑到定量相关性分析的局限性，特别是缺乏历史背景、理论和主观的视角（定性数据被忽视或转化为数字），这样的分析并不总是准确的。在诸如季节性流感预报和经济发展建模等项目上，大数据失灵的情况正在增多，而同样增多的还有利用数据牟利的机会 (Mosco, 2014)。只要看看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便知，大数据分析不仅未能预测结果，反而可能影响了结果。因为它产生了有缺陷的算法，导致希拉里阵营采取了一种过于谨慎的方式，因为数据显示她是一位没有瑕疵的领导者 and 可能的赢家，对甘迪来说这是一个绝好的例子，他会称为“全景式的分类错误” (panoptic missort)。尽管如此，对于简单的问题（如获得所有可能的人口群体好恶，或者基于朋友圈和粉丝网络得出关于用户的结论），在构成云的数字工厂里有大量数据可供分析，这成为企业和政府投资数据中心和大数据分析的主要动机。我们有理由担心，在研究中一味依赖大数据，正在为所谓的“数字实证主义” (digital positivism) 铺平道路，这是一种忽视

历史、理论与主体性的方法论本质主义。

物联网的兴起极大地加速了云和大数据的发展。从监测血压的手表到会订购牛奶的冰箱，从机器人“操控”的流水线到运输武器的无人机，物联网将对个人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物联网指的是将传感器和处理设备安装到日常用品（如手表）、生产工具（如机械臂）和武器（如武装无人机）系统中，并将它们连接到收集和使用其性能数据的网络中。冰箱里的传感器将储藏物组成一个网络，它可以报告里面的东西以及冰箱是如何被使用的。物联网之所以成为可能，得益于体积上不断缩小的扫描设备，这使它们可以游刃有余地监控活动、分析使用情况，并通过电子网络发送结果（Greengard,2015）。私人智库麦肯锡（McKinsey）在2015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到2025年，美国物联网经济效益将在3.9万亿~11.1万亿美元，这个规模超过了世界经济总量的10%（Manyika et al.,2015）。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制造业，特别是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在机器生产和运营监督条件方面引领潮流，使得管理更为紧密、效率更高的工厂和全球供应链成为可能。但麦肯锡宣称，随着浑身嵌满传感器而变得“聪明”的自动化车辆开上街头和高速公路，传感器还将延伸到办公室、零售业务、城市管理和整个运输系统中。升级的监控也将延伸到家庭，允诺更好地控制供暖和制冷系统，订购食品和日用品；此外，身体也不例外，传感器将持续监测人体的健康状况、血压、心率以及重要器官的日常表现。

## 二、工作

下一代互联网蕴含着怎样的劳动含义呢？当把思考转向人们在科技行业就业时，尤其是顶级公司，我们的脑中总是充满着幻象——这些公司有着华丽的工作场所，有大量游戏、美食、自由以及休闲的氛围。在《财富》（Fortune）杂志评出的美国前100名的公司中，谷歌已经成为这个梦想的典

范。这家公司以其令人向往的额外福利而闻名，比如免费烹饪好的食物、洗衣和个人美容服务。工程师们设计自己的工作空间，选择他们喜欢的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家具，并使用合适的健身器材。只要他们能满足自己所在工作小组的要求，就可以来去自由。

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和谷歌一样慷慨。尽管如此，大多数人都带着“科技贵族” (tech aristocracy) 的光环，他们所从事的商品化工作使他们回报颇丰。然而，在这些行业中，他们只占劳动力很小的一部分。下一代互联网建立在全球分工的基础之上，其人力成本很少被反映在世界经济的物流图表中。人们对硅谷和西雅图奢华的工作环境给予了极大关注，大多数研究、设计和工程工作都是在那里完成的。但是，这些劳动者只占直接参与生产过程人员的一小部分。真正的工作实际上是从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挖掘钶钽铁矿开始的，那里的工人用自己的双手和原始工具忍受着最可怕的工作环境。他们赚取微薄的工资，挖掘苹果的 iPhone、三星的 Galaxy 手机上所用的矿物质，这些矿物质对许多设备和系统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它们推动了下一代互联网的发展。此外，与矿井所有权相关的斗争还引发了一场持续 20 年的战争。

下一代互联网的大部分硬件实际上是在东亚的韩国和中国制造的，富士康和美国主要公司的其他承包商和分包商经营着大型工厂，类似于在工业化早期，以工厂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城镇。员工住在拥挤的宿舍里，在公司食堂吃饭。他们在低工资的条件下长时间劳作，在制造设备的过程中身处含有大量有毒物质的危险的工作环境，他们生产的东西包括云数据中心的服务器、许多与这些服务器保持通信的设备，以及如今嵌置在物体和人体中的传感器。可想而知，由于每周工作时间长达 70 个小时甚至更长，许多工人疲惫不堪，他们还必须应付因整天接触危险化学物质所引起的神经和

呼吸系统疾病 (Qiu,2016)。所谓的“铁三角”支配着高科技生产：越来越高的产品价值、不断加快的生产速度，以及更低的生产成本。科技企业破纪录的市值并不是没有代价的，除了影响在非洲开采稀有金属和在中国工厂生产 iPhone 的工人之外，还有那些在美国仓库工作的员工。在那里，亚马逊的雇员们忙碌地填写公司承诺第二天就要发货的订单。高利润率使科技公司能够向他们在美国的专业人员支付很高的薪水，而那些没有用于再投资的利润，往往会转移到急于讨好下一代互联网巨头公司的国家去，因为那里是避税天堂。

还有商业内容管理员，他们的工作就是通过筛除社交媒体网站、移动应用程序和云服务中的不良内容（这些内容通常与暴力和性有关）来保护用户。大多数商业内容管理员都在亚洲工作，主要是在菲律宾，这些管理员的薪水很低，每周 100 美元司空见惯，他们每天需要花很长的时间盯着屏幕上那些丑陋堕落的东西。如在微软，内容管理员就出于工作需要，不得不长期暴露在“难以描述的性侵犯”和“可怕的暴力行为”的图片中，这导致了他们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他们因此起诉微软。但微软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只是对这些说法表示异议。根据该领域顶尖学者莎拉·罗伯茨 (Sarah Roberts) 的说法，在脸书上也出现了上述情况，“人们可能会受到（这些不良内容的）高度影响，进而变得麻木。目前还不清楚脸书是否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长期后果，更不用说追踪员工的心理健康了”（转引自 Solon,2017）。结果，很多内容管理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选择离开，因为他们难以承受这样的工作。他们的劳动不仅商品化，而且彻底被降格 (degraded)。目前从事这项工作的总人数已达 10 万人，是谷歌员工人数的 2 倍，或是脸书员工人数的 14 倍。

在西方，主要是在生产稳定千兆字节数据流的产业中，有一个日益壮大的被称为“零工经济劳动者” (gig workers) 的群体。它的规模之大，以至于那些在零工经济中辛苦劳作的从业者可以折射出下一个互联网时代劳工的

命运。但要定义零工经济并不那么容易，就连美国劳工统计局 (U.S. Bureau of Labour Statistics) 在描述它的时候也感到头疼无比，虽然这是该机构的职责所在。一言以蔽之，零工经济是一个拥有许多一次性或按需工作的行业，从业者主要是在数字市场上被那些技术力量雄厚的公司所雇用。当下，其共同特征包括低工资、不稳定的工作，除了可能基于特定任务或工作时间的工资之外没有任何额外福利。据估计，现在有 400 万美国人就业于零工经济之中，到 2021 年，这个数字预计将超过 900 万 (Mola, 2017)。亚马逊在这方面是领导者，比如它的劳务外包渠道 (Amazon Mechanical Turk)。在亚马逊，外包工作是计件制的，每次只执行一项任务，通常涉及那些计算机无法完成的任务。一家公司或个人可能需要雇人在照片中找到目标对象，为网站撰写评论，或者参加一次社会科学实验，相关的工作将在亚马逊网站上发布，并设定好报酬价格。然后这些任务发包者就在应征者中进行筛选，后者被称为“服务提供者”或“任务承接者”。由于非常低的计件制报酬和几乎无保护的状态，对任务承接者的剥削已经非常猖獗，一些从业者已经在线上团结起来。然而，考虑到需要额外现金，或渴望短期项目工作自由度的个体数量在不断增长，这项服务仍然很受欢迎。借助劳务外包，亚马逊为那些几乎不需要为劳动者投入成本的任务提供了基础，因为接活儿的人会用自己的工具完成任务，获得很少的报酬，从公司那里得不到任何福利，这与在谷歌总部玩桌上足球的员工不可同日而语 (Harris, 2014)。

零工经济的典型代表是拼车公司优步 (Uber)，它将技术进步与不稳定的劳动力结合在一起，在全球大部分地区撼动了传统的出租车行业。利用数字技术将司机与乘车人进行匹配，并在后者的帮助下测量、监控和量化驾驶员劳动的准确价值，优步已经成为一家价值 600 亿美元的公司。该公司雇用了数百名社会科学家和数据专家来管理和操控司机行为，以尽可能低的工资来换取司机最可能大的工作量，同时将司机的破坏和抵抗降到最低。凭借其能够测量和监控司机行为（比如超速）以及交通流量的精确细节，优

步管理层可以对员工实施强大且密不透风的控制。

在 2016 年，涉及优步在美国主要竞争对手——来福车 (Lyft) 的一场事件中，彻底商品化的零工经济工人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这家公司一贯把自己描绘成这两家行业破坏者中“较善良”的那一家。当公司的公关部门决定宣传一位司机做出的卓越贡献之时，这个形象就坍塌了，因为她已经怀孕 9 个月，并且正在经历宫缩，但仍在载客。幸运的是，她最后一单生意是一个短程订单，随着宫缩的加剧，她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在不出意外的情况下分娩。对于来福车来说，这位司机就是劳模了，对工作如此投入，以至于一直开车到孩子出生。这位司机在一篇帖子中被称赞，照片中她的女儿被拍到穿着一件印着“小来福车小姐” (Little Miss Lyft) 字样的婴儿连体服，好像是在述说这家公司不只是在她妈妈身上打广告。这篇帖子最后号召来福车员工都来分享类似的“激动人心的来福车故事”。然而，公司并没有提供给她健康保险、产假或任何福利。像优步和来福车这样的公司都觉得这些东西是数字零工经济的累赘，也许这就是她开车开到临盆的原因，她别无选择 (Menegus, 2016)。

这或许令人震惊，但来福车的回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看看另一家公司——五美元办事区 (Fiverr) 网站，这家公司已经募集了超过 1.1 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基金，用于支持匹配数字服务买卖双方的交易，有些服务收费低至 5 美元 (网站因此而得名)，如承揽一项剪辑创意生日视频的服务。五美元办事区不仅赞美这种量化和商品化的工人，它还以一种“精心设计”的美学来表达上述观点。比如“我们相信实干家”这种宣传运动，在朴实的黑色、白色和灰色图像中，把那些放弃了一切、忍受着所有困苦，并最终成功的人描绘为“实干家”。五美元办事区在广告里说，它要的不是思想者、梦想者或规划者，而是实干家。正如一则广告所说：“你午餐时只喝咖啡，你兢兢业业完成每一件事，你用睡眠不足来应付工作，那你可能就是一个实干家了。” (Tolentino, 2017) 这家自诩为全球最大数字服务市场的公司，展现了

其作为零工经济的根本特征——从业者以低薪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废寝忘食地工作，甚至达到“自我虐待”的程度。

### 三、自动化

从2016年10月到2017年4月，美国百货业的8.9万个工作岗位消失了，相当于整个美国煤炭行业的规模。百货业是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经常提到的没能跟上经济复苏步伐的一个行业，它需要被复兴，才能“让美国再次强大”。在亚马逊的引领下，电子商务自2014年以来迅速扩张，这使得专家们得出结论，实体店购物已经达到一个临界点，并将急剧下降。在2017年的前3个月，美国的9家零售连锁店宣布破产，数千家商店关门歇业。逛商场的人减少了一半，投资者也差不多放弃这个前景暗淡的领域了。餐馆和娱乐场曾一度捡起了这个烂摊子，但观察人士估计这种情况不会持续下去。结果这种猜想得到了印证，零售业的崩溃甚至超过了2008年的大萧条(Thompson,2017)。

这种转变正在掏空大型商场和小型购物中心，对于每10个劳工中就有1个在零售业工作的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越来越明显的是，下一代互联网及其支持网购的后果使全职工作的主要提供者之一(零售业)发生了巨变，尤其是对女性而言。还有一个残酷的讽刺正在上演，导致零售业破产的罪魁祸首之一的亚马逊正在打造几家实体店，仿佛是为了嘲弄过去的时代。不过，一些专家认为，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简单。这些工作中的一部分将被仓库工作所取代，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在线购物者的需求。对失业的怀疑论者认为，自动化只是创造性破坏的自然过程中的一部分，自从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描述了这个概念之后，人们就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健康经济体系的一部分。然而，这样的评价安抚住了那些实际上失业的人，包括工作已经被转移给机器人的许多仓库和零售工人。沃尔玛正

在用机器人取代每小时 13 美元的后台现金清点工作，这些机器人每秒可以数 8 张钞票，数 3000 个硬币也只需要 1(Nassauer,2017)。

下一代互联网对就业和劳动力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政策议题。乍一看，人们很容易认为这是老生常谈，因为技术对工作的影响已经讨论了数年，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计算机科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自动化理论带来的大规模失业危险引发了相当大规模的公众讨论。而且，下一代互联网正在创造并将可能继续创造就业机会，它们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构建连接全球的大型数据网络；其二，数据中心内部的岗位；其三，对由互联网连接起来的实体进行控制、维持和监控所需的涉及传统基础设施的工作。此外，还有另一个原因解释了为什么要谨慎处理计算机技术对就业和经济的影响。正如研究文献所显示的，除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末硬件投资大量增加之外，整体就业情况与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度要远远高于其与计算机化的相关度，IT 部门长期以来承诺的生产力增长并未实现(Gordon,2016)。

然而，今天的新技术有更多的机会来淘汰人力，包括专业知识工作。事实上，有位专家顾问更喜欢将云计算定义为“只不过是將 IT 运作外包出去的下一个步骤”(McKendrick,2013)。这与私人智库高德纳联合公司(Gartner Associates)的一位研究人员简要概括的总体趋势相一致：“IT 业的长期价值主张并不是要支持人力资源，而是要取代它。”(Dignan,2011a)下一代互联网为公司实现信息技术运营的合理化提供了直接机会。高德纳还指出，企业的首席信息官认为他们的数据中心、服务器、桌面和商业应用程序效率低下，必须在未来 10 年内加以合理化。同时，与这些效率低下资产相关联的人在这一过程中也会被大量的合理化。

下一代互联网公司坚持认为，他们的系统可以打破商业组织中的既有模式，这种模式始于第一台大型计算机进入工作场所之时。彼时，所有的商

业和政府机构都坚持认为，运营自身的信息技术部门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大型组织要有自己的数据中心。下一代互联网的支持者极力主张，当少数大型数据中心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和较少的专业人员满足上述需求时，构建和运行数千个具体到组织的设施已无必要。他们认为，劳动力成本的节省是为转型付出的代价。这一过程已经开始，早期的研究表明，即使IT部门只是有限地裁员，公司也能节省15%~20%的IT预算(Howlett,2014)。

下一代互联网也使得大多数创造性和信息化劳动的普遍合理化成为可能，因为这些职业的工作越来越涉及数据的生产、处理和分配。根据一位观察家的说法：“在未来的40年里，分析系统将取代今天知识工人所做的大部分工作。”(Dignan,2011b)2013年的一份报告得出结论，目前美国近一半的劳动力受到直接威胁，而且处于失业的高风险类别中(Frey&Osborne,2013)。无论确切的分工是什么，毫无疑问的是，当前的趋势是使用软件将知识工作者的劳动转移到机器系统上。我们现在开始看到这种趋势对教育、医疗、法律、会计、金融、销售和媒体领域的影响。私人 and 公共部门组织被鼓励将它们的核心业务流程外包给Salesforce.com这样的公司，这些公司专门管理庞大的客户信息数据库，这曾经是市场营销和客户服务部门在公司内部完成的工作。我们还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在金融服务的塔尖上——全球最大的投资公司贝莱德(Black Rock)在2017年开始重组，并砍掉了一些顶级交易员的工作，因为现在许多投资决策都是由算法做出的。预计贝莱德等资本公司将把人工智能系统支出从2017年的15亿美元增加到2021年的28亿美元。但是，这笔投资也将伴随一定代价，到2025年，资本市场将失去23万个工作岗位(Pierron,2017)。在下一代互联网职业结构的另一端，无人驾驶卡车有望摧毁曾经是一种很好的、全职的、工会化工作的主要部分。据2017年的一场人工智能专家会议预测，在未来的15年内，所有卡车中有一半将是无人驾驶的，这将导致175万卡车司机失去工作。此外，他们还预测，在目前分析医疗记录的人群中，半数将在9

年内被人工智能取代。在 10 年内,95% 的空中交通管制工作将会由机器人完成。在不到 25 年的时间里,机器人将完成一半以上的外科手术,并完成绝大多数大公司的管理任务。即使为那些狂热的人工智能专家做预测时常挂在嘴边的夸张说法留有余地,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人类正处在劳动力大规模转型的过程中(Dreyfuss,2017)。

目前还不能确定下一代互联网对工作和工作质量的确切影响。大规模失业是一种可能,而那些有工作岗位的人也必须学会如何与机器人和其他形式的智能机器一起工作。马克思所说的“活劳动”(living labour)正迅速被机器的“死劳动”(dead labour)所取代。因此,将为技术负面后果付出代价的政府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应对一场人们一致认为的或另一种将很快席卷全世界工人的危机。

在过去的 40 年间,笔者一直在撰写有关传播技术的文章,每一波新技术都带来了关于失业的预测,但这些预测并未实现。事实证明,过去 50 年来全球劳动力的主要转变是一些工业就业岗位从西方大量转移到中国,另一些被低薪服务和零售工作所取代。其结果是,西方国家的工业心脏地带经历了小规模衰退,而服务性职业出现了同样值得注意的增长。这种转变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且这种转型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而不是技术的。如推动转型的一支力量来自贸易协定,这些协议为西方提供了来自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低薪工业劳动力,作为回报,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或地区获得了快速发展。然而,随着下一代互联网的发展,自动化引发的失业预测可能终将实现。

用“死劳动”取代“活劳动”总是允诺能大量节约成本,但直到“死劳动”获得足够的人工智能或决策能力来开展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工作的时候,这一点才能实现。云计算、大数据分析和物联网的融合意味着,金融服务行业的高管们正加入到电话接线员和工厂工人失业大军的行列中来。

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在政治领域采取行动，以解决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结构性转型。最典型的莫过于提供更多教育和培训的建议，特别是对那些不太可能自动化的技能，或者至少是那些人力可能占主导地位的工作。考虑到在模拟技能中进行培训的需要，那些要求强大面对面沟通技能的工作都受到了特别关注。人机沟通方面也存在很大的需求，这个领域被忽略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除了偶尔编程、维护和升级之外，人们平时不需要接触到太多的机器。随着智能机器越来越多地成为人类雇员的工作伙伴，人们将不得不学习独特的互动技能，以维持与机器的一种合理且和谐的关系。在过去，当机器发生故障时，我们曾开玩笑说它们有自己的想法。现在，它们真的有了。

由于新自由主义剥夺了工会一度拥有的大部分权力，如今工人们几乎没有维权的途径，而且在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中几乎没有发言权。一些立法尝试为数百万缺乏病假的零工经济劳动者提供基本的福利待遇，保护他们免受突如其来的伤残带来的经济影响，或者为他们的退休做最起码的经济准备。但目前，这些努力都没有在美国取得成功。毕竟，工会（或行业协会）才能帮助工人更好地应对不可避免的行业起伏。例如，当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在线新闻平台在2017年裁掉几十名员工时，其中的39人因为是美国东部作家联合会（Writers Guild of America East）的会员，而受到工会合同的保护，该合同提供了离职津贴和持续的健康福利。此外，在欧盟国家，特别是在德国，那里的工会保留了足够的权力来威慑即使是占主导地位的大型科技公司，比如亚马逊。亚马逊在德国试图采用美国式的管理方式，除了底薪之外没有任何福利，但遭到了有组织劳工的坚决抵制（Wingfield&Eddy,2013）。

在劳资关系没有重大逆转的情况下，首要的政策回应是向所有人提供有保障的基本收入，这对广大民众有益，而且也是一项公民权利。关于这个概念有许多不同的计划和各种各样的名称，但它的基本理念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

间，至少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尼克松政府就曾考虑过一项基本收入计划。

基本收入建议源于这样一种认识，即自动化的浪潮会让许多人无法找到一份维持生计的工作。这种情况不仅会加剧贫困，也有可能大幅降低需求，使经济陷入持续的停滞状态，令其面临经常性的衰退和萧条风险。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芬兰、加拿大、荷兰以及意大利都进行了一系列国家和地方层面的试验。虽然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传统推动者构成了强大的反对力量，但许多商界领袖都支持这一理念。这些人包括科技界的领袖人物，比如脸书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 和强势的风险投资公司 Y 孵化器 (Y Combinator) 的总裁萨姆·阿尔特曼 (Sam Altman)。此外，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正在加速的不平等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他们已经动员起社会运动，将全民收入动议视为后网络 (post-Internet) 世界进步革新的前沿 (Sodha, 2017)。当该理念走到制定详细政策的那一步时，社会运动的压力将尤为重要，因为全民基本收入的实际意义将由资金数额和资质要求来决定。那么，“全民”和“基本”怎么来界定？如果存在就业标准的话，那又是什么？随着下一代互联网的铺开，这些很可能成为核心的政策议题。

本文译自 Vincent Mosco, "Digital Labour and the Next Internet" 载姚建华主编：《数字经济中的劳工组织》，北京：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本文为 2017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留金发 [2017]3019），编号：201706100024 成果之一。

## 参考文献

Dignan, L. (October 24, 2011a). *Cloud computing's real creative destruction may be the IT workforce*. ZDNet. Retrieved from <http://www.zdnet.com/article/cloud-computings-real-creative-destruction-may-be-the-it-workforce/>

- Dignan,L.(October18,2011b). *Analytics in 40years:Machines will kick human managers to the curb.ZDNet*.Retrieved from <http://www.zdnet.com/articleanalytics-in-40-years-machines-wil-kick-human-managers-to-the-curb/>
- Dreyfus,E.(March24,2017).Hate to break it to Steve Mnuchin but AI's already taking jobs. *Wired*.Retrieved from <https://www.wired.com/2017/03/hate-break-steve-mnuchin-ais-already-taking-jobs>
- Frey,C.B.& Osborne,M.(2013).*The future of employment:How susceptible are jobs to computerisation?* OxfordUniversity.Retrieved from <http://www.oxfordmartin.ox.ac.uk/publications/view/1314>
- Gandy,O.H.Jr.(1993).*The panoptic sort:Political economy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critical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and in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New York: Westview Press.
- Gordon,R.(2016).*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rengard,S.(2015).*The Internet of things*. Cambridge,MA:MIT.
- Haris,M.(December3,2014).Amazon's mechanical turk workers protest:"I am a human being not an algorithm ." *The Guardia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4/dec/03/amazon-mechanical-turk-workers-protest-jef-bezos>
- Howlet,D.(February13,2014).Exclusive:Computere conomics study—cloud saves15 percent.*diginomica*. Retrieved from <http://diginomica.com/2014/02/13/exclusive-computer-economics-study-cloud-saves/>
- Manyika,J.,Chui,M.,Bison,P.,Woetzel,J.,Dobbs,R.,Bughin,J.,&Aharon,D.(2015).*Unlocking the potential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New York:McKinsey.
- McKendrick,J.(February19,2013).In the rush to cloud computing,here'sone question not enough people are asking.*Forbes*.Retrieved from <https://www.forbes.com/sites/joemckendrick/2013/02/19/in-the-rush-to-cloud-computing-heres-one-question-not-enough-people-are-asking/#6d4a7b047194>
- Menegus,B.(September22,2016).Lyft thinks it's "exciting"that adriver was working while giving birth.*Gizmodo*.Retrieved from <https://gizmodo.com/lyft-thinks-its-exciting-that-a-driver-was-working-whil-1786970298>
- Mola , R. ( May 25, 2017). The gig economy workforce will double in four years . *Recod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ecode.net/2017/5/25/15690106/gig-on-demand-economy-workers-doubling-uber>
- Mosco,V.(2014).*To the cloud*.New York:Routledge.
- Nasauer,S.(July19,2017).Robots are replacing workers where you shop.*Wall Street Journal*.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sj.com/articles/robots-are-replacing-workers-where-you-shop-1500456602>

Pieron,A.(March1,2017).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apital markets.*Opimas*. Retrieved from <http://www.opimas.com/research/210/detail/>

Qiu,J.(2016).*God-bye iSlave*.Urbana,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odha,S.(February19,2017).Is Finland's basic universal income asolution to automation,fewer jobs and lower wages? *The Guardian*.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7/feb/19/basic-income-finland-low-wages-fewer-jobs>

Solon,O.(May4,2017).Facebook is hiring moderators:But is the job too dificult for humans. *The Guardian*.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7/may/04/facebook-content-moderators-ptsd-psychological-dangers>

Thompson , D. (April 18, 2017 ). The silent crisis of retail employment. *The Atlantic*.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7/04/the-silent-crisis-of-retail-employment/523428>

# 知识劳工、身份认同与传播实践

## ——理解中国IT程序员

孙萍\*

姚建华\*\*, 杨睿\*\*\* 校

摘要：基于“知识劳工”的理论框架，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角探究了在中国小型互联网公司就业的IT程序员的身份认同与传播实践。通过对个人式回忆的话语分析，本文揭示出他们四个层面的自我身份认同与建构，包括：基于技术经验和专业主义的认同；以自我提升为目的，对高度流动与内在风险趋于中立化的阐释；使用“码农”一词来体现工作的高压与遭受圆形监狱式的监控；以及使用“屌丝”一词来进行自我表达和集体抗议。IT程序员基于自身工作经验的边缘话语与中国在经济发展、技术创新方面的主流话语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个人主义凸显的明证。本文的研究进一步确认，“知识劳工”的概念不尽然与专业技能、传播、创新、知识等话语相连，而是对数字经济时代下劳动者的生存困境和凝聚力等问题的再阐释。

关键词：知识劳工；身份认同；IT程序员；话语分析

### 一、导言

长期以来，全球范围内数字经济和IT产业的崛起备受学界瞩目，这也使得数字经济背后的劳动议题受到持续关注。理查德·巴布鲁克(Barbrook,1998)在他的研究中指出，新型技术的普及和对知识劳工的征用是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在信息社会的背景下，从个人、专业到

\* 孙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

\*\* 姚建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加拿大女王大学社会学系博士。

\*\*\* 杨睿: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社会层面不断信息化，这使信息化背后诸如程序员等助力者的作用不容忽视。诚然，知识劳工在呈现创新、知识与传播等话语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同样构成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重要的技术力量 (Virno&Hardt,1996)。本文以在中国深圳小型 IT 企业工作的程序员为例，旨在通过了解其工作实践和身份认同，更好地理解“知识劳工”的理论框架。以往的诸多文献都认为，IT 程序员这一群体作为技术创造与实践的最前端，经常被划分为社会阶层中的中上层人群。例如，达斯 (Das,2001) 曾在其研究中提到印度的 IT 程序员被认为是“新的中产阶级英雄”，因为他们的技术推动了印度 IT 经济的腾飞。恩辛格 (Ensmenger,2012) 在《计算机男生的占领》(The Computer Boys Take Over) 一书中也阐释了计算机技术人员在软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追溯最早一批“计算机大男孩”如何在传统的、等级森严的机构中建构自身的独立性和身份认同，恩辛格强调了软件技术工作人员在现代社会中有着非比寻常的重要意义。

不同于将 IT 程序员作为中上社会阶层的研究，另一派学术脉络更多地关注全球生产链底端的技术人员，揭示出他们被裹挟进高度不稳定且等级森严的分工体制的现状。例如，科斯塔 (D' Costa,2003) 指出，印度软件行业的发展是基于不均等资本主义产生的企业家靠着剥削数量庞大的数字劳工而进行资本积累的结果。在对印度跨国软件从业者的研究中，项飏 (2012) 展示了跨国资本如何影响印度 IT 程序员的就业机会，以及这种“全球猎身”的行径如何将这些跨国程序员置于不确定的、“险象环生”的工作环境之中。桑多瓦尔 (Sandoval,2013) 在对富士康工厂的劳工状况进行分析时阐明，信息与通信技术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ICTs) 的发展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创新

与革新，同时也建立在对技术工人的剥削之上。本文以中国的草根 IT 程序员为例，旨在加入这一学术脉络并揭露出在底层社会挣扎的所谓“知识劳工”是如何进行身份建构和开展工作实践的。

在中国，以 IT 程序员为代表的“知识劳工”是一个尚未被学术研究充分触及的领域。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数量巨大的劳动群体在全球化、信息化和数字化的革新浪潮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的软件出口业迅速增长。根据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在 2014 年发布的《2013 年中国软件产业报告》，2013 年，中国软件出口达 487 亿美元，占国家 GDP 总量的 0.5%。报告同时指出，2013 年，中国有 3108 家外资软件公司，合营利润为 1130 亿美元，占整个国家 GDP 的 1.19%。中国的 IT 程序员，尤其是来自底层的程序员，组成了全球化数字劳工体系中末端的一环——他们主要在跨国的产业链中负责被外包的工作、提供国际服务，以及加工电子交易的软件。

本文主要关注中国小型互联网企业中的 IT 程序员，包括他们的生活、身份、话语以及日常工作实践。本文论述了“知识劳工”的理论框架以及当代中国的 IT 产业，着重分析了中国底层的 IT 程序员如何在日常的工作实践中通过个人回忆式的话语建构起自我身份认同，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技术与社会发展的意涵。

## 二、知识劳工

关于“知识劳工”这个概念的探讨由来已久。马克卢普认为，知识劳工是指“知识生产工业群内工作的人”，或者是“专门从事知识生产

的职业人” (Machlup,1962,p.267)。在经济学家德鲁克看来,知识劳工指的是“从事生产观点、概念等的男性或者女性”(Drucker,1969,p.264)。与前两位学者不同的是,贝尔并没有使用“知识劳工”这个概念,而是指出“知识阶层”是后工业时代中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群体,传统的劳动理论将会被知识价值所挑战,因为社会生产实践正朝着越来越信息化的方向发展(Bell,1976)。

三位学者对“知识劳工”的概念化过程可能略有不同,但在以下两方面是一致的:其一,知识劳工数量的增加使知识产业迅速发展;其二,他们对于知识劳工的定义都强调对信息的生产与分配,以及对技术与创新的占有。在这一点上,“知识劳工”有别于斯麦兹(Smythe,1977)的“受众劳动”和特拉诺瓦(Terranova,2004)的“无酬劳工”概念,知识劳工更强调专业技能和职业技术。詹兹等人的研究将知识劳工描述为“高端劳动者”也证实了这一点(Janzetal.,1997,p.878)。这类劳动者会将他们的所学用于设计、生产新的产品与服务。虽然以往的一些文献研究将“知识劳工”看作与体力劳动者相对立的概念,但最近的一部分研究已经不再采用这种二元对立的视角了,而是认为知识劳工可以包含广泛的职业类别,甚至可以将体力劳动者纳入其中。

莫斯可和麦克切尔也认为,知识劳工的范围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特定的职业,而应该扩展到一切与“信息和知识的处理、传播、承载”有关的劳动(Mosco&McKercher,2008,pp.24-25)。基于这样的理解,福克斯(Fuchs,2014)指出,数字劳工的范围基于工业生产,而非职业范围。换句话说,任何与数字经济发展相关的劳动都应该被列入数字劳工的范围之内,而不应该仅仅关注其职业种类。福克斯强调了数字经济下劳动力的多样性和延展性,同时也阐释了全球范围内数字劳动分工的可能性。

在电子计算机层面,编程与劳动力被认为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分析框

## ■ 专题一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数字时代的劳动转型

架。一方面，由于技术上的优势，计算机工程师被视为一个颇有权力的群体；另一方面，他们也被认为是边缘的、没有权力的一群人，因为他们更倾向于“在虚拟的世界里寻找权力和控制” (Edwards,1997,p.172)。在哈克看来，计算机工程师在工作中获得的乐趣和成就感与他们的赋权密切相关 (Hacker,1989)。弗罗曼 (Florman,1996) 赞同哈克的观点，认为技术在IT程序员看来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和体现。通过分工合作，他们可以拓展社交、形塑集体认同感。瓦格和斯里尼瓦桑的研究表明，女性程序员更看重自身的IT专业，并会通过诸如“挑战”“成就”“精神鼓舞”“技术的使用满足”“探险”“自我提升”“个人成长”“自我满足”等语汇来展现她们对自己职业的认同感 (Valk&Srinivasan,2011,p.44)。

除此之外，一些批判学者也表示，IT专业人员的研发工作充满挑战和不稳定性。阿罗拉等学者对印度的软件业展开研究，发现印度的IT工人经常被置于被动的地位，通常情况下，他们仅帮助西方国家做一些简单的、重复的外包工作 (Arora et al.,2001)。项飏 (2012) 在“全球猎身”的研究中也发现，印度IT程序员在“猎身”的过程中做着IT苦力，不但工作毫无创新性，得到的工资也非常微薄。夏冰青 (Xia,2014) 的民族志研究表明，中国大多数互联网工作者处于社会的底层，不断沦为全球分工体系中无足轻重的“小齿轮”。

### 三、ICTs与中国IT程序员

中国数字经济起步较晚，但却发展迅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的数据库资料显示，中国已经是目前世界范围内生产和使用ICTs最重要的国家之一。2004年至今，中国已经是ICTs硬件组装和生产加工量最大的出口国，但在软件生产方面，并没有像硬件一般占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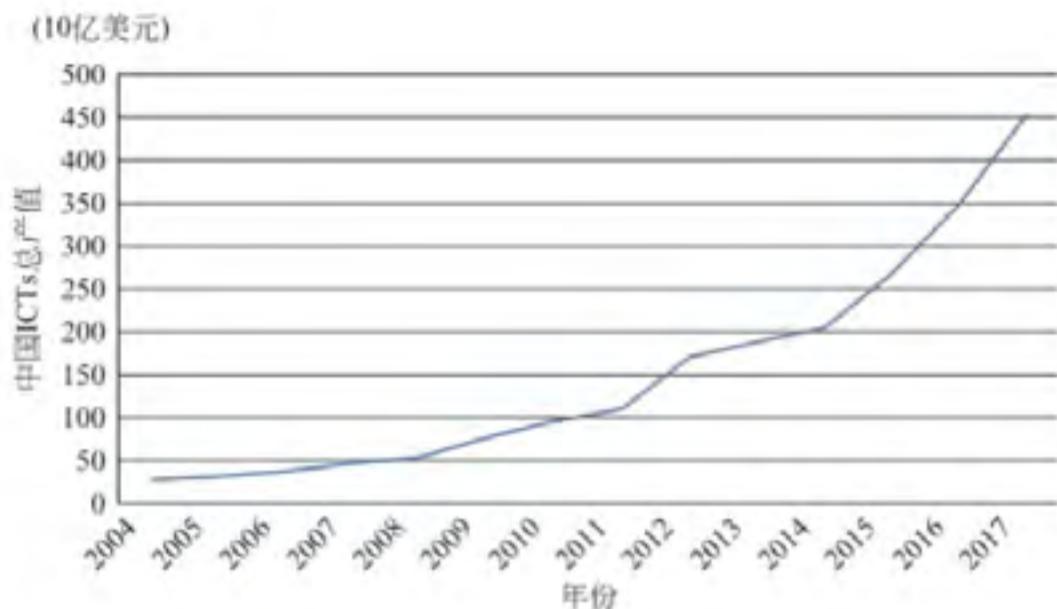


图1 中国信息与通信技术(ICTs)总产值

数据来源：2004—2017年互联网数据中心(Internet Data Center, IDC)研究报告

重要地位。2013年，中国的ICTs行业出口占世界总出口量的27.4%。本研究的重点不在于硬件ICTs，而是在软件。总体而言，软件行业主要涉及软件产品与软件服务，包括研发、市场、销售、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通常软件产品端分类广泛，包括操作系统、计算机端应用、网络管理工具，以及各式各样的企业和个人程序。随着中国IT市场的不断扩张，软件业正在成为增长最为迅速的部分。根据加特纳公司的报告，2013年年底，全球软件业的产值达到3500亿美元，占全球GDP总量的0.46%(Gartner, 2014)。随着中国信息化进程的加速，电子政务、信息监测、股市交易、物流与网上购物日渐发达，一个软件帝国的雏形正在不断形成。

与处于急速变革中的中国社会一样，IT企业的发展呈现出迅速、不均衡、层级多样等特点。其中既有像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业界简称“BAT”）这样的巨型IT企业，又有跨国公司、中外合资企业，如微软、IBM等，还有数以千万计的小型IT企业。据官方数据统计，截至2014年，中国共有37102家软件公司，其中在2013年至2014年新成立的公司就有6183家。包括BAT、华为在内的大型公司的发展带来了

中国 IT 市场的欣欣向荣，同时也帮助建构和丰富了社会民众对企业家和 IT 专职人员的共同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一批带有创业、冒险光环的新型 IT 企业家和技术人才，如马云、马化腾、丁磊、张朝阳、王志东等成为众人瞩目的“企业家英雄”。

虽然中国 IT 企业的腾飞与印度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两者至少存在两方面的明显差异。其一，相较于印度以外包和离岸加工为主的发展模式，中国的 IT 产业主要针对国内市场。在项飏 (2012) 的著作中，他分析了印度 IT 产业和工人为何成为全球劳动分工链条中末端的缘由，并探讨了其如何与澳洲、美国等地形成差级式连接的过程。而在中国，国内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和政府鼓励信息化产业发展的方针使 IT 产业主要针对国内的消费市场。当然，这样的论断并不是要忽视跨国企业与合资企业在中国 IT 市场中的重要份额。许多西方 IT 企业积极通过向中国 IT 企业外包一部分非核心的信息加工与测试工作以开辟中国的市场，一方面他们垂涎于中国国内巨大的市场，另一方面是出于降低劳力成本的考量。

其二，就劳动力素质而言，印度的大部分 IT 程序员或 IT 专职人员都接受过大学教育，甚至有些被认为是接受了过多的教育 (Upadhyā&Vasavi, 2006)，而在中国却并非如此。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在 2014 年发布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超过 40% 的 IT 程序员只具有职业学校的文凭（如图 2 所示）。这种专职院校的教育模式通常是让学生在机构内接受从几个月到两年不等的职业培训，然后迅速地由一名学生转变为一名“码农”。虽然在中国，也有相当一部分的 IT 程序员接受过本科教育，但我们应当将 IT 教育在诸多大学中的差级式存在做一个梳理和分析。通常在就业过程中，拥有“985”或“211”学校文凭的毕业生更受青睐，甚至可以说，

这是进入诸如 BAT 等大公司的基准条件。但据统计，这两类院校毕业生的总和只占全国大专院校的不到 5%。市场选择对文凭的限制和教育背景的重视导致了 IT 人才在就业和劳动分工层面的不平等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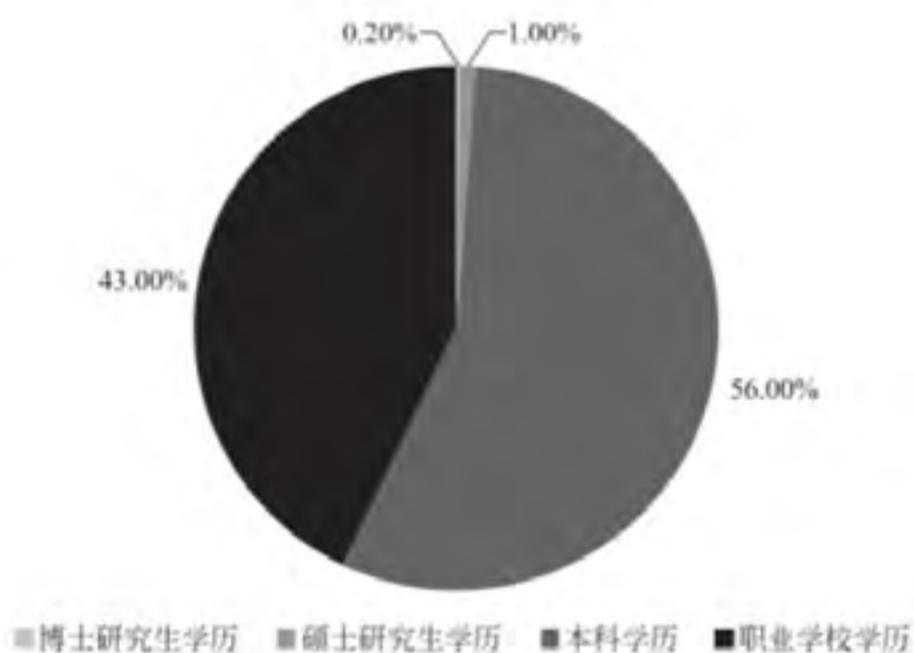


图 2 2013 年软件工程从业者的受教育程度比较

数据来源：2014 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电子工业出版社

与国外情况相同，在大型跨国软件公司或者国内 IT 巨头公司就职的 IT 程序员，他们教育程度高、薪水高，但却只占 IT 就业大军非常小的一部分。根据岳兵 (2015) 的研究，中国有 90% 的 IT 程序员在小型公司上班（在中国，小型公司被定义为拥有 100 名或以下员工的企业）。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中国的 IT 程序员戏称自己为“码农”。这里的“码”指的是代码，而“农”取自农民之意。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下，农民通常被认为是远离权力中心、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对于身处底层的 IT 程序员来讲，“码农”一词不仅仅是自嘲，更是对自身工作状况的反映。

“码农”一词最早兴起于 2011 年，被底层的程序员广泛使用，后来因其趣味性和娱乐化的特质而被各个层次的程序员使用。虽然不同的程序员在各自的领域内分工不同，但总体而言，码农的工作是与代码打交

道，包括研发代码、测试、排除问题等。

本文的研究基于在深圳的小型IT企业工作的程序员而展开。政府推进信息化和数字经济的政策使得一大批小型IT企业应运而生。比起大型公司，这些小型IT企业具有人员少、运作模式灵活等特点。基于市场的需求，它们往往聚集在大城市的中心地段或者高新科技园区，如深圳南山科技园，且主要业务是为其他非互联网企业提供软件开发与后期维护服务，以及承担来自大公司的外包服务等。为了压缩成本，公司往往只雇用一小部分技术人员，但他们却从事多种开发工作。在这些小公司工作的IT程序员都比较年轻，大部分来自农村地区，只在职业或培训学校进行学习，但这其中，也不排除受过正规专业学习的程序员。以往的文献并没有将对IT程序员的研究与技术发展的逻辑以及其所在的社会背景勾连起来，同样，他们如何认同自身以及如何在全球IT产业链中进行工作实践的问题也并没有引起学界和业界充分的重视与关注。基于此，本文要研究的问题具体包括：其一，中国IT程序员如何从“知识劳工”的角度建构自我的身份认同？其二，中国IT程序员自称为“码农”的社会文化意涵是什么？这种自我认同与“知识劳工”的相关性是什么？其三，中国IT程序员的劳动实践可以在多大意义上拓展我们对“知识劳工”这一框架体系的认识？

#### 四、研究方法

本文选择文化话语分析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文化话语被定义为“一套诠释传播实践、行为、事件以及方式的历史变迁式的解释体系，通常是由特定的符号、标志、标准和意义共同组成”（Carbaugh et

al.,1997)。在话语分析中，文化话语是一种较新的方法，用来阐释社会文化生活是如何通过传播与互动而产生并发挥作用。文化话语的前提是，传播意味着社会事实的建立，包括认同、关系、情感、行为等诸多方面。马拉兹 (Marazzi,2011) 在其研究中表明，在数字经济时代，知识劳工更多的是通过智慧、创新和语言来建构自我认同。从文化话语的角度看，诸如 IT 程序员等知识劳工的工作交流日常是他们建构身份认同、社会认同和自我行动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他们的传播实践予以观照变得尤为重要。

本文主要通过深度访谈的方法收集数据，访谈了来自深圳的共 10 家小型 IT 企业的 26 名程序员。其中包括 6 名女性程序员和 20 名男性程序员。每次访谈时间为 60~90 分钟。数据的收集时间是 2014 年 3 月、5 月和 11 月。在开始收集数据前，研究者会告知受访者研究的目的，并确保信息的安全。受访者签署知情同意书。访谈的问题包括：“为什么你想要成为一名 IT 程序员？”“你怎么看自己是‘码农’这个问题？”以及“说说你工作里面难忘的事情”等，以此来了解受访者的身份建构和“码农”的社会意涵。访谈并没有固定结构，而是包括更多的开放性问题以保证数据的客观说服力，包括受访者的个人经验、工作实践，以及工作以外的生活。除此之外，研究者也在一家公司进行实习，与 IT 程序员交谈，以此进行参与式观察。

研究者同时使用网络民族志方法收集补充数据。网络民族志是以计算机为中介，探讨群体与文化之间的建构过程。这种方法将互联网看作一种社会互动的情境和文化 (Dominguezetal.,2007)。本文认为，网络民族志对于研究 IT 程序员的身份认同和工作实践必不可少，因为以往的研究表明，IT 程序员与社会其他群体相比较，其使用互联网的特

征表现得更为明显。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4)的数据,程序员每周在计算机前耗费41.5小时,更重要的是,他们大部分的闲暇时间也被互联网所占据。互联网变成了IT程序员的第二个“家”,这一点被蓬勃发展的网上群组、网站论坛和社交媒体证实。其中,百度贴吧、知乎和果壳是三个IT程序员频繁“光顾”的论坛。比起一些程序员经常去的专业论坛,如经常讨论编程和开放代码问题的Github或者GoogleCode,IT程序员在上述三个论坛中探讨的问题不仅涉及工作,而且还包括对他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经验的探讨。在这里,以“IT农民工”“码农”“IT程序员”等命名的网络群组变成了程序员日常对话、故事讲述、表情分享的基地。各种类型的对话发表在这里,网络民族志因此成为IT程序员个人、社会与行动建构的重要文化话语。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个人回忆录”方式在访谈和网络民族志的研究过程中不断凸显。个人回忆录主要是IT程序员的一些个人叙事,譬如描述他们生活和工作中关切的问题。这种反思式的回忆能让研究者看到IT程序员对于“知识劳工”这个概念的体验。回忆录代表的是高度“个人化”的观点,它是由生活中的一些琐事、细节组成的社会现实(Boylorn,2008)。正如斯科特所言:“回忆录讲述了个人故事,与理论无关。”(Scott,2014,p.760)也正是这种对学术的无偏袒和对个人意义的重视,使得回忆录成为笔者在研究中国IT程序员个人身份认同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

## 五、专业主义、精英主义和认同

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IT程序员经常表达出一种“技术自豪感”,

这一点在与受访者 A 的访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开始进入大学，我念的是新闻。后来我转到了信息技术专业，学 C++。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这么做了。比起新闻，我更喜欢编程，因为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你会变得更聪明，有一个更好的前景。而且不是说 IT 现在是中国的朝阳产业吗？当我想到自己是其中一员时，我会很受鼓舞。

在上述的访谈中，IT 程序员的认同和积极乐观的心态清晰可见。很明显，该 IT 程序员把自己描绘成了一个迎合市场需求的技术人员，并在一个上升企业中工作。在对话中，他经常使用“学到很多东西”“变得更聪明”等语言表达出自己的积极情绪，并将个人工作与更大的环境进行勾连。在访谈中，受访者 A 并不是唯一这么论述的。受访者 B 已经在 IT 企业工作了 2 年，他与受访者 A 的描述大致相仿：

当码农不是最好的选择，但也不坏。至少你可以用自己掌握的技术挣口饭吃，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敢这么说。说句实在话，我们就是电脑和软件方面的行家。IT 产业在中国、在全世界都发展得很好。我的工资目前也 OK，通过我的技术，可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也有着光明的未来。

除了对技术和正在腾飞的 IT 产业抱有强烈认同感，受访者 B 强调了社会结构中的阶层分化现象。尽管他并没有强调自己属于中产阶层，但受访者 B 因自己的技术能够成为立身之本而感到欣慰。他通过投资学习掌握一门技术，并从中获得工作自豪感。受访者 A 和 B 的话语都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传统的劳工观点。作为 IT 程序员，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有着很强的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与信息化、IT 发展的大环境密切相关。同时，性别在这种认同感上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下面是一位

女性程序员（受访者 C）给研究者讲述的她的工作：

当我介绍自己时，我觉得成为一名 IT 程序员很自豪。我是说，尤其自己是个女孩子。当我遇见新朋友，他们知道我是程序员并能够使用 Java 和 .NET 时，他们很羡慕我。尤其在这一行业，男生那么多，女生很稀少。

传统的中国文化认为工作是男性建构身份的重要途径，但是女性在 IT 产业中日趋活跃的身影也为当今 IT 行业带来了新的景象。穆克纪描述了在印度出现的相同景象：女性在技术行业的参与使得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她写道：“流行杂志里面充满白领阶层的 IT 女性，并且认为这项工作对她们尤其合适，因为它并不涉及体力劳动，而是知识劳动。”（Mukherjee,2008,p.64）

同样地，受访者 C 的回答也印证了上述观点，但她的成就感并不意味着女性在技术领域和 IT 就业中没有遇到困难（D' Mello,2006）。长期以来，女性在以男性为主导的行业，如工程、IT 或者科学界被区隔。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对女性事业限制的逐渐打破，越来越多的女性跨入程序员的行列。在对受访者 C 进行的访谈中，她对 IT 的身份认同是社会建构的过程，其中性别是这一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及意义来源。

通过个人化的叙事方式，个人命运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身份认同紧密结合在一起（Witeborn,2008）。研究者在访谈中发现，受访者作为 IT 程序员对于技术的认同有着社会文化层面的重要意义。由于中国近代历史上对于技术的忽视所带来的屈辱，让技术成为阶层划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IT 程序员于无形之中建立起一种精英主义认同，将个人的经历与社会大环境联系在一起。

## 六、地域、移动与内化的不稳定性

高度的流动性是本研究中的又一发现。IT程序员在描述他们工作经历时，经常会提到不同地域的名称，如其中一位受访者说：“我一开始在北京工作，后来跑来深圳。”另一位提到：“我之前在汕头，现在跑来广州，在那里工作了三个月，又换了一家公司。”在访谈中研究者发现，大部分受访者有着在不同公司和地域工作的经历，有一些甚至跨地域同时参与不同的项目。

成为一名IT程序员意味着接受高度流动性，那么这种流动对他们又意味着什么？很多受访者提到不停地跳槽是“作为一名IT程序员很正常的一部分”。而解释频繁跳槽的原因往往是个人的发展，尤其是在中国，IT行业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在很多IT程序员的日常工作中，他们需要经常去其他城市进行项目合作洽谈。这种在不同地方来回奔波的场景形成了一幅迁移地图，而IT程序员就是其中高度流动技术工人的一个缩影(Upadhy&Vasavi,2006)。依戴玛等学者认为，随着传播的密集化和信息的高度流动化，现代化的管理体制要求知识劳工对工作的反应越来越快，从而使他们的专业化工作充满流动性和不确定性(Iedemaetal.,2005)。虽然我们可以说，IT程序员的职业特点使得他们与物理上的地域概念联系紧密，但是，其背后的原因却来自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市场和资本(项飏,2012)。劳动者依附于高度流动的资本之上，且很难控制自己。当代中国迅速发展的IT产业使得很多程序员脱离固态稳定的工作状态，转而进入一种游离的不稳定状态。伴随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在认同这种高度流动性同时，又是如何面对其中所隐含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比如，受访者D说道：

我从武汉大学毕业,在当地一家公司工作2个月,然后就去了上海。在上海的工作不错,但是我发现那个工作任何人都能胜任,因为没有什么创新。我觉得没有成就感,就去了深圳。……一般你选择跳槽后,你的工资至少可以上浮10%,大部分的人也会找到一个更适合个人职业发展的工作,对吧?发现下一个工作并不好,就再跳槽。频繁跳槽很正常,因为中国IT发展太快了,你必须学习新东西,没人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

在访谈过程中,受访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不同的城市,同时强调诸如“好机会”“变化快”“继续学习新东西”等IT程序员共同的工作特点。个人的发展成为IT程序员抵消潜在危机的筹码。换句话说,对于他们而言,IT行业中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被转化为一种“个人成就式”话语体系。大部分IT程序员认为,要达成个人目标,经历这些不确定性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这无形之中将IT内在的风险中立化。与大多数的受访者一样,受访者D将个人发展与社会大环境相结合,这也从一个方面让我们了解到,IT程序员是如何建构对流动和工作稳定性的认同的。回到本文聚焦的第一个研究问题:中国IT程序员如何从“知识劳工”的角度建构自我身份。我们可以看出,“知识劳工”的身份建构是多层次的,包括专业主义、技术、精英主义、流动性和内在的风险。他们大多数人的工作充满流动性、不确定性,但却试图用自己的理解将其自然化、个体化,进而将其纳入个人成长和事业发展中去。

## 七、去技术化(De-skilling)和圆形监狱式的控制

很多学者都在讨论后工业信息化社会下的“创新阶层”(creative class)。在这一学术脉络中,IT行业的工人被认为是“职业人员”“编

程科学家”或者“技术人员”，并且被认为是从事高度复杂工作的人才(Florida,2002;Shirky,2010)。但是，本研究发现，对于在小型IT企业中或者刚开始工作的IT程序员来说，他们大部分的工作是机械化的，且无技术含量。其中的一个例子是受访者E，他刚从北大青鸟IT培训班毕业，并在广州找到了一份工作，在访谈中他这样说道：

成为一名IT程序员的门槛特别低。你需要的就是找一家培训机构，在里面努力学习两年。学到公司需要的技术，就为他们工作。他们不在乎你的编程语言或者编写程序的质量。他们只关注你能不能快点完成给你的任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称自己为“码农”。我们就像农民工一样，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搬砖，我们搬代码，都是无聊、重复性的工作。

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语境下，码农的意涵与上述“创新阶层”的话语正好相反。受访者E强调了工作的“重复性”和“低级性”，自诩为“农民工”的事实更让人感受到他们令人沮丧的处境。这与我们传统想象的“知识劳工”的形象差距甚远。下面的一段对话是研究者从百度贴吧的“程序员吧”看到的，对话以问答的形式展开：

问题：IT程序员的工作状况似乎不太好。但是除了写代码，我还能干什么？回答1：有句话叫作“好来好去”，IT程序员就是这样。我们就像一次性筷子，公司把你榨干了，你也就没用了。参加一个4个月的培训，你就能当个IT程序员。然后他们就会拼命让你干活。这就是码农的生活。回答2：谁说不是。IT程序员就是吃青春饭。干几年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这就是规律。你必须学习新东西。……我一个哥们学C++，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10点。有时候甚至工作到凌晨。吃住都在办公室，刚开始3000块钱一个月。头发掉得厉害。……

回答 5: 想想你为什么成为一个码农。为钱? 喜欢? 如果是这样, 那你还是换工作吧。……看看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地方, 竟然没有自己的 Spring 框架, 更别说语言、数据、操作系统了。我们的社会太浮躁。

上面的这些话语反映了 IT 程序员的普遍困境。IT 程序员的生活写照是: 超长工作时间、超强工作压力、超低工资, 以及较低的安全保障。他们用“一次性筷子”和“榨干你”来形容自己的工作。就像麦克切尔和莫斯可 (McKercher&Mosco,2007) 所述, 数字经济下部分劳工的工作倾向于“去技术化”。虽然被称为“技术工人”, 但其所从事的工作实质上是单一和极具重复性的劳动。近几年, 外包业务开始兴起。它的形成是因为一些大型软件公司出于缩减劳动力成本的需求, 将自己部分的非核心工作承包给小公司。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 承接外包订单对小公司而言至关重要。这些外包订单虽然挣钱少、耗时长, 但无论大型还是小公司都可以通过压缩技术型程序员的劳动力成本来获取利润。

与之相伴的是 IT 程序员在工作实践中的高强度。IT 企业对程序员的控制可以说是软硬兼施。IT 程序员被要求尽快地完成被安排的项目。一旦一个项目开始, 他们就要跟模块负责人、项目组长、项目经理等人进行频繁的交流。受访者 F 说道:

每天下午公司都会开会。每个人向模块组长汇报自己做了什么。然后他汇报给项目组长。经理通常不会直接干预你的工作, 但是他知道你干了什么、完成了什么, 还有什么没做完。实际上, 也没有你想象得那么严格。经理经常请我们吃饭, 休息的时候我们也有饮料和零食。……我们用指纹打卡, 每迟到一次扣 50 元。通常来说, 扣掉的钱用于支付大家一起吃喝的费用。

像受访者 F 这样说的人并不少见。在大多数 IT 企业里,IT 程序员被期望成为个体化的、善于自我管理的劳动者,但同时,“他们也受制于一个严格控制和管理的管理的体制”(Mukherjee,2008,p.65)。在受访者的论述中,这种严苛的管理是通过一系列层级汇报、指纹打卡、克扣工资等泰勒式的管理方式实现的。但是它往往同时掩盖在一个共享食物、看似轻松愉快的环境之下。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圆形监狱式”的监控孕育而生,经理对员工严格的监视也就变得不足为奇。此外,受访者都感受到巨大的工作压力,因为他们会经常被上级检查工作进度。较好的工作环境和基本设备的提供让 IT 程序员更想要待在办公室,这使得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的边界变得日益模糊(Fuchs,2014),同时也成为资本对劳动力控制的新手段。这种“圆形监狱场”变成了 IT 程序员自我监视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监视和审查无处不在。

## 八、作为“屌丝”的“码农”：挑战权威

IT 程序员很喜欢称自己为“屌丝”。“屌丝”一词多是指社会底层或者工作报酬低、生活贫困的男性。该词自 2011 年始在互联网上流行,现在则变成了广大就业人群和蓝领工人用以自嘲的流行词。其中,IT 程序员尤其爱用“屌丝”一词来“自嘲”。例如,在百度贴吧里,受访者 G 这样说道:

我出生于 1985 年,参加了 3 次高考,所以比同班同学大两岁。毕业后没找到工作,靠父母过活。一年后,当了 IT 程序员。现在工作两年了,一个月挣 3000 多元,根本没动力。……人都快 30 岁了,也没有女朋友,基本啥也没有,就是一个屌丝。

在访谈中，受访者 G 主要侧重于对自身面临困境的描述。通过强调自己年纪大、生活拮据、没有希望等来强调自身的“屌丝”地位，而变成 IT 程序员并没有让他的状况有所缓解。知乎上一个称为“屌丝程序员”的群组也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提问：我是一名 IT 程序员屌丝。一个月挣不到 1 万块。女朋友想在她 30 岁前结婚，但是我没钱，更别说买房买车了，怎么办？回答：我也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来自石家庄，是 IT 程序员。本科是在一个三本学校念的，研究生读了“211”大学。家庭条件不好，父母都老了，没车没房，也是一个屌丝。找工作的时候几乎心灰意冷。在石家庄找不到工作，但是又不能把父母扔在老家不管。编程无聊又繁重，还挣这么点钱。

在诸如此类的问答交流中，屌丝多与低收入、高压，以及困惑迷茫的状态相联系。因此，诸多 IT 程序员不自觉地称自己为“屌丝”，甚至女性程序员将自己称为“女屌丝”。“屌丝”已经变成了 IT 程序员群体集体式自我表达的符号，他们同时创作了一系列的表情、符号、漫画来进一步延展对该词的认知。在乌帕德亚和瓦萨为 (Upadhyas&Vasavia,2006) 看来，印度的软件工程师趋向于个体化，缺少对工人集体身份的认同。但是，当代中国 IT 程序员对屌丝的阐释却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基于共同身份的认同。工作所带有的流动性、去技术化特点，衍生出的对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诸多论述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屌丝”这个词是一种自我表达和自我意识的阐发。李超民和李礼 (2013) 的研究表明，屌丝文化具有再创性和讽刺性，同时也具有集体性和批判性。在这种方式下，“屌丝”话语成为 IT 程序员挑战不平等、不安定境况的有力武器。

针对本文聚焦的第二个研究问题，本研究发现，码农的身份认同主要受高压力、去技术化，以及抵抗意图的影响。在莫里齐奥·拉扎拉托 (Lazzarato, 1996) 看来，现代工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工作和主体性的整合。在这种机制下，对于劳工体制性的控制从工作延伸到主体性的建构方面，涉及以往在工作以外的传播、创意以及知识结构等。通过受访者的自我回忆，我们也可以窥见 IT 程序员所经历的长时间、重复性的劳动，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界限不断模糊化的过程。虽然知识劳工是在创造性信息经济的背景下孕育而生，但本研究发现，只有一小部分 IT 程序员认为自己从事极具创造性的工作，大部分 IT 程序员则更认同“码农”这一称谓，而“屌丝”一词更是略带戏谑性地指出了他们目前面临的困境。

## 九、结论与思考

本研究从“知识劳工”的概念出发，探究了中国 IT 程序员的工作与认同，发

现了四组有关 IT 程序员身份认同的框架，详见表 1。

表 1 与 IT 工作相关的主题、特征与身份认同机制

与 IT 工作相关的主题	特征	身份认同机制
知识劳工与技术	专业主义和精英主义的认同	通过编程语言和技术展现自豪感，通过 IT 产业发展展现认同，将自己等同于数字经济下的“精英”
知识劳工与流动性	地域、流动与内化的不稳定性	内化、常规化的流动和频繁的跳槽，认为这是获得更好发展和更多机会的有效途径，并渴望获得成功
作为“码农”的知识劳工	去技术化和电子监狱式的控制	机械化劳动、重复性劳动、高强度、异化程度高，公司宽松的氛围实际上是一种软性控制
知识劳工与“屌丝”话语	“屌丝”话语；对于霸权的挑战	由低收入、低技能、低成长等话语组成，也是一种寻求集体话语和表述的行为

关于IT程序员一些特征的描述呼应了维诺和哈特关于劳动有“非物质化”的一面，以及它是“文化、信息和知识的组成部分”的论述 (Virno&Hardt,1996,p.262)。但是对于“码农”和“屌丝”的认同更多地与物质的、重复的、去技术化的工作相关。虽然哈特和奈格里 (Hardt&Negri,1994) 认为知识劳工并不仅仅是技术专家，同时也是一大批有劳动技能的知识分子，但本文的分析并没有将非物质的劳动部分凌驾于物质的劳动部分之上。作为对论文开头的呼应，本研究始终将劳动划分为物质性劳动和非物质性劳动两个面向，进而对劳动进行考量。

本文聚焦的第三个研究问题是关于中国IT程序员的“本土”经验在何种程度上拓展了目前关于知识劳工的“一般”认知。有关知识劳工的定义，中国本土IT程序员的身份认同远远超出技术性、专业性本身，而是有着和城镇化、现代化、信息化等社会转型过程密切相关的内涵与外延。正如拉扎拉托所言，信息社会下新的工作形态和工作安排产生新的权力关系。同时，中国IT程序员的身份认同也试图超越知识劳动本身，从被边缘、被忽视的视角出发来抒发自我情绪和实现赋权 (Lazzarato,1996)。根据董海军和黄启萍 (2013) 的论述，“码农”与“屌丝”话语是现代社会中集体主义表达的一种方式。对于知识劳工这个概念来说，它包含了挑战现有剥削工作制度的意涵。但是，这些话语是否能在真正意义上建立一个“真实的自由的沟通网络” (McKercher&Mosco,2007,p.xxi) 以挑战霸权式的结构和IT工作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结果却不得而知。

通过文化话语分析，本文发现了四个关于身份认同的主题：其一，技术与专业主义认同；其二，高度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其三，对“码农”的认同；其四，对“屌丝”的认同。可以看出，IT程序员针对身份认同

的话语体系并不是统一化的，而是存在内部的冲突。一方面，围绕技术为核心的话语大多涉及发展、机遇等新自由主义的内容；另一方面，传统工人处境的艰难、面临的问题和无奈也蕴含其中。

虽然中国的“码农”有着与西方“码农”相似的地方，但也存在着诸多不同，甚至有本质上的差异。例如，在分析谷歌的IT程序员时，福克斯(Fuchs,2014)就曾指出他们是一群“收入高、压力大”的群体，但本文所指涉的IT程序员却压力大、收入低、被社会边缘化。如果IT程序员群体是一个金字塔，那么中国IT程序员就居于金字塔的最底端，他们在小公司里长期从事外包的重复性劳动，而大部分的剩余价值则被大公司或跨国公司侵占。

最后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理解对于IT程序员通过个人叙述建构的四种身份认同？麦克切尔和莫斯克认为，对于知识劳工的理解应该放在“一个更广泛联结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的框架下分析”(McKercher&Mosco,2007,p.xvi)。由于中国的IT产业已经建立起了一整套以经济发展、创新、知识为主导的话语体系，这种意识形态式的话语体系使IT程序员所面临的一系列劳动问题变得不断模糊，甚至被遮蔽起来。在世界生产链末端的中国“码农”在整个IT产业的发展中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已是不争的事实。贝克和盖恩斯海姆(Beck&Beck-Gernsheim,2002)指出，现代公司在不断增强机制化和标准化的同时，也加速了个体化的进程，而IT程序员的个体化在缺乏集体性和公司制的环境下，变得更为明显。在大部分的情况下，IT程序员需要自己做出许多重要的决定。同时，随着编程工作的进一步细化，个体IT程序员承担的专业要求越来越精细，而且他们也不被鼓励去打探别人的工作情况和薪酬水平。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本文归纳出来的四个主题能够全面地概括 IT 程序员的身份特征。事实上，数字经济下知识劳工的意涵非常丰富，而本文只是以 IT 程序员为例，对一种职业人群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未来对于社会性别、阶层等进一步深化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回答如下的问题：作为知识劳工的 IT 程序员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的“码农”如何建构自身的主体性，并与国际上的其他知识劳工发生联系？

## 参考文献

- 董海军、黄启萍(2013): 屌丝流行及意蕴分析,《中国青年研究》,第1期,5-8页。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2014):《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 李超民、李礼(2013):“屌丝”现象的后现代话语检视,《中国青年研究》,第1期,13-16页。
- 项飏(2012):《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王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原书:Xiang,B.[2006].*Global“BodyShopping”:An Indian international labor system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 岳兵(2015):中国软件产业结构集中度的研究分析,《当代经济》,第18期,36-37页。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4):《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获取自<http://www1.cnnic.cn/IDR/ReportDownloads/201404/U020140417607531610855.pdf>
- Arora,A.,Arunachalam,V.S.,Asundi,J.& Fernandes,R.(2001).The Indian software services industry.*Research Policy*,30(8),1267-1287.doi:10.1016/S0048-7333(00)00148-7
- Barbrook,R.(1998).The hi-tech gift economy.*FirstMonday*,3(12),1-12. doi: <http://dx.doi.org/10.5210/fm.v3i12.631>
- Beck,U.& Beck-Gernsheim,E.(2002).*Individualization: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 and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London:Sage.

## ■ 专题一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数字时代的劳动转型

- Bel l, D . (1976 ). The coming of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The Educational Forum* ,40(4),574-579.doi:10.1080/00131727609336501
- Boylorn,R.M.(2008).As seen on TV:An auto ethnographic reflection on race and reality television.*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25(4),413-433. doi:10.1080/15295030802327758
- Carbaugh,D.,Gibson,T.& Milburn,T.(1997).A view of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Scenes in an ethnic cultural center and private college.In Kovac'i'c B.(Ed.),*Emerging Theories of Human Communication*(pp.1-24).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Das, G .(2001 ).India unbound : A personal ac count of a social and economic revolution from independence to the global information age.New York: Anchor.
- D'Costa,A.P.(2003).Capitalist maturity and corporate responses to liberalization:The stel,automobile,and software sectors in India.In Read,A.M.(Ed.), *Corporate Capitalism in Contemporary South Asia:ConventionalWisdomsand South Asian Realities*(pp.106-133). Basingstoke,UK:Palgrave Macmilan.
- D'Mel lo, M . (2006 ). *Gendered selves and identiti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fesionals in global software or ganizations in India.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12(2),131-158.doi:10.1002/itdj.20031
- Dominguez,D.,Beaulieu,A.,Estalela,A.,Gómez,E.,Schnetler,B. & Read,R.(2007).Virtual ethnography.*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8(3),3- 7.doi:10.17169/fqs-8.3.274
- Drucker,P.(1969).*The age of discontinuity:Guidelines to our changing society*. New York:Harper & Row.
- Edwards,P.(1997).*The closed world:Computers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in cold war America* .Cambridge, M A : MIT Press.
- Ensmenger,N.L.(2012).*The computer boys take over:Computers, programmers, and the politics of technical expertise*.Cambridge,MA:MIT Press.
- Florida , R . (2002 ).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 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 leisure,community and everydaylife*.New York:Basic Books.
- Florman,S.C.(1996).*The existential pleasures of engineering*.London:Macmilan.
- Fuchs,C.(2014).*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New York:Routledge.
- Gartner.(2014) *Annual Report of ICTs in China*.Gartner.Retrieved from [http:// www.gartner.com](http://www.gartner.com)

## ■ 专题一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数字时代的劳动转型

Hacker,S.(1989).*Pleasure, power and technology:Some tales of gender, engineering and the cooperative workplace*.Boston,MA:Unwin Hyman.

Hardt,M.& Negri,A.(1994).*Labour of dionysus:A critique of the state-form*. Minneapolis, MN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Iedema,R., Rhodes, C. & Scheres, H. (2005). Presencing identity: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immaterial labor.*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Management*,18(4),327-337. doi:10.1108/09534810510607038

Janz,B.D.,Colquit,J.A.& Noe,R.A.(1997).Knowledge worker team effectiveness:The role of autonomy,interdependence,team development,and contextual support variables. *Personnel Psychology*,50(4),877-904. doi:10.1111/j.1744-6570.1997.tb01486.x

Lazarato,M.(1996).Immaterial labour.InVirno,P.& HardtM.(Eds.), *Radical Thought inItaly:A Potential Politics*(pp.132-146).Minneapolis, 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achlup,F.(1962).*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arazi,C.(2011).*Capital and affects:The politics of the language economy*. Cambridge, MA : MIT Press.

McKercher,C.& Mosco,V.(2007).*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Lanham, MD:LexingtonBooks.

Mosco,V.& McKercher,C.(2008).*The laboring of communication:Will knowledge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Lanham, MD:Lexington Books.

Mukherje,S.(2008).Producing the knowledge professional:Gendered geographies of alienation inIndia's new high-tech workplace.In Upadyha,C.& Vasavi,A. R.(Eds.),*In an Outpost of the Global Economy:Work and Workers in India'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pp.50-75). New Delhi,IN: Routledge.

Sandoval,M.(2013).Foxconned labour as the darkside of the information age: Working conditions at Apple's contract manufacturers in China.*TripleC*, 11(2), 318-347. doi:10.31269/triplec.v11i2.481

Scot,J.D.(2014).*Memoir as a form of auto-ethnographic research for exploring the practice of 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in China*.*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33(4),757-768.doi:10.1080/07294360.2013.863844

Shirky,C.(2010).*Cognitive surplus:Creativity and generosity in a connected age*.

## ■ 专题一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数字时代的劳动转型

London:Penguin.

Smythe,D.W .(1977).Communications: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 (3),1-27.

Teranova,T. (2004).*Network culture:Politics for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PlutoPress.

Upadhyia,C.& Vasavi,A.R.(2006).Work, culture, and sociality in the Indian IT industry:A sociological study.*Indo-Dutch Programme for Alternatives in Development*. Retrieved from [http:// www.unikasel.de/~tduermei/iksa /readerengl/addtext%2013-Updadhya%202006%20Work %20Culture%20and% 20Sociality-1.pdf](http://www.unikasel.de/~tduermei/iksa /readerengl/addtext%2013-Updadhya%202006%20Work %20Culture%20and% 20Sociality-1.pdf)

Valk,R.& Srinivasan,V.(2011).Work-family balance of Indian women software professionals : A qualitative study .*IIMB Management Review* ,23 (1 ),39-50 . doi: 10.1016/j.imb.2011.01.006

Virno,P.& Hardt,M.(1996).*Radical thought in Italy:Apotential politics*. Minneapolis, 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Witeborn,S.(2008).Identity mobilization practices of refugees:The case of Iraqi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arin Iraq.*Journal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1(3),202-220. doi:10.1080/17513050802101781

Xia,B.Q.(2014).Digital labour in Chinese Internet industries.*TripleC*,12(2), 668-693. doi:10.31269/triplec.v12i2.534

# 中国媒介产业中实习生的困境研究： 以 S 和 X 两家大型互联网公司为例

夏冰青\*

摘要：实习生现象近年来已经成为一些新闻报道的焦点，但是相对较少的学术文献关注到中国媒介产业中的实习生现象。因此，本研究聚焦于中国互联网内容生产行业的实习生，以 S 和 X 两家大型互联网公司为案例，旨在探究中国互联网行业实习生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从数字劳工的理论视角出发，对中国媒介产业中的实习生制度进行批判性思考。

关键词：实习生；中国互联网内容生产行业；数字劳工；不稳定性

## 一、 导言

实习生问题在学术界引起广泛讨论大抵可以追溯到 2011 年罗斯·佩林 (Ross Perlin) 的《实习生国度：如何在美丽新经济体中毫无所获》(Intern Nation: How to Earn Nothing and Learn Little in the Brave New Economy) 一书。在该书中，佩林进行了一项为时 4 年的关于实习生的调查，他发现实习越来越成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大学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佩林关注了实习生对特定产业和总体经济的贡献和影响、实习经历对年轻人生活的作用，以及实习造成的社会不平等性，并批判了由实习生制度所引发的美国高等教育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

.....  
\* 夏冰青：华东师范大学晨晖学者，现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英国利兹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博士。

批判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期刊《3C: 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理论》(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and Critique) 在其 2015 年第 13 卷第 2 号的刊物上刊登了一组围绕实习话题的文章。话题包含了对实习概念的厘清 (Corrigan, 2015; Frenette, 2015; Hope & Figiel, 2015), 将实习制度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联系在一起 (Boulton, 2015; Ciccarelli, 2015; Mirrlees, 2015), 从高等教育发展来讨论实习制度 (Einstein, 2015; Ip, 2015; Smeltzer, 2015), 以及从劳工运动角度来讨论实习问题 (Cohen & de Peuter, 2015; Webb, 2015)。其中科里根 (Corrigan, 2015) 在整理现有关于媒体和文化产业实习生经验的文献基础上, 提出用数字劳工研究中的部分理论概念, 诸如自我剥削和自我推销等, 来解读实习生经验。罗迪诺—克劳希罗和贝伯里克 (Rodino-Colocino & Berberick, 2015) 提出高等教育在实习生制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高等院校不仅鼓励学生从事实习工作, 更提供学分制实习项目, 以帮助雇主转嫁劳动力成本, 实习生恰恰体现了学生与工人之间界限的日渐模糊。康帕特斯埃瑞斯 (Kompatsiaris, 2015) 通过分析“占领华尔街” (Occupy Wall Street) 运动中出现的维护“实习生劳工权利”的案例, 强调实习生与就业不稳定的工人之间团结一致的重要性。这些研究无一不向我们展示了在数字劳工领域讨论实习生制度的重要性及迫切性。

与这些辐射各大行业、融合高等教育和社会体制等话题、从多个角度分析实习生现状与未来发展可能性的研究相比, 中国关于实习生的讨论大多集中于以富士康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中的廉价“学生工” (Chan & Pun, 2010; Su, 2010; Pun & Chan, 2013)。布朗和迪康特 (Brown & deCant, 2014) 指出, 工业实习生 (industrial intern) 已经成为中国工业发展中重要且廉价的劳动力, 大量实习生在各个行业中以低于最低工资的薪酬从事着正规工厂工人的工作。史密斯和陈慧玲 (Smith & Chan, 2015) 认为, 中国目前的实习与高等教育试图提供的就业前经验相悖, 这些实

习经验往往只涉及简单的工作，与学生的学术专长几乎毫无关系。这些研究往往缺乏对大学生群体更为云集的互联网行业中实习生现象的讨论。

事实上，实习生在当前的中国媒介产业内几乎比比皆是，他们大多在媒体公司的社交媒体推广部门或小型 APP 创业公司内从事新媒体内容的生产。例如，根据新华网报道指出，在《中国青年报》2018 年的一项社会调查中，2004 名受访大学生中有 78.2% 在暑假参与了实习项目，其中不乏在各大互联网公司任职的实习生。<sup>1</sup>一方面，媒体公司雇用了大量在校实习生替代正式员工，以此来节约企业的用工成本；另一方面，实习生出于学校要求和就业压力不得不屈从低薪酬、低保障和高压力的专业性工作。本文基于现有的数字劳工理论框架，旨在探究以下两个问题：其一，中国互联网内容生产行业中的实习生在工作和生活方面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其二，如何从数字劳工的理论视角出发，对中国媒介产业中的实习生制度进行批判性思考？

##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两家分别位于上海与北京的大型互联网公司，S 和 X。2011 年，S 公司以在线娱乐为主营业务，曾一度垄断中国在线游戏和网络小说的生产领域；X 公司以社交媒体为主营业务，曾一度在中国的社交媒体行业居于垄断地位。笔者在 S 公司和 X 公司采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法。在两家公司，笔者进行了三个阶段的访谈：2010 年 2 月的 7 次访谈，2011 年 8 月的 9 次访谈，以及 2011 年 12

.....  
<sup>1</sup> 新华网 (2018 年 9 月 2 日):《实习是为了刷简历?高成长实习机制如何构建》,获取自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9/02/c\\_1123366095.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9/02/c_1123366095.htm)。

月的5次访谈。除此之外，笔者在2011年8—11月，以实习生身份进入S公司进行了参与式观察。同时，笔者还邀请X公司的一位员工（小原[匿名]）进行了自我观察。小原一直有撰写工作日志的习惯，他非常慷慨地提供给笔者他在2009年9—12月的所有工作日志进行研究。通过这些混合的定性研究方法，笔者对中国媒介产业中的实习生参与中国互联网内容生产的过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分析。

在此，笔者要特别说明，在S公司的参与式观察属于隐蔽式研究（covert research）。这里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在2011年左右，中国互联网公司倾向于拒绝参与学术类研究，除非该研究能为他们带来切实的商业利益，显然笔者批判取向的实证研究并不符合这一倾向。事实上，在成功进入S公司之前，笔者曾采用个人投递简历和朋友推荐这两种方式尝试进入几家大型互联网内容生产公司，最终都因笔者明确表达自己的申请动机——为研究进行数据收集而遭到拒绝。其次，因为笔者的研究不仅关注进行互联网内容生产的专业数字劳工的工作和生活质量，而且还关注这些数字劳工的能动性。笔者相信只有通过隐蔽式的观察，才能在不影响这些数字劳工日常动态的情况下，尽可能真实地观察到他们“真正的”能动性。

但不可否认的是，隐蔽式研究必然带来一系列伦理问题。比如，笔者在观察过程中不止一次感觉到自己在“欺骗”参与者：很多参与者与笔者分享他们的个人故事，是因为他们将笔者视为朋友；然而笔者很难准确地辨析在聆听这些故事的时候，自己是研究者还是他们的私人朋友，这让笔者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尽管时至今日，这种“欺骗感”依然不可避免地折磨着笔者，最终笔者决定在相关的研究中有选择性地使用这些材料，因为这些材料有助于理解中国互联网内容专业生产者的经历以及他们给产业和社会带来的影响。

当然，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该研究的参与者，在下面的文本中，笔者尽可能地隐去所有涉及研究参与者隐私的信息，包括他们所在的公司、就读的学校、所处的职位以及姓名等。在本文发表之前，笔者也征求了文中涉及的主要参与者的同意，以便在这篇论文中分享这些故事。笔者希望，该研究的参与者能够理解笔者进行隐蔽式研究的动机及其可能带来的益处，而原谅笔者当初的“欺骗”。

### 三、实习生的喜乐与哀愁

单从工作时间来看，大多数互联网内容生产公司的实习生应被视为全职员工。布朗和迪康特 (Brown & deCant, 2014) 发现，Wintek 公司（向苹果和诺基亚提供产品的公司）的实习生通常每天工作 11 小时，每周工作 7 天。在 S 公司，实习生被要求像全职员工一样连续工作。S 和 X 两家公司的实习生很少有机会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大多数实习生遵循着全职员工的工作模式。很多实习生和全职员工一样，经常被要求加班。

我在正式入职 (X 公司) 前实习了 5 个月。所有在毕业前拿到 offer 的新员工……都必须实习。我的头儿希望我多干点活，就让我比其他人再早一点实习。（小原，X 公司技术类职位，2011 年 8 月 24 日，北京访谈）

我在实习生的时候干的活更多。我们当时 3 个实习生被要求做 7 个人的工作……（威廉，X 公司技术类职位，2011 年 8 月 26 日，北京访谈）

因为实习生往往是在校生，需要兼顾学校课业，从基本逻辑来说，实习生比全职员工更需要灵活的工作时间。然而事实却是，很多实习生的假期都得不到团队组长的批准，因为有时候他们的工作关系到公司的日常运作。比如，笔者在 S 公司实习时的同事小珍，她当时已经临近硕士毕业，所以需

要经常请假写论文和参加正式工作的面试,但由于她的工作是负责新员工入职,不定期的新员工入职导致她的假期经常得不到团队组长的批准。最终她决定辞掉实习生工作专心完成论文,然而当时的公司要求她必须找到新实习生接替她的工作后才允许离开。这一无理的要求体现出公司将寻找新员工的责任转嫁给小珍这个实习生,同时还表明,实习生不仅没有所谓的“灵活的工作时间”,甚至连退出实习这一基本的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

S公司和X公司的实习生尽管从事着和全职员工一模一样的工作,甚至在工作时间的灵活程度上受到更不公平的待遇,但是他们从来都无法得到同等的报酬,他们的工资比全职员工要低很多。比如,S公司的实习生日薪是120元,没有任何加班费,与之相比,全职员工的平均月薪大概是1万元。总体来说,实习生的工资低于全职员工的一半。S公司和X公司都将实习生视为替代全职员工的廉价劳动力。例如,据小珍说,当时公司人事部门需要为技术部门招聘一些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的翻译人员,但是在询问了一些面试者的理想薪酬以后,她的组长决定招聘主修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的实习生来完成这项工作,原因是全职翻译要求的薪水远远超出了公司的预算。显然,实习生在这种情况下被视为替代全职员工的最理想的廉价劳动力。而在结束实习之后的一个月,笔者联系S公司的一位同事,她告诉笔者,人力资源部门的40名全职员工中已有30人被解雇,包括她在内。相比之下,所有实习生都被留下,用来顶替全职员工。正如佩林(Perlin,2011)所揭示的,实习生成为雇主“以低成本或零成本考验年轻员工”的理想替代方案。然而,实习生与全职员工类似的工作量并不能保证他们和全职员工拥有一样的地位。相反,实习生往往是公司中的弱势群体。

大多数实习生都按我们说的做。他们做我们给的(工作)……他们和我们是两个群体,(毕竟)他们还是学生,不是专业人士……他们是……二等公民。(小原,X公司技术类职位,2011年12月20日,北京访谈)

根据小原这一类全职员工的说法，他们才是真正控制生产过程的人，而实习生更多的只是“机械的”执行者。这种全职员工与实习生之间的矛盾在笔者的观察过程中时有发生。比如，当时在S公司实习生群体中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是，一个在S公司工作了3个多月的实习生本来已经收到公司正式工作的offer，但最终被拒绝，仅仅是因为她实习时期的团队组长不喜欢她。当她收到这一消息的时候，大部分的校园招聘都已结束，这就意味着她在那一年并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必须再等一年。在这种情况下，一名全职员工甚至拥有对实习生的“生杀大权”。

有时候，实习生需要为全职员工的“失误”而负责。例如，小珍有一次被她的团队组长责骂，原因是在小珍休假期间一名新员工找不到负责人办理入职。尽管小珍和组长争辩说当时她在休假，这不属于她的工作失误，但因为她是组里唯一的实习生，所以最终的责任归咎于她。正如小珍所述，凡是出错就一定是实习生的错。笔者在S公司还发现，实习生、全职员工和团队领导分别有自己的“午餐用餐区域”：团队领导经常一起开车去上海市中心的餐厅，全职员工通常会去软件园中心的餐厅，而实习生通常会去地铁站附近的廉价小吃店。大多数员工会自动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用餐区域”，很少有全职员工或实习生和团队领导一起去吃饭。

实习结束以后，大多数实习生都希望得到转为正式员工的机会，但是转正往往由“人情关系”决定。在边燕杰看来，关系在中国社会中贯穿了从进入工作到工作内部流动的各个环节，有关系的人能够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关系网络往往会约束那些“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Bian,2002, p.107)。戈尔德等同样指出，关系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基本要素，与中国社会的一些重要问题关联密切，如“感情用事”“人情”“面子”“礼尚往来”等(Gold et al.,2002,p.4)。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要想在一家公司获得晋升，与上级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必要条件。同样的，“关系”在短期内帮助

毕业生摆脱激烈竞争从而找到好工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且积极的作用。

在互联网内容生产行业中，这种“关系”法则依然生效，比如，笔者在S公司观察到的4名实习生的最终去留问题恰恰对应了这一法则。小珍、小莉、小溪和小雪是笔者在S公司最为亲近的4名实习生，她们都是来自于上海各大名校的硕士研究生，也都希望在毕业后能留在S公司成为全职员工。但是在四轮面试结束后，只有小溪和小雪获得了正式职位。尽管小珍得分最高，但因为她与上级的不良人际关系而导致落选。小溪在第一轮面试中就遭到拒绝，但是因为她与团队组长有着良好的关系，而新上任的组长急需一名忠于她的新人，使得她被破格录取。小雪在第三轮面试中也被刷下来，但因为她与一位高管关系较为紧密，最终人事部门还是选择录取她。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正如前文所提及的那样，拥有强大人际网络的求职者往往比那些关系薄弱的求职者有更多获得好工作的机会，无论后者拥有多么优秀的技能。而在上述案例中，笔者还想补充，所谓的“人际关系”不仅包含实习生与上级之间的私人关系，还包含“职场政治”，比如，小溪获得职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来的团队组长需要拉拢下属来确保自己的利益。

以上种种看似不公平的工作待遇引发了值得进一步思考的两个问题：为什么仍有大批学生涌入实习市场？即便实习市场存在着诸多不公平的工作待遇，学生为何仍对这一市场前赴后继？

#### 四、谁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无酬劳工”？

目前关于数字劳工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研究议题：针对专业劳工被剥

削的讨论 (Gill,2002;Ross,2008;Qiu,2009;Hesmondhalgh,2010;Kennedy,2012;Xia,2014) 以及将受众视作被剥削的劳工的讨论 (Barbrook,1998;Hills,2002;Fuchs,2015)。前者多集中于批判资本对不同数字领域中专业劳工的剥削,后者则多集中于批判数字资本主义对受众从时间到数据方面的不同程度的剥削。将受众视作被剥削的劳工的讨论源自达拉斯·斯麦兹 (Dallas Smythe) 的受众商品论,巴布鲁克 (Barbrook,1998) 关于礼物经济 (gift economy) 和特拉诺瓦 (Terranova,2004) 关于无酬劳工 (free labour) 的讨论正式将受众能动性纳入数字劳工的讨论范畴。意大利的自治马克思主义学派 (autonomist Marxist) 更是将无酬劳工和非物质劳工 (immaterial labour) 的概念发扬光大。福克斯近些年致力于将这类非专业劳工与专业数字劳工融合在一起,倡导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批判性地解读资本对上述劳动力的剥削 (Fuchs,2014)。

区别于“受众劳工论”对数字时代普通用户的研究,关注专业数字劳工的讨论首先涉及对不同类型数字劳工的定义。从佛罗里达 (Florida,2002) 的创意阶级 (creative class) 到麦克切尔和莫斯可 (McKercher & Mosco,2007) 的知识劳工 (knowledge labour) 再到赫斯蒙德夫 (Hesmondhalgh,2010) 的创意劳工 (creative labour), 尽管学者们的定义各不相同,但都将这些专业数字劳工的工作生活与批判资本主义体系联系在一起。赫斯蒙德夫提出,现有关于无酬劳工的辩论只是将注意力停留在相关行业的就业与职业问题,而未能关注专业劳工对抗压迫性工作条件的潜能 (Hesmondhalgh,2010)。他进一步质疑“无酬劳工”这个概念的批判有效性:无酬劳工关注的受众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剥削这一概念?在数字时代,免费提供个人使用时间和数据以供资本积累是否是最值得研究者关注的议题?

在赫斯蒙德夫看来,与饱含争议的受众被资本剥削的论断相对应,媒介产业中真正体现不公正的是实习生体制。他指出,年轻人愿意接受相当长时间的无酬工作完全是因为对创意劳动的过分推崇导致的“供过于求”的结果。

而无酬实习生制度的普遍化降低了全职员工的待遇，同时也使媒介产业加深了社会的不平等性：只有来自富裕家庭的年轻人才能在没有工资的情况下从事实习。而越来越多的高校媒体教育将实习列为获取学位的必要课程也使年轻人迫切希望从事这一无酬工作。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赫斯蒙德夫认为这种将年轻人作为媒介产业中无酬劳动力的做法实际上牺牲了他们可能花在探索创意和拓宽知识视野上的时间。而这种对未来创意与发展的探索过早地被行业日常化、琐碎化的工作所侵蚀，最终将无法促进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笔者认同赫斯蒙德夫的观点，认为现有关于数字劳工，尤其是无酬劳工的研究过多地关注了受众群体，如互联网用户。相较于这些因为花费大量时间在互联网上而为资本累积与再生产提供无酬劳动力的互联网用户而言，那些承受着低薪酬、高工作强度与压力、不公正待遇的高校实习生更值得研究者关注。

邱林川描绘了中国自汉代以来的教育系统发展的历史图景，重点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的教育体制改革。这一改革政策倡导将国家义务教育扩大到“农民和工人无产阶级”中(Qiu,2009,p.135)。尤其是1999年颁布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和“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两项政策，极大地扩展了大学教育的覆盖范围。这一教育改革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问题：大学学位质量因大量毕业生而受到冲击；大学学位质量的下降造成就业困难，以及就业市场的激烈竞争孕育了廉价的实习生等。

2011年的毕业生就业问题使该年再度被贴上“最难就业年”的标签，小珍所在的上海重点院校在这一年也无法幸免。据小珍所在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的一名老师透露，该校2011年的毕业生起薪已经降至3000元，甚至低于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即便如此，小珍的朋友所在的德语班当年毕业生中只有1名学生收到安利销售员的offer。而小珍从她数百次工作面试经历中发现，

每 10 位应聘者中几乎有 7 位拥有硕士学历，且大多是“海归”。因此，就业困难对毕业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毕业生不仅需要有良好的学习成绩，更需要在毕业前积累大量工作经验，比如实习经验。换言之，教育贬值导致的就业竞争激烈迫使这些学生即便在知道自己的劳动力免费或是以最低成本被资本征用的情况下，仍旧义无反顾地投入资本市场的怀抱，成为一名实习生。

赫斯蒙德夫指出的实习生制度加深了媒介产业中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在中国语境下，这一问题与城乡不平等问题是紧密相关的。诚如赫斯蒙德夫所述，只有来自富裕家庭的年轻人才能承担没有工资，甚至需要自己支付高昂生活费用的媒体实习工作。中国大学生群体中的农村学生为此付出了更高的代价。小珍的朋友小雅来自西安的一个农村家庭，为了筹措她的大学学费，家人向所有亲戚借钱；而为了支付在上海的高昂生活费用，她将本科至研究生阶段的所有空闲时间都花在实习上，无论这些实习是否与她的专业技能有关。即便拥有这 6 年半间形形色色的实习经历，2011 年临近毕业的时候，小雅还是没能找到工作。而当小珍告诉笔者小雅因为缺乏生活费而向她要一些自己煮的粥当做午餐的时候，那种夹杂着悲哀、同情、沮丧的复杂感受，时至今日在笔者写下这篇文章之时，仍然记忆犹新。

除此之外，新媒体行业中的实习生在遭受公司“宰制”的同时，他们在校园中学习和生活的境况又何如？实习生的导师是否给予他们最大的支持来帮助他们摆脱上述困境，抑或是运用校园中导师制度所赋予他们的“生杀大权”对学生劳动力进行免费的征用？师生权力的高度不平等性问题与数字劳工研究，尤其是无酬劳工研究相关联，这是否能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实习生制度存在的种种问题？

大学作为社会的缩影，其中不乏来自经济水平和教育资源落后的农村地区的学生，而付出与收获极为不平等的实习生制度让这些原本已挣扎在基本生存

线边缘的学生丧失了基本的拒绝机会，更遑论思考实习制度是否合理。而作为学者，当我们批判性地用数字劳工这一理论资源解读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时，是否忽视了我们身边这群近在咫尺的、更值得用数字劳工框架去批判性解读的群体呢？这一问题也值得当下关注数字劳工议题的研究者时时扪心自问。

本文为华东师范大学 2018 年青年高层次项目（项目编号：41300-20101-222231）成果之一。

## 参考文献

- Barbrook, R.(1998).The hi-techgift economy.*First Monday*,3(12),1-12. doi: 10.5210/fm.v3i12.631
- Bian,Y.J. (2002).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8(28),91-116.doi: 10.1146/annurev.soc28.110601.140823
- Boulton,C.(2015). Under the cloak of whiteness: A circuit of culture analysis of opportunity hoarding and colour-blind racism inside U.S. advertising internship programs. *TripleC*, 13(2),390-403. doi: 10.31269/triplec.v13i2.592
- Brown,E.V. & deCant,K.(2014). Exploiting Chinese interns as unprotected industriallabor. *Asian-Pacific Law & Policy Journal*, 15(2),150-195.
- Chan,J.& Pun,N.(2010). Suicide as protest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migrantworkers: Foxconn, globalcapital, andthestate.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8(37),1-33. doi: 10.5281/zenodo.999866.
- Ciccarelli,R. (2015). Expo Milano 2015: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working for free in Italy. *TripleC*, 13(2),423-427. doi: 10.31269/triplec.v13i2.703

- Cohen,N.S. & de Peuter, G. (2015). Challenging internation: Roundtable with intern labor activists in Canada. *TripleC*, 13(2), 587-598. doi: 10.31269/triplec.v13i2.701.
- Corrigan,T.F. (2015). Media and cultural industries internships: A thematic review and digital labor parallels. *TripleC*, 13(2),336-350. doi: 10.31269/ triplec.v13i2.608
- Einstein,M. (2015). Nothing for money and your work for free: Internships and the marketing of higher education. *TripleC*, 13(2),471-485. doi: 10.31269/ triplec.v13i2.595.
- Florida,R. (2002).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Washington Monthly*, 35(5),593-596.
- Frenette,A. (2015). From apprenticeship to internship: The social and legal antecedents of the intern economy. *TripleC*, 13(2),351-360. doi: 10.31269/triplec.v13i2.625.
- Fuchs,C. (2014).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NewYork: Routledge.
- Fuchs,C. (2015). *Culture and economy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NewYork: Routledge.
- Gill,R.(2002). Cool, creative and egalitarian? Exploring gender in project-based new media work in Euro.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5(1),70-89. doi: 10.1080/13691180110117668.
- Gold,T.,Guthrie,D., & Wank,D. (2002). *Social connections in China: Institutions, culture,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guanxi*.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smondhalgh, D. (2010).*User-generated content, free labour and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Ephemera*, 10(3-4),267-284.
- Hills, M. (2002). *Fan cultures: Sussex studies in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London: Routledge.
- Hope, S. &Figiel, J. (2015). Interning and investing: Rethinking unpaid work, social capital and the “human capital regime”. *TripleC*, 13(2),361-374. doi: 10.31269/triplec.v13i2.607.
- Ip, I. C. (2015). Negotiating educated subjectivity: Intern labour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HongKong. *TripleC*, 13(2),501-508. doi: 10.31269/triplec. v13i2.596

- Kennedy, H. (2012). *Network: Ethics and values in webdesign*.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Kompatsiaris, P. (2015). Art struggles: Confronting internships and unpaid labour in contemporary art. *TripleC*, 13(2), 554-566. doi: 10.31269/triplec.v13i2.613
- McKercher, C. & Mosco, V. (2007).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 Mirrlees, T. (2015). Reality TV's embrace of the intern. *TripleC*, 13(2), 404-422. doi: 10.31269/triplec.v13i2.605
- Perlin, R. (2011). *Internnation: How to earn nothing and learn little in the brave neweconomy*. London: Verso.
- Pun, N. & Chan, J. (2013). *The spatial politics of labor in China: Life, labor, and a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112(1), 179-190. doi: 10.17605/OSF.IO/JFZY2
- Qiu, L.C. (2009). *Working-class network society: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formation have-less in urban Chin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Rodino-Colocino, M. & Berberick, S.N. (2015). "You kind of have to bite the bullet and do bitch work": How internships teach students to unthink exploitation in public relations. *TripleC*, 13(2), 486-500. doi: 10.31269/triplec.v13i2.599.
- Ross, A. (2008). The new geography of work: Power to the precarious?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5(7-8), 31-49.
- Smeltzer, S. (2015). Interrogating course-related public interest internships in communications. *TripleC*, 13(2), 509-525. doi: 10.31269/triplec.v13i2.621
- Smith, C. & Chan, J. (2015). Working for two bosses: Student interns as constrained labour in China. *Human Relations*, 68(2), 305-326. doi: 10.1177/0018726714557013
- Su, Y.H. (2010). Student workers in the Foxconn empire: The commodification of education

and labor in China. *Journal of Workplace Rights*, 15(3-4), 341-362.

Terranova, T. (2004). *Network culture: Politics for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PlutoPress.

Webb, W. (2015). Ontario interns fight back: Modes of resistance against unpaid internships. *TripleC*, 13(2), 589-586. doi: 10.31269/triplec.v13i2.581

Xia, B.Q. (2014). Digital labour in Chinese internet industries. *TripleC*, 12(2), 668-693. doi: 10.31269/triplec.v12i2.534



专题二

## 《一丝偶然》：中国崛起与性 / 别政治

## 编者按

刘奕德\*，罗丽莎\*\*

自“中国走出去”成为国家主导政策以来，中国已成为最大的南南合作供应方，也是非洲、拉美、东南亚和中东欧的主要投资者。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国在全球南方的活动一直是各种批判性评论的主题，而且常常被形容成中国的新殖民主义。然而在这些讨论中，人文学科的观点一直很缺乏，更重要的是学者们对性与性别在“中国在南方”这个议题中扮演的角色一直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中国在南方的发展到底是不是一种变相的新殖民还有其它充满争议性的议题，就必须借助人文学科的观点来重新看待性与性别的问题。中国今天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是文化上的。在这个过程中，电影、文学，跟其它文化产品不断在制造和反映出的叙事提供了非常宝贵，非常有启发性的一些线索。

这一系列文章是波士顿大学的刘奕德教授 (Petrus Liu) 与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的罗丽莎教授 (Lisa Rofel) 合编的文化批评系列的第二部分。这个系列的起源来自罗丽莎和中国人民大学的黄盈盈教授在 2017 年 9 月 15 日到 17 日之间在北京召集的“中国与全球南方：性与性别的核心角色”研讨会。这个研讨会聚集了近百名学者、社会运动者，和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来交流他们对这个议题的想法和观点。从这个研讨会的脑力激荡，我们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近期中国大片《战狼 2》的文章，探讨它如何同时体现和促成了在重塑它与全球南方关系中，中国对性别与性的独特解读。《战狼 2》呈现的主要是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关系。这一次，我们则要求参与者们针对一部拉丁美洲电影来分享他们的想法。

.....

\* 刘奕德 (Petrus Liu) 波士顿大学比较文学系，妇女与性 / 别研究系副教授。  
\* \* 罗丽莎 (Lisa Rofel) 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 人类学系教授。

## ■ 专题二 《一丝偶然》：中国崛起与性 / 别政治

《一丝偶然》(Un Cuento Chino)是一部由塞巴斯蒂安·波连斯坦(Sebastián Borensztein)执导的2011年阿根廷电影，也是那一年阿根廷非美国电影的票房冠军。它讲述了一个关于一位孤僻的中年阿根廷男人和一个年轻的中国移民之间的奇特相遇和意外羁绊的故事。这部电影探讨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包括阿根廷对华人的种族歧视，也反映出中国兴起后阿根廷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焦虑。无疑地，这部电影反映出的中国情结与华人移民阿根廷的漫长历史和近来中国公司以获取自然资源为目的的大规模投资关系密切。通过对《一丝偶然》的不同解读，本系列文章的作者为中国如何重构自己在全球南方的定位以及它如何通过特定的性别与性相的再现与图像来实现这种重构提供了理性的分析。

这里大部分的文章先由英文写成。中文的翻译，由郭漪舟以及各篇文章作者协助完成，在此一并致谢。



## 由《一丝偶然》 重新看“种族歧视”与“性别”问题

刘奕德\*

《一丝偶然》是一部相当复杂的电影。它有一个很明确的正面企图，即透过反映阿根廷大众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促成一般观众对于这个问题的反思。在这一点上，这部电影是有它不可否认的正面价值的。然而在同时，《一丝偶然》却又吊诡地复制了另一种不同的种族主义思维。

要理解这两种思维之间复杂的逻辑是如何形成的，我们首先需要思考这部电影里面的性别论述，以及它所使用的替代和置换的修辞结构。《一丝偶然》有两个主角，都有各自异性恋的浪漫发展。他们个别的故事其实不重要，电影的重点在于这两个人故事的对称性。主角罗伯托是一个坏脾气的阿根廷中年人。因为一段充满创伤的过去，他无法与他人建立完整的恋爱关系。他的母亲生他时死于难产，而父亲则因为误以为儿子已经葬身福克兰群岛战争<sup>1</sup>的战火而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同时，罗伯托也因为曾在那场无意义的战争中杀死了许多无辜的人而深受着折磨。电影的另一个主角俊，则是一个只身来到阿根廷寻亲的中国人。在来阿根廷之前，他的未婚妻死于一场难以置信的，甚至有些荒唐的意外（一头奶牛从天而降砸死了她）。二人各自的现在都是由于他们过去经历中的暴力事件所触发与形成的。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却是倒置的：罗伯

.....  
\* 刘奕德 (Petrus Liu)，波士顿大学比较文学系，妇女与性 / 别研究系副教授。

1 编者注：福克兰战争（英语：Falklands War）又称为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西班牙语：Guerra de las Malvinas），是指1982年4月到6月间，英国和阿根廷为争夺英方称之为福克兰群岛（阿根廷方面称为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而爆发的一场局部战争。

托因为早年失去家人的悲剧导致如今在异性恋爱情的战场上裹足不前的矛盾，而俊却是因为失去了已经论及婚嫁的异性恋伴侣，才重新感受到家人的重要，千里迢迢来到阿根廷寻找多年不见的大伯。在第一个例子里，家庭的影响决定了一个人爱与被爱的能力，而在第二个例子里，一段爱情的挫折影响了一个人对家庭的认知与需要。

在一次偶然的相遇之后，罗伯托心不甘情不愿地开始带着俊寻找他的大伯。这本来是一个带着优越感的白种人“帮助难民”的简单故事，但在罗伯托帮助俊的过程中，罗伯托自己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改变。因为俊的关系，罗伯托克服了过往的创伤，重新在异性恋关系中成为一个可以与人亲近，拥有爱与被爱的能力的伴侣。这部电影的开场是俊的未婚妻的死亡，结束则是罗伯托开车到一位女性的住处，隐隐约约要发展一段恋爱关系的场景。这两个人显然在彼此倒置的经验和人生旅程上互为陪衬：丧失爱人促使俊远赴阿根廷与家人团聚，而罗伯托则从被对逝去双亲的缅怀所困住的独行侠进化为一个终于能够去爱另一个人的男人。如此看来，虽然他们在性倾向上都是异性恋，促成罗伯托转变的主要原因则是他和俊之间的同性社会性联结（homosociality）。换句话说，罗伯托之所以能够重新学会如何再去爱另一个人（女人），是透过这几个月以来，他跟俊同吃同住，互相关心，互相扶持的生活经验。弗洛伊德曾下过这个著名论断：“发现爱的对象的过程其实是对它的再次发现。”（“The finding of the love object is in fact a refinding of it”）<sup>2</sup> 弗洛伊德的意思是说成年人生活中所发展的爱的关系实则是在重新激活被遗忘和压抑的与母性对象曾经的联结。在《一丝偶然》中，我们看到了类似的过程，但是对于弗洛伊德的名言我们也有作出一定的修正：对爱的能力的重拾既不来自异性恋起源，也不必然与俄狄浦斯情结有关。它来自于同性社会性关系，而不是一个失落的母性联结。这种同性社会性关系提

2 Freud, Sigmund.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New York: Norton and Co., 1990 [1905].

供了对爱的能力的一种“酷儿监护”（queer tutelage）。

虽然影片对于罗伯托的内在心理做了细致的分析和呈现，《一丝偶然》想要讲的并不是一个个人的故事。罗伯托只是一个符号。我们四周都有罗伯托，他代表的是阿根廷的普罗大众。虽然罗伯托看似是个孤僻的怪人，但他的精神却代表了我们所谓的“日常人”（the everyman）或普通人。在很大程度上，这部电影保留了明显的寓言式结构，借此对当代阿根廷社会的排华情节和种族冲突作出尖锐的评论。电影的主旨是想要借由罗伯托的视角和他的人生转变来捕捉一些在阿根廷常见的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在电影开端，俊被从一辆行进的车里给扔了出来。接下来的故事中，一个接一个的阿根廷人对俊冷眼相待。但是这真是一部反种族歧视的电影吗？当《一丝偶然》尝试再现并批判这种种族敌意的同时，它又不断地把“中国”异化，塑造成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他者”（Other）。华人移民到阿根廷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阿根廷有大量的华人是能说中文也能说西班牙语的公民，而在阿根廷建国历史里，华人也创造了不可否认的贡献。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这部电影用的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二元分歧：主流就是讲西班牙语的白种人，华人则是永恒的他者。透过这种二元分歧，《一丝偶然》不断把华人打造成永远不会说西班牙语，无法进入主流社会的外来份子。俊和其它华人讲的所有中文对话，导演都故意不配上西班牙字幕，刻意凸显中国话的外来性，使得他们的交谈都像猩猩之间的互动一样原始和不知所云。对于一个不会讲中文的普通阿根廷观众来说，这部电影中所有俊说的话都只是没有意义的噪音。罗伯托是有感情、有思考、有过去，有复杂内心纠纷的白人；相对地，俊变成一个失去语言，夸大又不知所云的装饰品。从导演的角度来看，他在电影里用中文说了什么不是不能翻译，而是完全不重要。也就是说，虽然电影对中国移民似乎充满同情，但它又不自觉地复制了另一种层次的排华情绪。而这种比较复杂的，无意识的歧视，

只有在我们先分析了罗伯托和俊之间发展的平行寓言式结构和同性社会情谊才能了解。

严格讲起来，导演跟制片人对于中国、中文，以及中国人的认知和呈现都是最粗糙的。在拍这部电影之前，他们完全没有花任何功夫得到一些对中国，或甚至亚洲的基本知识。首先，俊在这部电影里体现的不是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而是过去对于中国移民工人的刻板印象：除了会干体力活外一无所长，也没什么有意思的品质。但诡异的是，电影却又将他浪漫化成一个伪艺术家，变成不伦不类，没头没尾的剧情。电影完全没有探讨今日中国在社会问题与阶级方面复杂的多样性。除了最粗浅的常识，电影的制作方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而他们所呈现的也就是一堆东拼西凑，年代混乱的拼贴画。比如说，在片头出现的俊的未婚妻身穿旗袍，顶着一个让她看起来像上海 20 世纪 30 年代海报的发型，而她理应是一个来自中国农村，平日不怎么出门活动的妇女，是不可能这样打扮的。这部电影穷尽了各种手段来渲染俊的中国特色。无论是从它的片名，还是开场时东方主义式的画面，或是他作为中国人，在阿根廷所遭遇的不公平待遇等等。虽然这部电影以“中国”作为它的题材，同时又对中国移民在阿根廷的处境表现出同情的姿态，其实它对于了解真正的当代中国是完全没有兴趣的。最夸张的例子，则是来自于那本神秘的护照。当俊在警察局拿出他的护照时，画面中展现的证件（出现在 22 分 47 秒）却是一本台湾护照，用繁体中文写着“中华民国”。仔细放大之后可以看到这本护照其实是俊的扮演者黄尚煌自己的，上面用中文写着他的真名，而英文部分则被改成角色的名字 Qian Jun。就算是从预算角度考虑，要弄到一个正确的道具绝非难事。因此这绝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上的懈怠，或纯粹的无知。任何一个对于当今中国有粗浅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关于台湾身份的问题，也就是台湾到底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的问题，是当今最具争议和最敏感的话题之一。该片在一个这么重

要的片段中让一个“中国人”使用台湾护照作为道具，清清楚楚地呈现了它对于当代中国的复杂性的完全不敬与无视。显然，罗伯托和俊都应被寓言式地解读为代表阿根廷与中国各自问题的社会典型。但是对于一部旨在教育公众正视他们的种族歧视，并坚持要从国籍上理解人物的电影，它对台湾和中国元素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恰恰延续了另一种种族主义和暴力的秩序。

# 一个中国故事<sup>1</sup>

## ——还是一个有着中式扭曲的阿根廷故事？

萨拉·哈尼施\*

受到《温州一家人》这类中国出品的影视作品的影响，我以为《一丝偶然》会是一个关于阳刚英雄的故事，讲述一个单身的男性移民如何在异国克服万难。事实上，在一头奶牛从天而降砸死了中国籍主角俊的未婚妻这一怪异场景之后，电影所呈现的在阿根廷发生的事的确是一个众人皆知的故事。初来乍到，俊就被洗劫一空。由于他完全不会讲西班牙语，他也没法找到他的大伯，而被困在街头。和其他那些倒霉的移民不同，他碰见了可怜他的罗伯托施以援手。不过，《一丝偶然》和阳刚英雄故事的相似之处到此为止了。

接续而来的是一系列对罗伯托的详细刻画，包括了他与玛丽的复杂关系，他与顾客、与警察、与俊的关系。罗伯托是个坏脾气男人，有着古怪的爱好和对日常生活严严苛的坚持。他基本上回避各种社会性接触并坚持相信生活没有任何深刻的意义。玛丽则是一个乐观的女人，对罗伯托颇为倾心，以心相许。她在罗伯托和俊之间扮演着调节者的角色，在她的调节下，二人关系日渐亲密。直至电影的四分之三处，俊都实践着一个踏实移民该有的样子，完成每日安排给他的工作。因为语言的障碍，他通常都相对沉默，无法与他的房主或玛丽沟通。

.....  
\* 萨拉·哈尼施 (Sarah Hanisch)，德国科隆大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1 译者注：电影的西班牙语原名 Un Cuento Chino 直译为“一个中国故事”。作者在题目中使用的即为其英语直译。

但他的沉默并不代表他对周边环境漠不关心，或无法理解他的房主的情绪情感。相反，俊证明了他不仅能够理解他的主人的复杂感情，并最终能以一种颇为反常的方式说服罗伯托，生活是有意义的。通过将这个跨文化相遇转化为一个关于寻找生活意义的故事，该片强调了在全球南方的中国移民不仅仅只和“经济机会主义”，文化冲突和相互理解的缺失相关。

这部电影为阿根廷和中国的相遇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角，因为它关注的是情感。这一重点使得电影得以将现有的对在全球南方的中国移民和中国政府的性别叙事复杂化。我们在这部电影中看到的并不是一个一心扑在发家致富上的强大而阳刚的移民，而是一个为他自己和他人求索着生命意义的敏感而孤独的移民。有趣的是，和《战狼2》不同，大使馆所代表的中国政府在这里并不扮演一个全能全知的阳刚的保护者，保护着他的公民。大使馆在这里被表现为一个自私和懒惰的机构，对俊的绝望无动于衷。中国政府也许想将自己描述为中国公民的保护者，但是实际上，无论是电影，还是我在莱索托的田野调查都体现出对于那些感到孤立的中国公民来说，政府基本一无是处。当政府的帮助缺席时，像俊这样的中国移民只能依仗像玛丽和罗伯托这些本地人的帮助。玛丽和罗伯托自愿伸出的援手体现了中国移民并不总是被人们视作那些毁掉本地经济的，讨厌的入侵者。

对于像我这样的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学者来说，该片在对背景的描绘上有失公允。电影对阿根廷的日常生活做了事无巨细的描绘，而发生在中国的场景区则完全无意消除对中国异国化的想象。由此，该片复制了将中国视作异国的、落后的他者的阴柔化描绘。电影创作者应用了一系列许是从山水画借来的所谓“中国式”景观的能指：一对情人，穿着中国传统服饰，泛舟湖上，被桂林山水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环绕。这些能指使得西方观众能立即“认出”中国。然而，如果俊是来自福建省福清，正

如电影所告诉我们的，那么他的家乡应该跟电影里所呈现的完全不一样。在认真研究了福清的情况后，我得知那里几乎每一块地皮都被用于稻米和渔业等农业用途（从来没听说畜牧业，更别说偷盗牧场牲畜了）。工业园区和房产发展则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发展起来。受到香港流行文化和海外侨胞故事的影响，年轻人更愿意穿牛仔裤，戴超黑墨镜。年轻的情侣更多时候在县城里的咖啡馆和卡拉ok厅打发时光，而不是在早已严重污染的龙江河上泛舟。也就是说，福清完全与电影里出现的那些“传统”中国的符号无关。如果电影能够在呈现地域特色和差异性的中国形象上多花些功夫，也许它希望讲述一个不同的故事的愿景能够被传达得更加清晰。

## 《一丝偶然》之我见

罗丽莎\*

塞巴斯蒂安·波连斯坦的《一丝偶然》面向的是阿根廷本国观众。通过两套叙事框架，波连斯坦用这部喜剧让阿根廷人去反思他们对待移民，尤其是对待中国移民时的种族歧视。第一重框架来自于经典的同性社交性动态结构（homosocial dynamic）。伊芙·塞吉维克（Eve Sedgwick）在《男人之间：英国文学与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中提出了现代西方文学所内含的同性社会性，证明了男性之间也存在着爱，揭示了所谓的同性恋与异性恋二元对立的虚构本质。塞吉维克认为，在文学作品里男人之间的爱往往被一个女人的在场部分无形化，而导致他们被描写为异性恋。在《一丝偶然》中，这种同性社会性关系体现在一个年长的白种阿根廷人（罗伯托）和一个年轻的中国移民（俊）之间。通过罗伯托的女性好友玛丽，罗伯托逐渐产生了对这个年轻中国男人的同情心，两人日益亲密起来。罗伯托和这个直到电影后半段他才知道名字的中国年轻男人的相遇源自一次偶然。有一天，流亡他乡的俊被洗劫一空，踢下了出租车，却遇到了罗伯托。但他们的关系并非那种简单迅速的男性之间的友谊。罗伯托是一个神经敏感性格孤僻的独行侠。他没有朋友，独自居住，认为其他人都是“弱智”。他也完全不愿意改变他的日常生活形态——这一点似乎象征着波连斯坦所要探讨的一般阿根廷社会大众。不

.....

\* 罗丽莎（Lisa Rofel），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人类学系教授。

过就像玛丽说的，罗伯托是一个正直的独行侠，所以就算不情不愿，最终他还是把需要帮助的俊带回了家。为了摆脱他，罗伯托多次想把他甩给他人，比如警察局、中国大使馆，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国城。玛丽无意中的数次介入却帮助罗伯托做了正确的事情。比如，在一次不知道罗伯托已经把这个人抛弃到中国城的情况下，玛丽称赞他的所作所为。懊悔不已的罗伯托于是再一次去寻找这个年轻人，并将他带回来。在这一过程中，这个年轻人也帮助罗伯托逃离了警察的殴打，由此他们建立了一种互助的关系，到头来他更是帮罗伯托去正确处理和玛丽的关系。阿根廷的种族歧视虽甚嚣一时，但却最终让位给了真挚的共鸣，两个男人之间的同性社会性关系则是这一过程的镜像体现。

如果说波连斯坦用了同性社会性关系来探讨阿根廷对中国移民的种族歧视，我们则应从塞吉维克的分析扩展开来，更进一步去思考同性社会性关系与种族歧视之间的交互性。种族歧视不仅仅是电影的探讨对象，它本身，颇为吊诡地，成为电影在想要探讨种族歧视时所使用的手段。波连斯坦有意拒绝给中国年轻男人的中文台词配上西班牙语或英语字幕。对于罗伯托来说，这个中国男人完全无法理解。这一处理某种程度上捕捉到了阿根廷人面对中国人时的真实体会：如坠云里雾里。当然，这么说来，波连斯坦将阿根廷观众仅仅想象为讲西班牙语的白种人，并因而无意中抹除了阿根廷的中国移民的漫长历史。就算他们对他们的描绘充满了同情，这些移民仍然被他置于永恒的他者位置——而讽刺的是，电影中的中国演员其实是个既能说汉语又能说西语的阿根廷公民。

罗伯托和俊——我们终于通过一个华裔外卖配送员的翻译得知了他的名字——绕过了语言建立起了男人间的情感联络。这种联络建立在共

有的荒诞却可怕的悲剧经历之上。罗伯托曾参加过马岛战争<sup>1</sup>，而俊的未婚妻则在泛舟时，被从天而降的奶牛砸中，死在他眼前。换句话说，通过这种难以置信，波连斯坦制造了这种语言之外的情感联络。也因此，这部电影的名字也可以被翻译成不同样子。电影的本名 Un Cuento Chino（中国故事）在阿根廷俗语中和英语中的“tall tale”意思相近，就是指那些让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因此，电影名本身就有些种族歧视的意味。这或许是有意为之，被拿来挑战种族歧视本身。电影的英文译名，比如 Chinese Take-out, Chinese Take Away（中国外卖），A Chinese Tale（一个中国故事）等，并没有完全抓住这些多重寓意的精髓。反而它的中文译名“一丝偶然”倒是部分地捕捉到了西语原名的意蕴，当然除却那些牵强附会的意思不论。

在观众面前，俊的形象显然是捉摸不透的。这让人想起加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对她自己提问所给出的复杂回应。当回答“底层人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时，斯皮瓦克论证了无论是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或南亚史学家，在书写第三世界底层民众时，总是抹除了那些底层民众的主体性。这种抹除恰恰来自于想要代表他们的意图，来自于视他们为西方女权主义或第三世界精英的自身反身他者（self-same other）。她的分析敦促我们抵抗这一类的收编，并同时回绝这部电影所体现的自由主义意义上的互相共情。

的确，这部电影舍弃了诸多语境，包括阿根廷中国移民（多数来自台湾）漫长的历史，作出移民决定背后的复杂原因，以及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包括阿根廷在内的拉美国家的巨额投资——这些投资大多被用于自然资源的获取。这一情形被拉丁美洲学者称为“北京共识”。

.....  
1 编者注：指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西班牙语：Guerra de las Malvinas），也称福克兰战争（英语：Falklands War），1982年4月到6月间，英国和阿根廷为争夺英方称之为福克兰群岛（阿根廷方面称为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而爆发的一场局部战争。

这部电影也让人想起简·坎皮恩 (Jane Campion) 那部如今被奉为经典的《钢琴课》 (The Piano, 1993)。跟《一丝偶然》类似，《钢琴课》通过白种殖民移居者的眼睛来描绘新西兰原住民。果不其然，那些同样捉摸不透的原住民到头来也能够显示了他们真实的智慧，和那些倒霉的移居者完全不同。坎皮恩的手法颇受争议：她是否留意了斯皮瓦克关于将他者收编为自身反身的警告并拒绝去代表那些原住民，还是说在她将原住民描绘成不可理解时，她重现了移居者的种族歧视呢？

同样的，通过把中文呈现为一种异国的陌生的东西，波连斯坦到底是在挑战他脑海中那些只会讲一种语言的白种阿根廷观众，还是说通过质疑这种异国感，他试图弱化它并由此来促进包容？我们也许能从电影中发生在阿根廷的第一个场景里找到答案。在这一场景中，屏幕整个被倒置过来，我们看着它逐渐被转回到正面朝上。不过，起码对于我们这些会说中文的观众来说，我们不那么容易被这种异国情调所质询 (interpellated)。反而，我们得以反思，对于一个从白人视角出发的艺术作品来说，要同时再现与挑战白人种族歧视到底有多难。

## 陌生人之爱

郑诗灵\*，马里奥·帕切内\*\*

一个人经历未婚妻被从天而降的牛砸死这种事只怕跟一台中国太空火箭从阿根廷巴塔哥尼亚中的沙漠中发射一样，看似可能性为零，但它们却已经发生了。

在阿根廷西班牙语中，一个“中国故事”指的是“怪诞情节”，一些古怪奇异、不大可信的事情。而在日常用语中，“中国人”被拿来指任何看起来像亚裔的人，无论他们其实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以强调他们来自遥远异国，因而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阿根廷人有个古怪的脾性，他们用一种含糊和矛盾的方式对待“不同”的人：他们施与恩惠，关怀备至，但也把别人污名化为“不可能搞得懂”。在阿根廷，关于中国的新闻通常非常有限，大多复制了已有的刻板印象。在一个题为“阿根廷人讨厌中国人吗？”的话题下，一个网友的评论让我们对这些报道得以一窥：“一名男子有 17 个女朋友”，或者“一名男子跳窗而逃，竟仅因为女友要求陪同逛街数小时”。

但这部电影是关于爱的，尤其是那种能使得我们超越内向自恋的自爱，超越自身的对陌生人的爱。罗伯托是一个阿根廷式的俄狄浦斯——

.....

\* 郑诗灵 (Sealing Cheng)，香港中文大学 人类学系副教授。

\*\* 马里奥·帕切内 (Mario Pecheny)，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 政治学系教授。

困于对死去母亲的爱，又间接地害死了父亲，一个马岛战争<sup>1</sup>的逃亡者。罗伯托拒绝了漂亮的玛丽的示爱，躲藏在他经营的五金店那些繁琐的日常之后。他将一个保守的阿根廷形象人格化了。这个阿根廷拒绝外部沟通和改变，被自负与自以为是所困住，沉湎过去（他死去的母亲），舔舐旧伤（他死去的父亲）。除了日常生活必需之外，他唯一与外界的接触来源于一项每日仪式：他每天都要浏览报纸寻找那些世界各地发生的荒唐的悲剧故事，并将它们裁剪下来收集到自己的剪报簿里。

罗伯托对他失去的爱——他的母亲——的奉献，体现在他用心地管理着的一个被当做神龛的琉璃什锦台。每年母亲生日他都会往收藏里加入一个新物件。

如果这种行为是一种自恋的，因此“糟的”（异性恋的）爱，那么罗伯托寻找到“好的”（异性恋的）爱的机会则来自于与一个中国青年男子俊——一个彻底的陌生人——的一次十分突然却又私人化的相遇。罗伯托从路边收留了绝望的俊，当时他刚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被抢得身无分文，一句西班牙语都不会讲。

至于俊如何将罗伯托拽出舒适区，则集中体现在他无意间摔碎了罗伯托母亲的神龛，让他能够消除了使得罗伯托过于沉湎的客体。虽然极不情愿，但罗伯托仍愿意让这个陌生人待在自己家里，并任凭自己被卷入帮助俊寻找大伯的事情里。这样一来，罗伯托在无意之间就对一个由亲密与爱构成的勇敢新世界敞开了怀抱。

俊代表了三种在罗伯托世界里的陌生事物。第一，他代表了“不可能搞得懂”却又不可能甩得掉的中国人；第二，俊代表了爱所具有的转变力

.....  
1 编者注：指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西班牙语：Guerra de las Malvinas），也称福克兰战争（英语：Falklands War），1982年4月到6月间，英国和阿根廷为争夺英方称之为福克兰群岛（阿根廷方面称为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而爆发的一场局部战争。

量。就算当一个人对生活丧失热爱时，这种爱能够使人去寻求新的开始；最后，俊还代表着友谊，帮助一个人去意识到什么重要，什么则不，以及如何能够重新开始更好的生活的这么一个朋友。

在华裔外卖员的帮助下，罗伯托通过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话得知，俊因为一头从天而降的牛而失去了未婚妻，这个悲惨的新闻当时恰恰被罗伯托当做生命荒诞的证据而提起。在这个瞬间，两个男人在彼此的凝视中意识到的不仅是震惊，还有亲密：对罗伯托来说，俊是一个从他所惧怕的荒诞中存活下来的人，而对俊来说，罗伯托知晓他痛苦的过去。他们不再是陌生人了。

俊送给罗伯托的告别礼是一幅情感充沛的牛的画像，传达了他对生活的乐观，以及他愿从悲剧中走出来的愿景。这幅牛也让罗伯托想到了钟情于自己的玛丽，在一次短暂的情缘后罗伯托一直有意对她敬而远之。就像他曾锲而不舍地帮助罗伯托把后院和公寓的那些来自过去的废墟给清空一般，俊也启发了罗伯托将他过去的恶魔驱散，并拥抱生活带给他的爱与希望。罗伯托火速和玛丽——以及她的牛——在她回到乡间农场团聚了。

这部电影可以作为对在阿根廷出现越来越多中国人这一荒诞现实的评价，这一荒诞现实可以体现在竖立在巴塔哥尼亚沙漠中间的十六层楼高的中国空间站。它只比电影晚出现几年。电影同时也讨论了以勇气与优雅来面对这些不速之客的可能性。电影指出，阿根廷人是可以不再沉湎于过去的陈迹，抱怨所谓命中注定的生活的荒诞，并对新的挑战敞开双臂的。当然，电影最后并没有提供一个田园牧歌式的民族亲密大团结的景象。俊致以告别，登上了和大伯团聚的飞机，而罗伯托则奔赴乡间。有时异性恋男人之间的友情并不适宜有太强的亲密

性——作为两个完全没有性张力的“本体论上”的陌生人，这种陌生感（以及二人都如此脆弱易碎）反而使得一种特别的亲密感得以滋生。这种短暂的亲密对于两位男性来说至关重要，籍此他们得以去寻找生活新的可能性。对中国人和阿根廷人的教育意义则大概体现在俊和罗伯托是“通过”彼此寻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是“和”彼此一起找到的，因此，陌生人之爱是充满可能性的。

# 《中式外卖》：中国与拉美的底层故事<sup>1</sup>

劳拉·韦斯碧\*

这股“中国与全球南方”互动的潮流终于抵达了拉丁美洲，比曾经非常热闹的“中国和 / 在非洲”大概晚了五年。现在来自拉美和关于拉美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中方的投资：比如中国和厄瓜多尔的石油生意，中国在巴西私有化潮流中的投资，中国企业家在中美洲，一带一路计划在拉美之类的。当各种研究开始探索中国在拉美的形象，并触及种种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转变会带来的后果时，《一丝偶然》这部虚构喜剧故事则提醒我们，除了国力强劲的中国走向世界这一当今潮流之外，也许还有其他的关于中国与拉美的故事。

这部电影也许并没有告诉人们中国政府和大企业如何走向海外，而更多体现在这半个多世纪以来，在这些不同的社会中人跟人是怎么互相交往的。在这部 2011 年的电影里，阿根廷的中国移民故事并不体现一个强有力的中国策略性地走向国际，而是关于中国移民和他们的个人旅程。我认为这一视角并不拘泥于阿根廷的个案，而可以对整个 20 世纪以来以及本世纪这近几十年中，中国与整个拉美、中国移民与拉美国家之间的一系列社会互动进行说明，

从数据上看，根据 2010 年阿根廷官方的人口普查，12 万中国公民或

.....  
\* 劳拉·韦斯碧 (Laura Trajber Waisbich)，英国剑桥大学地理学博士候选人。

1 译者注：电影在中文世界译作《一丝偶然》，在英语世界则被译作 Chinese Take-Away、Chinese Take Away、Chinese Take-Out、A Chinese Tale。作者此文标题使用的是电影的英文名字，故将其译作《中式外卖》。在正文部分，作者则一直使用电影的西语原名，Un Cuento Chino，故将其译作《一丝偶然》。

华裔现居于阿根廷。他们中的大部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来到这里。不过关于中国移民的最早记录则来自 19 世纪。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是最主要的目的地。政治和经济驱动力是促使两国之间南南迁徙的主要因素。在邻国巴西，19 世纪同样也迎来中国移民热潮，与当时政府意图模糊的种种政策紧密相关。当时政府一方面意图用免费移民劳力代替奴隶劳力来巴西种植园打工，另一方面却实行一项颇受争议的“白种化政策”，公开限制“非白人”（黑人或亚裔）移民，并偏袒欧洲移民。20 世纪以来，中国与亚洲的种种地缘政治变迁（二战、共产主义革命、苏哈托对印尼华人的迫害等）愈发解释了移民潮出现在巴西等地的原因。在巴西的金融中心圣保罗，官方调查显示 25 万中国移民及其后裔生活于此。据国际移民组织称，巴西是中国移民拉美的首选，其次就是阿根廷。近年以来在阿根廷与巴西，以及拉美其他地方（比如秘鲁、委内瑞拉、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等）出现的移民潮则更多与当代都市商业迁移相关，而不再服务早期种植园。在拉美许多城市里，就像电影中描绘的那样，中国移民及其后裔仍主要是那些商铺和餐馆经营者。当然，投资者和高度流动的商业人士也越来越多了。

那么，这部中 - 阿传奇提供了怎样的想象呢？中国与拉美的性别与性意识又是如何呈现的？在《一丝偶然》中，中国移民某种程度上是那些逃离他们自身或群体性伤痛的一群脆弱的人。他们来自遥远异国、人数繁多，历史悠久。这个中国的他者一方面太过于不同，难以理解；另一方面则太过于特别，无法忽视。即便是在阿根廷（或巴西）这种移民国家，中国移民都从未被停止当做外国人（或混血），无论他们是刚刚来到此地，还是已经繁衍数代。中国千年以来的历史、中国哲学、中国食物等等，都让他们被视作外来者。有意思的是，这部电影的英文题目是“中式外卖”而不是从西班牙语直译而来的“中国故事”。就算不是过度阐释，我们也能从这个独特的西语英译中一窥英语国家是如何解读这个故事（或这段历

史)的, 以及中国和中国食物如何从在经济层面上占据着西方想象。

电影中的中国主人公是一个意外地经历心碎之事的移民。他害羞敏感, 颇有艺术才华。而除了那个年轻的外送员之外, 其他中国人角色就都是那些对他人施加自我阳刚威权的男性(比如一个对全家发号施令的祖父, 以及那些不予帮助的外交官)。在对阿根廷角色的塑造里, 性别和性意识的刻板印象则相对复杂一些。罗伯托, 一个(典型的)自毁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Bonarense), 拒绝任何形式上的情感和人与人的互动, 主动权则掌握在一个阿根廷女性玛丽的手上。这个人物从不掩藏她对他的感情, 并主动出击寻求改变。人们可能会说, 这一形象并不那么符合典型的拉美刻板印象。

在这部悲喜交加、充满诗意的, 关于相遇、命运、个体能动性的电影中, 阿根廷人和他们无论是来自个体还是共同的对中国的想象都某种程度上服从一种“一个中国政策”。中国是那个有趣的遥远国度, 那里人们都讲一种语言, 也就是中文。在普遍的想象中, 中文只有一种, 且并没有包括普通话与广东话。名词“Chino”(西班牙语中“中国人”的意思)自始至终仍然被阿根廷以及其他拉美国家用来作为对亚洲人的一种笼统形容。就像“突厥的”(Turkish)被用来指各种中东人和事物一样。

在我们对中国和全球南方过度的高度政治化的关注下, 《一丝偶然》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文化转向。它通过人与人的关系呈现了从底层出发的南南关系。没错, 这部电影不仅对阿根廷人关于中国人和中国移民那些异国化和古怪的想象加以调笑, 它还使得我们得以去想象一种算得上是双赢和互惠的人际关系(虽然也许有些天真): 阿根廷式的好客可以将一个中国年轻男人从他痛苦的命运中拯救出来时, 而中国象征式的思想与情感则实际上更可以将阿根廷人从他们自寻的忧郁中解救出来。

## 谁是拯救者和被拯救者？

蔡一平\*

一个独居的中年阿根廷男人，开着一间小五金商店度日。生活平淡无奇，唯一的爱好是剪报，收集世界各地稀奇古怪的奇闻逸事。一天，他阴差阳错地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街上“拣回”一个来自中国福建的青年。这位青年因为一场天降横祸而失去了未婚妻，家人也都相继去世了，他万里迢迢来阿根廷投奔唯一的亲人——大伯，却在刚下飞机就遭到出租车司机的打劫，身无分文。循着大伯的地址找过去，大伯早已经搬家，不见踪影。阿根廷男人虽然觉得此人是个麻烦，帮助他并不是自己的职责，但是恻隐之心使他不忍驱赶这个落魄无助的青年，只好临时收留他几天。于是，这两个孤独的男人就这么莫名其妙又命中注定地遭遇了。

在一般的电影故事中，如果两位主人公是异性的话，那么故事的发展线索往往是：两人之间经过种种误会之后，成为恋人，来一场浪漫的异国恋。不过，在这个故事中，阿根廷男人和中国男人都是异性恋，一个面对女友的热烈追求正在犹豫不决，不敢接受；一个刚刚失去了挚爱的未婚妻，在陌生的国度投亲靠友又遭遇着各种波折，这会儿也根本没有心思谈恋爱。那让观众看啥呢？

那就先看看这个阿根廷的男人是如何帮助这个落魄的中国青年的

.....

\* 蔡一平，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执委会委员。

吧：他虽然出于善意的本性提供免费住宿，还带领中国青年去当地的使馆和唐人街寻求线索。但是，他可不是发自内心的“助人为乐”，而是设下了七天的期限，不管小伙子的亲人是否找到了，都是要将他扫地出门的。因为，这个阿根廷男人因为以往的人生遭遇早就把自己的内心深深地封闭起来了。女友对他一见钟情、紧追不舍，他都始终紧闭心扉，拒绝回应。更别说对一个语言不通、来路不明的中国青年了，交流起来是那么费劲儿，各自比比划划地说着西班牙语和中文，还需要借助唐人街的老板或者中餐馆送外卖的快递小哥来充当翻译。相比之下，他的女友对这个中国青年倒是更友善些，主动提出带中国青年来个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日游，还掏腰包请两位男主人公吃中餐。看得出来，女友这么做并不只是为了讨好阿根廷男人，替他分忧解难，而是发自内心的善意。这位女主角在影片中出境不多，但是，她总能在关键时刻帮助化解尴尬推进剧情。

起初，两位男主人公都把求助的希望寄托在国家机制上，遇到困难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政府的帮助。然而，这些国家机制让他们失望了。先说说阿根廷吧。当地的警察听说中国青年丢失了护照和钱财无处落脚，就要把他当作非法移民和嫌疑犯一起拘留。阿根廷男人据理力争，说这个中国青年需要帮助，而不是被当作罪犯，警察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让他忍无可忍，出手教训了值班的警察。在中国大使馆，也是处处碰壁，虽然使馆答应帮助寻找青年的大伯，却无法提供食宿，而且官僚主义的工作人员对普通公民的求助似乎并不热心，只是敷衍，还闹出了一次乌龙事件，找到了一位假大伯，害得主人公空欢喜一场。

看来，救赎的希望只能靠民间自救了。为中国青年提供了庇护的阿根廷人似乎是拯救者。善良的中国青年投桃报李，为他粉饰住宅、打扫院落，甚至出手打伤寻衅报复的警察，用自己失去未婚妻的离奇遭遇告诉阿根廷

男人，要抓住眼前的幸福。在剧情的发展中，出现了反转，似乎这个中国青年才是那个拯救者。在他的鼓励下，阿根廷男人终于打开了心结，投入女友的怀抱。中国青年也在中国大使馆的帮助下找到了大伯。可谓是皆大欢喜的结尾。

在这部电影中，代表着权力和权威的国家机制，本来可以扮演者拯救者的角色，但是它们却是失职和缺位的。那个阿根廷男人，作为拯救者最后却成为了被拯救者。中国青年从被拯救者成为了拯救者，而成为他们之间的心灵桥梁的，就是那些爱他们的和他们所爱的女人。归根结蒂，女人才是那些拯救者的拯救者啊。

阿根廷男人的心结，来自于父母的早逝，也来自于他参加英国和阿根廷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战役<sup>1</sup>中失败的创伤。治愈这个创伤的却是一位来自一个完全不相干的国度的青年。电影拍摄于2011年，影片中所表现的中国对于阿根廷来说，仍然还是地球另一端的遥不可及的神秘国度。连找一个会说中文的翻译都是那么困难。除了在唐人街，很难见到中国人的身影。关于中国的报道也仅仅是在小报的奇闻逸事栏目中。

说到这里，我倒是很期待一部描写中国人和阿根廷人之间的爱情电影了。在描写亲密关系的电影中，中国和中国的青年还会被描绘成一个被拯救者和拯救者的角色吗？那会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这回出场的中国人会是一个男性？还是女性？是同性恋爱还是异性恋爱？是现实中的故事？还是穿越到古代或者未来？背后又会折射出阿根廷制作人对中国的哪些想象、期待、焦虑和反思呢？

.....  
1 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西班牙语：Guerra de las Malvinas），也称福克兰战争（英语：Falklands War），指1982年4月到6月间，英国和阿根廷为争夺英方称之为福克兰群岛（阿根廷方面称为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而爆发的一场局部战争。

## 纠葛而非团结： 关于《一丝偶然》的一些想法<sup>1</sup>

向在荣\*

对于一部名为《荒谬故事》<sup>2</sup> 的电影，我们可不能太较真。阿根廷导演塞巴斯蒂安·波连斯坦这部电影从一个发生在中国的离奇悲剧故事讲起。故事中一头牛从天而降砸死了一个姑娘，当时她的男友正举着戒指对她求婚，一对爱侣就此被拆散。导演在电影的开头和接近结尾处两次提醒我们，这个中国故事（cuento）虽然基于事实（hechos reales），却实在是太过离奇了。

电影是关于一个阿根廷本地人罗伯托如何对一个不会讲西班牙语，名为俊的中国移民施以援手。他不仅敞开大门收留了他，还帮助他找到了他早年移民阿根廷的大伯。难民、移民、还有全球南方这些电影所触及的主题让人很容易想到那些关于客道、同情、尤其是团结这一类的宏大主题。不过这部电影似乎决绝地回避了这些宏大性。毕竟，在西班牙语中，片名“un cuento chino”就是指的一些荒谬的，怪诞的故事罢了。

如今这个“难民危机”的年代，媒体与艺术作品日复一日地将难民问题夸张放大。在日渐壁垒森严的欧洲，各国正日益收紧他们的国境线，将难民拒之门外，任其生命遭受荼毒。笔者身处其中，观看这样一部较为轻松愉快的有关移民的电影，实在让人舒心。

.....  
\* 向在荣，德国波茨坦大学“少数世界主义”联合博士项目的博士后研究员。

1 作者注：电影的官方中文译名为《一丝偶然》，其西班牙语原名为 un cuento chino.

2 译注：电影的西班牙语原名为 Un Cuento Chino，在西班牙语中是一句俗语，指那些“荒诞不经的故事”。作者原文在此处直接使用其西班牙语原名，所意指的即它的俗语含义。故译作“荒谬故事”。

当然，电影本身不是毫无瑕疵。实际上，瑕疵随处可见，轻易就能拿出来批判。比如电影对中国（移民）的描绘就充斥着刻板印象：逆来顺受、坚忍不拔，但同时又不愿融入当地，而且完全神秘难懂（电影甚至没有为俊的汉语台词附上字幕）。经常有人和我抱怨：“你们中国人就是不愿意融入”，而电影恰恰就是这样渲染的：中国人的社群似乎永远都在“那儿”，在罗伯托开车才能去的华人区，在拉普拉塔，在门多萨，当然还远在中国——总之就是不在“这儿”，不在罗伯托和他的朋友生活的街区。这已经差不多算是种族歧视了，足以让人感到不快。

虽然存在这些问题——也恰恰是因为有这些问题，这部电影反倒传达了一个近乎迷思的信息，这一信息并非团结，而是关乎纠葛。首先让我们看看这些角色。他们都不是所谓的模范，既不是模范移民，也不是模范公民。他们不过是被全球化世界所裹挟的普通人，他们的相遇几乎完全是一种巧合（所以这部电影的中文译名又叫《一丝偶然》）。

仅仅因为都来自全球南方，两个主人公之间并没有天然的团结一致。促使罗伯托帮助俊的是一种本能，而不是类似“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样的政治信念。他仅仅是对无助的俊伸出了援手。同样，俊也帮助罗伯托摆脱了一个凶残的警察。他们的“团结”——如果这种团结指的是他们的相遇的话，仅仅是出于常识。而无论是那个暴力的阿根廷警察或腐败的中国使馆工作人员都似乎无法领会这种基本常识。

然而，一个仅仅关于人们互相帮助的故事算不上一个传奇，更不算天方夜谭的 cuento chino（所谓“荒谬故事”）。它还需要传递一种信息。那头给俊带来了悲剧的牛同时却使得罗伯托得以与自己和解，这个细节给这部轻喜剧带来了一种不寻常的、鲜为少见的神秘氛围。它背后传达的信息似乎在说，我们需要彼此——一个再简单不过却又时常被忘记的常识。罗

伯托帮助迷失在异国街头的俊找回了他的家人。而俊则帮助迷失在伤痛的往昔与愤世嫉俗中的罗伯托重拾面对玛丽的勇气（她也是电影里唯一的女主人公）。这一切都是机缘巧合。必然会发生的，也并不是因为命中注定，而是人类存在本身的复杂纠缠。

我们似乎可以停在“人类存在”的宏大主题这里。但是，如果读者愿意再看一遍上面的文字，并有意为这些文字加上一个性别定语的话就会发现，我说的“主人公”“人”“移民”或“公民”其实是“男主人公”“男人”“男性移民”和“男性公民”。电影所探讨的那些有价值的主题也因此受制于直男男性同性社会性 (straight male homosociality) 这一不可否认的具体视角。换句话说，如果将电影的主人公们、人们、移民们和公民们换作女性或女同性恋的话，我们是否还能如此容易地对电影传达的“神秘”意味进行类似的分析？我自己对此并不确定。

## 《一丝偶然》（又名《中餐外卖》）

玛丽亚·阿梅莉亚·比特利\*

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阿根廷人罗伯托和华裔移民俊的相遇于我们有何干系？通过提出这个问题，我对导演波连斯坦所创造的场景感兴趣，同时尤其对亲密关系在其中的位置感兴趣。

在安第斯山脉地区，解释一个人不理解别人所说的话的一种方式恰好就是“你在说中文吧”。波连斯坦也有意不给俊的中文对白附上任何翻译。这种不可理解性远远超越了语言本身：它更与差异如何被解读、标签和标记密切相关。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中，区分出差异的一种方法就是观察那些跨越了地缘政治边界，并经受着被他们选择前往或被派往国家的居民审视的人们。

罗伯托从报纸剪辑收集来的超现实爱情故事——一头奶牛从天而降砸死“心爱女友”——将我们带入其他当代超现实实际，就像那些在美国南部边境被从父母手中夺走，被关进笼子，然后被送入临时营地的孩子们所带来的一样。

罗伯托的性格，纵使自我沉湎到几近充满敌意，也仍然吸引了玛丽的注意。玛丽那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乡间的浪漫主义情怀渴望着罗伯托的爱。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分歧在俊和罗伯托各自的故事中，似乎是对立的。两个故事都突出了城市作为抵达的场所，就算它的肌理异化了它的居民和移民们。

华人社区面向拉丁美洲的流动性已经像其他离散人群一样被分割了，尤其是被历史背景所分割。在那个奶牛自由落体到恋人泛舟的平静湖面的超现

.....

\* 玛丽亚·阿梅莉亚·比特利 (Maria Amelia Viteri)，厄瓜多尔圣弗朗西斯科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

实实际中，我们能够解读出流动人口剧烈的差异如何让强调“白人保守民族主义”的公共政策得以自由发挥，使得其他形式的身份都遭到损害。

俊通过移民阿根廷去逃避那湖面上的惨剧，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对像罗伯托这样的读者来说，他的故事只是耸人听闻罢了。这片大陆和这个地球上流动人口的悲剧通常都以一种不会引起读者的同情心的方式被讲述着。这些读者因此也就更不会在意那些先于这些流动性的独裁或暴力政权，就像他们所了解的委内瑞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以及其他那些社会流动性本身较少或几乎不存在的地方。

对于《中餐外卖》来说，问题在于指向命名类别。例如，对于一个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层面上的所谓过境国或人员出口国，这部电影意味了什么？这个问题与最近出现的像墨西哥这样的所谓“难民国家”类别息息相关。华人社区大批涌入的时期——主要指上世纪80、90年代和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大批台湾人来到阿根廷——得以让我们审视阿根廷的移民政策与叙事，直到2004年，其宪法一直谈到要鼓励“欧洲移民”。

对于阿根廷这个自认为欧洲化多过拉美化，并在历史上以原住民社群为建国基础的国家，《中餐外卖》暴露了它有些幽默但却固化的对待性别的方式（在两个大陆的两位女性无论是在字面意义上还是比喻层面上都被锁定在传统的爱情期望中）。如果我们将非裔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被如何看待视作一个起始点，那么亚裔的差异在这里是如何与性别以及其他民族一起被看待的呢？在改写了其自身历史性后，这一差异被从吸收与同化的角度来考量。在这种考量中，不同国族在色素沉淀与民族构成上的差异化特性被拿来为仇外情绪铺路，而最能使其淋漓展现的就是最传统意义上的对爱情的期待，以及与之相伴的异性恋常规。

# 一个巴基斯坦的民族文化

## —— 争议中的政治经济

萨迪亚·托尔\*

郑圣勋 译 罗小茗 校

这篇文章不仅关于一则更大的学术研究、同时也是将巴基斯坦视为特殊案例以理解民族主义、文化、与国家形成的政治计划的一部分。在巴基斯坦，不论是学者或学院之外的人皆倾向以美国例外论（exceptionalist）的角度来看巴基斯坦，而不是将之视为后殖民民族国家中的特殊案例，这件事常常使我感到生气。透过文献分析，我认为巴基斯坦文化与国家的关系是一个普遍问题下的特殊情况，后殖民民族国家涌现自殖民统治与反殖民斗争的历史中，而两者皆对文化思想与文化疆界的政治化做出贡献。我的研究也将凸显巴基斯坦历史上另一个被忽略的面相：特别是在早期阶段，左派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和政治领域扮演的重要角色。有鉴于其再实际不过的影响力，在巴基斯坦历史里，巴基斯坦左翼思想的缺席变得令人越来越难以忍受，同时，我也将指出甚至连进步的巴基斯坦历史学者都会有的意识形态偏见。

也有一些私人因素推动着我从事这项研究，在我的硕士论文研究过程中，遇到了1947到1952年间的“国族语言论战”，此论

.....  
\* 萨迪亚·托尔 (Saadia Toor)，纽约城市大学斯塔滕岛学院(College of Staten Island, New York)。

战讨论应该让乌尔都语(Urdu, 统治精英用的语言)或是孟加拉语(当时多巴基斯坦居民使用的语言)来当做新的国家语言。事实上, 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有政治意识的年轻巴基斯坦人, 却从来没有听过这个问题; 尽管这显然是对新国家而言最重要的危机, 1952年2月21日, 孟加拉东部发生了对和平的亲孟加拉语派系的攻击, 在孟加拉历史中, 以Ekushey日以纪念语言战争中的殉难者, 2月21日也成为后来联合国订定的“世界母语日”。身为一位进步的巴基斯坦人、政治运动人士、年轻学者, 我感到我有责任去发掘从东孟加拉进展到巴基斯坦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 以及被精英暴力地拒绝的孟加拉文化与其背后的政治意涵。

此篇论文的研究计划背后有以下几个动机: 学术、个人, 与政治目的:

——拯救巴基斯坦的学术界与民族/文化主义者免于受限于美国例外论的框架, 同时展开较为适合的后殖民与民族国家形成的讨论。

——认真地去理解(民族国家的)文化领域里的挣扎, 并强调其在巴基斯坦的特定性, 尤其是关注“孟加拉问题”。

——挖掘马克思主义左派思想在斗争中的重要角色。

萨迪亚·托尔

\*\*\*\*\*

任何国家，即使是新国家也一样，都不愿意以仅有政治框架的方式出现，他们会以可代表其宗旨与理想的文化象征作为外衣。有人能预测新兴国家的文化潮流吗？能预测一个国家的文化外衣的材质吗？哪一项文化时尚元素又将会被所有公民认可为新国家认同的核心？又是哪一项元素能够被正式地提出并得到尊重？（Marriott 1963: 27）

这段话来自于 1960 年代出版的一本颇具开创性意义的社会科学刊物，它亦强调了国家计划与文化高度相关的当代意义，以及此愿望的国际层面范畴；并且，也展现两者之间让人吃惊的低度期望，不管是应该更显著、或是更有机或天然。同时，它还提供了必要的、一个国家必须有的文化，用来“遮掩”其“赤裸”，以及似乎还存在于政治范畴之外、民族国家之前的选择。相对地，我将告诉读者，进入巴基斯坦实例的争论时，这些影响着“决定”的深刻政治性质，揭示着文化民族主义的情感力量。

如果国家始终是霸权的实现，那么对于国族文化的争论必定能够一窥霸权中的复杂进程——包括故有的权力集团企图维护、以及来自不同社会力量的联盟对此的争论。“国族文化”显然地是在文化意识形态内出现的一个重要类别，而不是政治或公民国族主义。

我们可以说，到了二十世纪，文化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国族主义的一种霸权形式，特别是在反殖民的斗争过程中。一部分是由于文化政治形成反殖民斗争中的一种特权面貌，<sup>1</sup>因为它十分有效地创造了一种

.....  
1 例如，请参见查特吉（Chatterjee, 1993, 1989）。

“对民族的情感依恋”。曾获巴基斯坦民事勋章的政治历史学者库雷西 (I.H. Qureshi) 就曾感叹, 这种依恋在从巴基斯坦独立 (1947 年) 到 1960 年代晚期, 都是缺席的 (库雷西 1961:4)。“国族”, 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政治与道德的共同体, 它需要被驯化以便拥有情感力量, 激发起使国族这个观念“起作用”的热情与忠诚。参与生产这种对国族忠诚 (也因此对国家忠诚) 的意识形态的劳动, 是透过“民族文化”进行的。正如库雷西接着指出的, 它也可以借着宗教来进行, 但这只有在宗教本身被文化模式包裹的情况下。<sup>2</sup>

### 印度穆斯林算是一个民族吗?

我提出的种种问题、矛盾、缺陷与限制, 皆使得巴基斯坦的国家身份与文化很难用一个一致性的概念来阐述。在建立于英国殖民时期的印度穆斯林认同, 与巴基斯坦民族国家的实际领域与人口现实之间, 这些问题各有其不相容的起源。

在 19 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印度时期, 民族的概念在政治与文化话语中已经有了霸权, 以致于它是在对国家地位的要求的基础上, 展开政治认同与代表权的谈判的。更关键的, 这些要求 (加强“两国论”的要求) 是基于它被理解为穆斯林所认同、它拥有清晰可辨的文化历史等文化上的理由, 因此, 以一种文明进程而不是宗教意义来看伊斯兰教,<sup>3</sup> 穆斯林和印度人的分别是来自于民族意识, 如果两者重叠, 则属于一个更大的伊斯兰政治群体: “乌玛” (ummah)。<sup>4</sup>

2 在概念与现象两个面向上, “宗教”与“文化”皆往往与现实生活紧密接合, 以致于去区分它们带来的影响十分困难, 这些重叠性与模糊地带造成巴基斯坦境内的民族主义话语中的误解, 正如我在我的研究中提出的争论。

3 这个部分请参见阿齐兹 (Aziz) (1967: 特别是第 8 页和第 123 页)。

4 1930 年代中期, 印度穆斯林知识分子了解自己有两个不同的身分: 穆斯林和印度人, 而他们并不把两者视为对立的。甚至穆罕默德·伊克巴勒 (译按: 印度穆斯林诗人、政治哲学家) 提出的“创造穆斯林家园”被视为一个解决公共问题的方法, 同时在加强印度穆斯林对印度的国家忠诚时, 保留“作为文化力量的伊斯兰生活”。因此, 穆斯林的民族主义并非自动地与分离主义的框架挂钩。

政治与文化的重要性已经被“国家”这个范畴所占据，并被建国的诉求及其产生的争议所验证，正如19世纪，当穆斯林主张建国时，争议只会被放大。“国家”就此成了争论政治身份与政治代表性的场域，伊克巴勒（Iqbal）认为穆斯林是“（能够）匹配在现代意义下的国家这个字意义的印度人”，因为印度教徒一直无法“达到一个国家需要的同质性，而那样的同质性是伊斯兰教早已赠送（给予穆斯林）的”。因此印度的穆斯林并不是少数族群，而是一个民族概念（引自巴拉斯（Barlas），1995:178）。

穆斯林对国族议题的争论，可以以甘地和真纳之间的交流为最好例证。1944年9月，甘地与真纳的交涉谈判破局，甘地表示：“只因为改变了信仰，就宣称自己与他们的祖先不是来自同一个国家，这种事情是史无前例的。如果印度是一个先于伊斯兰教就存在的民族，那么不论是否改变了信仰，印度的每一个子民身上都流着印度的血”。（真纳－甘地书信集1945[1944]）

真纳对此有一相当著名的回应：“我们是一个人口多达一亿的国家，并且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文明与文化、语言与文学、艺术与建筑、名字与术语、价值观、法律与道德准则、风俗与历法、历史与传统、才能与进取心；总而言之，我们有我们独特的人生观与生活。无论根据什么国际法典，我们都是一个民族。”（真纳－甘地书信集1945[1944]）

建立于既存事实、科学与法律话语（“无论根据什么国际法典”）的建国基础，其合法的重要性，亦反映在1947年4月的《黎明》（Dawn）这本刊物上一系列名为《印度穆斯林算是一个民族吗？》的文章中，而其作者声称自己“仅仅只是一个国际政治系的学生”。这项论点涉及多个当代对于建国的争议，包括著名的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sup>5</sup>与阿克顿男爵(Lord Acton)<sup>6</sup>,以及其他关于民族主义持续地在此领域的论战,而这个论点的逻辑,十分让人惊讶地具现代性。

《黎明》以艺术/建筑、文学/语言、以及“生活方式”来作为文化民族主义的基础。关键的是,此种超脱自主要的“印度教”社群的说法,可能对具体的(印度)穆斯林民族文化有加强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对作家而言更为复杂的“共同文化”定义——“开拓思想与情感的表征”——有助于加强这个独特性。印度穆斯林的想法、感受都不一样,亦有独特的历史,因此他们有共同的目标与利益,因此他们可以是一个国家。

而此类以领土定义的民族主义最容易出现问题,“印巴分治”(Partition)的实施,即以非自然的空间与社群分界,呈现了更复杂的状况。某种意义上,与文化民族主义相结合的领土民族主义,是一种还尚未厘清的国家社群现代性的方法。这同样也是一种世俗的做法,从贾迈勒丁·阿富汗尼(Jamaluddin Afghani)<sup>7</sup>、穆罕默德·伊克巴勒(Muhammad Iqbal)<sup>8</sup>到马杜迪(Maulana Abul Ala Maududi)<sup>9</sup>等评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穆斯林评论家,也都认同此说法。另一方面,如巴拉斯指出的,“如果穆斯林民族主义的论述有缺陷,那也并非穆斯林民族主义者无法对界定的领土发展忠诚……,而是他们持续地对印度保有承诺感的缘故。”(巴拉斯:1995:176-177)

大卫·吉尔马丁(David Gilmartin)写道,“尽管引用自印度西北一个省份名字的‘巴基斯坦’,就是用来表示这个地方与印度的关联,然而,几乎没有巴基斯坦的运动语言表明过,这个特定的一块领土的……”

5 意大利政治家,意大利统一运动推手——译者注。

6 英国历史学家、自由主义者——译者注。

7 阿富汗政治家,泛伊斯兰主义提倡者——译者注。

8 印度穆斯林诗人、政治家——译者注。

9 印度穆斯林学者、哲学家——译者注。

普遍性意义有何重要性; 巴基斯坦是什么样的土地? 这样的不确定性, 也反映在 1947 年时各种方案中的各式各样可能性。” (大卫·吉尔马丁 Gilmartin 1998: 1083.)

他进一步指出, 孟加拉甚至没有出现在这些政策体系中, 亦非用来作为支持巴基斯坦计划的基地, 如同史学家阿伊莎·贾拉尔 (Ayesha Jalal) 的论调, 大卫·吉尔马丁指出造成巴基斯坦多重缺陷的原因, 它从来没有被当做成一个实际的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来被想像: “巴基斯坦运动真正的挣扎, 并不是为印度穆斯林建立一个疆域上的家园, 而是去建立一个穆斯林的政治共同体, 在印度‘统一的’穆斯林社群中, 以道德与政治上的意义, 定义一个象征性的中心。” (吉尔马丁 1998: 1071)

1947 年 8 月之后, 穆斯林民族可以自称拥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但讽刺的是这个国家造成了民族上的地理分化——印度的统一穆斯林社群——应运而生。更为雪上加霜的, 是此新民族国家的轮廓在其滔滔不绝的建国主张的基础上, 有效地隔绝了巴基斯坦公民原有的印度穆斯林文化与历史。

物质文化并不只是印度自治领域 (Domionion) 留下的唯一事物, 穆斯林民族主义,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一种运动, 它在穆斯林占少数的省份中保有了根。这意味着, 除了那些计划移民到巴基斯坦的人, 大多数来自这些地区的穆斯林原本并不包含在他们支持的民族国家里。许多曾活跃在全印度穆斯林联盟 (Muslim League) 斗争中的穆斯林, 包括真纳的伙伴伊斯梅尔·汗 (Ismail Khan) 与 Nawab of Chhatari<sup>10</sup>, 最终还是没能“将自己与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断开”, 而留在了印度。而迁移到巴基斯坦的人, 无法不“感到不安与自责”

10 Ahmad Saeed Khan (1888-1981), 一般被称为 Nawab of Chhatari, 担任过联合省首席部长, 海得拉巴尼加萨执政委员会主席 (海得拉巴总理) 等职务——校者注。

(哈桑 [Hasan] 1993)。跟许多人一样，“他们心痛地对自己信仰的符号告别，切断自己与勒克瑙（印度北方邦首府）与德里的羁绊，或许也切断了作为文化生活与精神生活中心的、阿瓦德（Awadh）里的卡斯巴古城（the qasbahs）的连结”（哈桑 1993），对文明的保护、捍卫，成了穆斯林民族主义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因此，巴基斯坦民族国家在人口统计的意义上将“印度穆斯林社群”分离出去，但更根本的是，它在“国家”的话语结构中所造成的矛盾。如果大多数“民族作为社群”的成员，却只存在于该国家之外，那么到底“巴基斯坦国”是什么？又在哪里？一方面来说，全印度穆斯林联盟的说法是被胜利冲昏头的，尽管他们已经承受了印巴分治的悲剧事实。巴基斯坦已经实现，由原本的全印度穆斯林联盟实现，但却伴随着一个暗示：现在最需要的是其他的“自治领域”，而是关注这个新的“穆斯林”国家。本质上，这是领土民族主义和印度穆斯林有机想像共同体之间的冲突，维吉尼亚·多明格斯（Virginia Dominguez）<sup>11</sup>曾这么说：“这是尚在寻找实质内容的建国意识形态”（多明格斯 1990:131）。

这一点，即道出新民族主义项目的重大矛盾，如果境内大多数的成员依然生活其他自治领域，那巴基斯坦怎么宣称自己是穆斯林国家？接着，还有非穆斯林的问题：尽管孟加拉与旁遮普省的划分有其共用基础，<sup>12</sup>并且加上造成印巴分治的暴动，新穆斯林民族国家依然有着明显比例的非穆斯林，尤其是印度教徒所占的人口比例。不管是对旧的“国家”定义、还是其平等的代表性来说，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都是个矛盾的说法。如果一个新国家对其现代性的愿景忠实，并自称是一个现代国家，那么该如何对待这些印度教徒就必须态度一致。

11 美国政治与法律人类学家——译者注。

12 本来的规定是，穆斯林占大多数的整个孟加拉和旁遮普都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而分离是因为激进印度教民族团体施于压力下的结果。

显然，穆斯林民族主义的旧话语已不再对它的目的有效力，那么如何使塑造了新民族国家的各种利益与身份，与一个新的民族认同话语相衔接呢？

这两个新民族国家的单一和排他的国家认同，只是加剧了印巴分治的创伤。如同阿齐兹·艾哈迈德（Aziz Ahmad）<sup>13</sup>认为的，“在1947年巴基斯坦诞生时，它只取得了建国的政治性，文化上它依然不是一个国家。”最紧迫的问题是“为了分离并建立新国家文化认同而切断来自印度的印度教文化残留，这一政治疑难所导致的文化上相对应的问题”（艾哈迈德1965）。这些重叠的部分无法有所让步，因为，如果“此国家的文化是来自于另一个国家”（韩德勒〔Handler〕1988:15），那么与印度共享的文化将削弱巴基斯坦存在的理由。这导致国家空间“同质化”的需求，毋庸置疑地，判断一致/不一致的标准就是国民的宗教认同。

这种状态的荒谬与暴力可以由“遭拐卖的妇女”的“痊愈与交换”中的焦虑看出（梅侬〔Menon〕与巴辛〔Bhasin〕1998；布塔莉雅〔Butalia〕2000）。萨达·哈桑·曼托（Sa'adat Hasan Manto）<sup>14</sup>在他的短篇小说《忏悔辛格》（Toba Tek Singh）中即讽刺这种强行切断巴基斯坦与印度的企图，这部小说中两个国家协调交换收容所中的精神患者的桥段，也常常被引用。透过故事中的混乱与主角的悲剧身亡，曼托引出国家的强制性，同时强调将国家认同强加于人民时，所造成悲怆与疯狂。

“当被问起巴基斯坦在哪里时，这些病患一时所知……不管是全疯的或是半疯的，都无法确定他们是在印度，还是在巴基斯坦。如果

13 巴基斯坦政治家——译者注。

14 曼托（1912-1955）从当时到现在都是最流行并最受争议的乌尔都语作家，他同时也是实质上、象征上或精神上都是相当暴力的印巴分治时期的编年史家。

他们身在印度，那么巴基斯坦又是哪里呢？也有可能整个印度次大陆都将成为巴基斯坦，谁又说得准，哪一天印度和巴基斯坦也许一起消失在地图上呢？”（曼托 1990）

此段话揭示了不论是国家界线或是巴基斯坦的确切位置，都是让人困惑的，而最无稽之谈的是，人们却又被强制相信这样的界限模糊，好像是不证自明的真理。这同时也反映了曼托自己的感受：他到底属于哪一个国家？“当他写作的时候，他试着要把巴基斯坦中的印度、以印度中的巴基斯坦分离出来。”（节录自哈桑 1993:31）。

### “巴基斯坦文化”中的悖论与政治

紧接着独立与印巴分治之后，“定义巴基斯坦文化”这个意图，成了某种国家消遣。这些争论主要是围绕着诸如，巴基斯坦文化究竟应该多大程度地“等于”伊斯兰文化。而对此延伸的各种选项都不是中性的——不是直接地表示某特定族群的利益，就是间接地阻拦某些政治可能性并寻求其他选项。我在这个章节中尝试要扩充在这段充满危机与争议的时期里最重要的一些分析，其中包括孟加拉要求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为乌尔都语。

民族国家声称该有的“想像的共同体”的特定结构，就此改变。政治领导者与巴基斯坦知识分子当前的问题是：对巴基斯坦来说，到底什么是民族 / 国家？巴基斯坦建国的前五年严重地考验了穆斯林民族主义的论述，除了带来未解的矛盾，还不断衍生新问题。此刻的当务之急是建立某种形式的国家共识，因为旧的定义又脆弱又短暂，已不适用于今日。讽刺的是，“巴基斯坦民族主义”和穆斯

林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成了新国家中统治精英与知识分子的根本问题。

然而，正如吉尔马丁解释的：“虽然 1940 年代巴基斯坦超越穆斯林之间的分歧，并以道德秩序象征之姿成立，然而巴基斯坦还是察觉了它的任务并不是整合多样性，而是在一块新的、棘手的土地上铭刻其权威性。主导国家的精英们很快地就不信任巴基斯坦社会中的特殊主义，将之视为国家的道德威胁”（吉尔马丁 1998:1091）。

由于世界历史中的主权宣示必须以“国家”之名提出，于是如何定义，成了追逐权力的不同的野心家的较量。也因为民族 / 国家由其特殊文化所界定，“民族文化”亦再现了这些权力斗争的轨迹。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巴基斯坦文化的存在与内容，都一直是巴基斯坦历史中的争论主题，最激烈的争议可以追溯到政治动荡不安的时期，特别是那些哈伯马斯 (Habermas) 所说的“合法性危机 (legitimation crises)”（哈伯马斯 1975）。

只要巴基斯坦的国家认同与文化尚未找出其“巴基斯坦特质”，巴基斯坦民族国家的合理性就依然是危险的，毕竟一个国家的真实性，取决于是否存在特殊的“民族 / 国家文化”。定义国家文化成为巴基斯坦知识分子（与国家精英）的当务之急，有几个原因。而“没有”一个可定义的国家认同，造成民族结构的认同危机，多年来这种焦虑都不仅表现在巴基斯坦知识分子的著作中，也表现在公共场域中的一般民众上，诸如报纸、文化与文学批评、论坛等等。例如，一位活跃的自由派（西）巴基斯坦知识分子贾米尔·贾里毕（Jamil Jalibi），他宣称，因为巴基斯坦没有国家民族文化，所以“国家”

一词并不适用。<sup>15</sup> 贾里毕也于 1965 年战争结束后提到，巴基斯坦文化的无法定义，后果等同于违反国家安全，因为“（如果）有人攻击我们的疆界，或占领土地，我们会马上感觉得到，然后会付出一切来赢回我们的土地。但如果这种攻击是针对我们的文化，我们根本不会发现，也不会有失落感（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文化疆界在哪里）”（贾里毕 1964:25-26）。

对建国而言，论述巴基斯坦独特文化的匮乏，仍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则另有原因。身为统治阶级的政党穆斯林联盟，如果它的道德权威来自自身为一个“国家”政党的这个事实，这肯定对遭受质疑的“国家”本身毫无帮助。关于国家认同危机也深深地连结到后独立时期中“政治”领域的离心倾向。对区域 / 省级权利的要求与任何对中央政府的质疑，都会被视为对国家的直接挑战。

这段时期的政治，不管是文化上的或是其他，都被为控制民族国家这个术语而展开的斗争最终框定，因为后者同时代表了意识形态的与结构（政治、经济、体制）的意义。

### 东孟加拉的道德规训与问题

巴基斯坦刚成立的 24 年间，（西）巴基斯坦统治阶级以限制、破坏东孟加拉在国家政治上的影响力，作为占领前的准备工作。东孟加拉是巴基斯坦人口最多的省份，占总人口一半以上。“孟加拉联合国”（United Bangal）亦曾在穆斯林民族主义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当（全印度）穆斯林联盟于 1906 年创立于达卡（Dacca）时，

.....  
15 这篇文章中，贾里毕作为此时期一个自由主义现代派的知识分子的代表；费兹（Faiz Ahmad Faiz，诗人、记者）代表的是马克思主义；赫加齐（Naseem Hijazi，小说家）代表宗教右派等等。

其中许多领导人如侯赛因·沙希德·苏拉瓦底（Hussain Shaheed Suhrawardy），即为著名的孟加拉人。然而，西巴基斯坦中来自旁遮普省与乌尔都语母语的穆斯林侨民（Muhajir）统治阶级并无意分享权力，尽管他们曾试着与他们的孟加拉同伴合作；只要穆斯林联盟对东孟加拉的统治依然存在（但不会太长久，由于其对东孟加拉的镇压政策的缘故），就有可能如此。东孟加拉有政治觉醒与政治行动的历史，巴基斯坦建国之后，市井小民的战斗意志与政治觉悟也渐渐上升，这点威胁着西巴基斯坦。<sup>16</sup> 他们为了遏制西孟加拉邦、同时否认其政治权力，无所不用其极，巴基斯坦从国家立法机关与议会中提出复杂（但却是假的）政治公式，到由于害怕省级的穆斯林联盟会失败，而拒绝如期举行省级选举，再到选区划分的不公正，将西巴基斯坦的省份巩固至一个单一的行政与政治单元。

### 乌尔都 - 孟加拉冲突

透过民族文化的评量准则，统治精英对道德规训的第一个尝试是，镇压孟加拉在民族国家之内对文化与象征符号的需求。这首先表现在孟加拉语言委员会要求孟加拉语也应与乌尔都语一样、成为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这项议题上。这看似似乎是很合理的要求，因为孟加拉人也是巴基斯坦人口组成的一部分；然而，中央政府的不够宽容与难以沟通，将这个合理要求变成一个长达5年的全国性危机。此“争议”的高峰，为警方在1952年2月21日于达卡的和平示威活动中射杀多名民众与学生，此事件后来以“Ekushey”（孟加拉语中的“21”）为名作为纪念，亦有用它自己的语言来称呼的烈士，如“沙希德塔”（Shaheed Minar）。此悲剧与导致的政治风波过后，

16 比方说，东孟加拉于1950年代早期便制定了影响深远的土地改革政策，吓坏西巴基斯坦的统治阶级。

中央政府终于宣布孟加拉语为巴基斯坦的第二官方语言。<sup>17</sup> 此要求曾被视为不过只是煽动叛乱的行为，而这项让步只是让情况更糟——一切都只是政治权宜之计。

特别是西巴基斯坦的知识分子，以及一些孟加拉统治精英（他们曾是泛印度穆斯林贵族阶级，保有如蒙兀尔帝国 / 波斯社会上流文化般的习惯，例如使用乌尔都语）对此要求的反应，是全面性而且扑天盖地的。人们可能会认为，孟加拉人阅读制宪大会报告（使用英文，更不用说是乌尔都语！），即是一种对文字的亵渎。孟加拉提出的主要论点为，既然巴基斯坦已经以伊斯兰之名被建立，为何只有乌尔都语（被视为是印度穆斯林的文化符号与资源）有权利被指定为巴基斯坦官方语言；这其中的意思是不是认为孟加拉语（与其代表的孟加拉文化）不够资格作为官方语言，因为孟加拉语不够“伊斯兰”？毕竟，孟加拉语从它的字形与生字都受到了梵文与印度教文化的“腐败”影响。这种说法认为孟加拉文化造成的孟加拉语并不是真的源自穆斯林，所以也不够巴基斯坦。被印度教文化与艺术束缚，让他们对像是古典舞蹈和泰戈尔等等产生兴趣。<sup>18</sup> 随后，孟加拉更大的政治自主诉求同样被认为他们从来就不是真的够“巴基斯坦”，这样的“常识”使得国家更能合理地以各种形式进行镇压，直到1971年于东巴基斯坦的军事行动。<sup>19</sup>

乌尔都语并不流利的真纳，在1947年末、1948年初孟加拉提出第一个诉求时，曾告诉达卡大学的学生作为巴基斯坦唯一国家语言的乌尔都语，是无法被取代的，其他的说法都是为了政治目的而利用学

17 然而，多位孟加拉成员在随后多年的制宪会议上，证明这不过只是形式上的。

18 泰戈尔的诗曾被明令禁止在东孟加拉的电视或广播频道中播出，并且吟唱这些作品被认为是煽动行为。东孟加拉认为不论对印度教徒或伊斯兰教徒而言，泰戈尔的诗歌都是孟加拉文化的一部分。

19 此时西巴基斯坦精英对待孟加拉的态度，也随着时间变得更种族中心化，并导致西巴基斯坦于1971年内战时期的恐怖行动，其中，强暴孟加拉妇女被视为是在合理地“净化”她们的“种族”。

生。孟加拉语的需求被诋毁为“地方主义病毒”，如同间谍（被影射或含糊地暗示为共产党员、或是“来自边境”的“印度教”元素）般的存在。我在其他地方（托尔 c2000）曾表示过，这种地方主义和不断升级的指认的话语，将东孟加拉 / 东巴基斯坦视为煽动叛乱的空间，是此一时期影响国家形成的关键方式。这也讽刺地表现在孟加拉的分裂上。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印度 - 伊斯兰文化成为巴基斯坦民族文化的基础，与孟加拉于 1971 年发生的谋杀与强暴事件，两者有直接关系。我试图想开展的讨论是，定义民族 / 国家文化的方式对于人口组成有其实质后果，尤其是对于那些被排斥、边缘化、或在“国家”定义下的狭小范围的群体。

### “划归一省的区域整合计划”与“对等”政策

基本原则委员会报告书的原始版本——被认为是第一部宪法的草案——于第一次的制宪大会上被提交，其中提议立法机关“将占人口比例高的东孟加拉，转变为议会中的最少席次”（卡拉德 [Callard] 1957: 92）。如此减低东孟加拉影响的努力，实际上是巴基斯坦政策上的一贯特点，西巴基斯坦的建立本来就无意分享权力，更遑论让孟加拉占上风。在东孟加拉的群众特质变得明显之后，这种意图就更加剧了，首先发生的，是后来转变为更大的区域自治运动的语言运动，以及接着的中产阶级与农村群众于人民联盟（Awami League）与巴沙尼（Maulana Bhashani，政治领袖）下的结合。1954 年，东孟加拉的地方选举（在压力之下，穆斯林联盟勉强称之为地方选举）结果吓坏了统治精英们，穆斯林联盟被打得溃不成军，胜出的联合阵线（United Front）包括了人民联盟、农夫劳工党（the Krishak Sramik Party）、内

扎伊斯兰党 ( the Ganantari Dal, Nizam-i-Islam Party ) 与青年团 ( Youth League ) 。此结果立即导致了东孟加拉被强制实行总督统治。

并且，于 1954-55 年间，西巴基斯坦的建立，将西巴基斯坦的各省结合成为一个单一的行政与政治单元，用以破坏新宪法提出的，在联邦系统的比例代表原则之下东孟加拉本来势必取得的边界。1954 年，现有内阁解散，因此结束了第一次制宪大会，无法通过西巴基斯坦统一法案。该法案已经遭到来自东巴基斯坦成员、以及那些西巴基斯坦“小”地区的成员抗议，他们担心的没错，这项法案破坏的不仅是东巴基斯坦的权力配额，还有他们的自身位置。地域领导人的改组导致了一组精心挑选的、不会出问题的人马，接着几乎不意外地，法案通过了。

但这对的争论十分引人入胜，不仅让我们窥视到了正在上演的强权政治，还因为他们描绘出的散漫地形。

讽刺的是，西巴基斯坦省份统一的主要理由，是“印度河论述”的其中一个版本<sup>20</sup>，长期以来一直被左翼知识分子阐述，特别是——马姆塔兹 ( Mian Mumtaz daultana )<sup>21</sup> 反复提及的——米安伊夫提哈鲁丁 ( Mian Iftikharuddin ) !<sup>22</sup> 我应该从马姆塔兹对“划归一省的区域整合计划” ( One Unit ) 表达支持的演说中摘录部分来显示，印度河论述是如何被用来证明西巴基斯坦一直以来就是一个有机并自然的

20 将印度河流域文明视为一个对巴基斯坦文明的重要面向，是左派份子与巴基斯坦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一个熟悉的世俗举动。这个古老文明，与巴基斯坦文化中的健驮逻国时期的所在，从一开始就是争辩的主题。

21 马姆塔兹是政府方的要角之一，他以草案起草者的身份而广为人知。他曾于 1953 年反阿赫迈底亚 ( anti-Ahmediyya ) 暴动发生于旁遮普省时，担任此处的首席部长，并以专案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追究责任。

22 米安伊夫提哈鲁丁是一位社会民主主义者，却也是巴基斯坦左翼共产党的最重要赞助人，特别是透过跃进出版有限公司 ( Progressive Papers Ltd. ) 提供诸多平台，包括就业。跃进出版公司的众多出版品皆对巴基斯坦带来重大影响，同时也是提供左翼观点最重要的平台，而提供左翼观点这也是阿尤布 ( Ayub Khan, 军事强人，第二届巴基斯坦总统 ) 于 1958 年取得政权时，跃进出版公司作的第一件事情。

文化整体。事实上，根据马姆塔兹，此整合与合并并不只是出自巴基斯坦运动本身（！），更是因为长远的历史进程。作为法案介绍与实施的方式与动机，马姆塔兹漠视批评者的抗议与理论，他认为：“我们应该考虑的、以及问题的重点是西巴基斯坦的整合是否是一种自然的集大成、自然的结果、一种自然的体现；或者是相反”（马姆塔兹 1955:337）<sup>23</sup>。

但如果这都不够有说服力，马姆塔兹还引用了历史，人类意识的历史，“……就精神层面上来说，人类精神的发展，就像人类记忆一样长久，西巴基斯坦的历史一直都只有一个”（《巴基斯坦争论的制宪大会》：337，斜体为作者所加）这辉煌的历史正是“人类意识于摩亨佐达罗、哈拉帕、与塔克西拉的轨迹”<sup>24</sup>（《巴基斯坦争论的制宪大会》：337，斜体为作者所加）。再一次，无可辩驳的证据，“从很早很早的时候，我们的历史就是一脉相承的”；“摩亨佐达罗、哈拉帕、与塔克西拉，与迦腻色伽王一世帝国（the great Empire of the Emperor Kaniska）以来，几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是以一统的面貌在面对着世界。主席先生，我们一直都是并肩作战着，我们有相同的敌人，面临相同的问题，我们达到一致的整合，我们也对一样的挑战作出了相同的回应，源自远古时代……事实上，印度河流域地区的整合给了整个印度半岛第一个整合概念。主席先生，在复杂多样的印巴次大陆中，连局外人都可以认知到我们的一致性，这是来自于我们的土地，一个之后衍生出‘Hindu’和‘India’等字的，这块叫做‘斯迪胡’（Sindhu）的土地。这就是创造出印度地区人民团结观念的整合性。从一开始，从摩亨佐达罗到为了自由与英国对抗之时，无一例外的，我们都作为一个群体，

23 所有来自制宪大会的参照，包括引述像是马姆塔兹等特定成员的发言，皆列举在巴基斯坦的制宪大会的参考书目（Constituent Assembly of Pakistan Debates, 1955-56）中。

24 Mohenjodaro, Harappa, Taxilla 皆为印度河流域与今巴基斯坦地区的古文名——译者注。

主席先生，我们不只是合作，我们是同一条心。”（《巴基斯坦争论的制宪大会》：339，斜体为作者所加）

因此，这个例子不仅造成西巴基斯坦的历史性的统一性，同时它也断言就是这种团结性启发了印度地区的统一。这导致随后孟加拉的反对党成员插话，表示这根本就是“大印度”<sup>25</sup>的起死回生，并明显地摒弃印巴为两个的民族/国家理论。但当马姆塔兹谈论到“高层心灵传统境界”时，情况又更加有趣：“再一次，从第一天起，西巴基斯坦的人们一直都接受着同样的精神遗产、同样的心灵方向，不是说只有今天或是七八百年前。甚至在伊斯兰的荣光降临之前，西巴基斯坦的理念与思想一直都是是一致的。”（《巴基斯坦争论的制宪大会》：339）

接着，这是身为穆斯林联盟政治成员的马姆塔兹，最饶有趣味的举措：“是西巴基斯坦将它的神秘愿景给了印度教，《梨俱吠陀》典籍。当最初的精神性启发已经在仪式、迷信泥沼中失去了方向，并且乔答摩<sup>26</sup>的教导时机已成熟时，我们认真对待，并非透过再现阿育王时期，而是透过那个光荣时代、我们自己的迦腻色伽王一世。”（《巴基斯坦争论的制宪大会》：339，斜体为作者加注）

这样的声明的重要性很难被理解，除非人们记得伊斯兰教对于穆斯林联盟而言，一直都是用来对应巴基斯坦民族主义的必备条件。回想一下，例如，孟加拉语与乌尔都语的冲突，中央政府说法的重点是：巴基斯坦的基础为伊斯兰的文化与文明，而孟加拉语正因为不够“穆斯林”的缘故，不够资格当做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这样的历史叙述终于由马姆塔兹的阐释而取得了“伊斯兰性”，但却是透过希腊的影

25 Akhand Bharat, 原文字面意义为“未分离的印度”——译者注。

26 释迦牟尼的俗姓——校者注。

响：“……在我们的存在之中的最后圆满，在我们思想中的最后发展与颠峰，当我们听见了来自伊斯兰的高贵信息，我们会毫不迟疑地接收，而不是透过冲突。但在伊斯兰教出现的第一个世纪之内，西巴基斯坦像是整个被照亮了一样。而一旦接受了伊斯兰教，不管这个地区有多少冲突发生、多少沧桑与磨难，处于世界文明中的枢纽，主席先生，我们一直都是坚定地守护着它，我们从来不走回头路，我们也从来没有妥协。这的确是直到今日我们都十分自豪所拥有的崇高遗产，因此，主席先生，在文化与精神上，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巴基斯坦争论的制宪大会》：340）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国家认同的主张，而不像只是一个政府官员的场面话（即使它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这不仅对一个声称“地方主义”在合理化的地域需求前只占有一点点价值的政府代表而言难以置信，如果西巴基斯坦在“文化与精神”中形塑了“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的这种说法是真的，那么它又离开巴基斯坦去了哪里？事实上，马姆塔兹不吝于展现对前伊斯兰（特别是印度教）时期的崇拜之情，因为这些是巴基斯坦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这也导致反对派成员的惊讶，并且反驳，认为这种说法简直与印度的民族主义者没有两样：

“主席先生，我想知道我现在到底是在听我们的朋友，马姆塔兹先生演说关于西巴基斯坦的不可分割性，还是我在听拉金德拉·普拉萨德（Dr. Rajendra Prasad）<sup>27</sup>，于达卡国会议程中谈印度的不可分割性？”

（《巴基斯坦争论的制宪大会》1955 - 56: 68）。另一位来自东孟加拉的成员也爆发了：“主席先生，请允许我这么说，如果大家在国会中都闭上双眼，把马姆塔兹先生的名字替换成萨达尔·瓦拉巴伊·帕

.....  
27 印度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译者注。

特尔 (Sardar Patel)<sup>28</sup>, 或是甚至换成甘地, 然后把“划归一省的区域整合计划”这个词也拿掉, 换成“大印度”<sup>29</sup>, 并且整个发言是发生在与印度玛哈萨芭的会议上, 整个印度玛哈萨芭都会对我们的马姆塔兹欣喜若狂地咏唱赞美的! 他心中的伊斯兰或者萨达尔·阿米尔·阿赞 (Sardar Amir Azam)<sup>30</sup>, 心中的伊斯兰在哪里?<sup>31</sup> 如果你仔细听听他的演讲, 他参照的是公元前 4000 年的文明, 你就会知道他非常以此为傲, 他引用摩亨佐达罗, 他提到哈拉帕, 他提到阿育王。如果你属于那些文明, 为什么你却在这里呢? 为什么不到沙贾汗 (蒙兀儿帝国的皇帝) 建造的清真寺去呢? ……他的那些引用真的让我很痛苦” (《巴基斯坦争论的制宪大会》1955 - 56: 571)。

正如我刚才指出的, 通过破坏损坏巴基斯坦意识形态的伊斯兰基础, 马姆塔兹的言辞中, 没有为东孟加拉在巴基斯坦国家计划中保留任何位置。如果说人民与西巴基斯坦土地的连结是一项宗教之外的历史, 那么东孟加拉与西巴基斯坦的连结, 还算是天然并有机的事实吗? 显然, 统一为一民族国家的基础不只是天然和有机, 正如一位孟加拉成员说的那样: 你的存在可能是由于这个文化 (即印度河流域文明), 但我不明白这样的理论下东巴基斯坦的位置又在哪里? 这些关于东西巴基斯坦一致性的讨论是不是都是空的? ……那又是什么连结了东西巴基斯坦呢? (引述自玛里克 [Malik] 1963: 267)。

东巴基斯坦人不由得觉得, 马姆塔兹是以西巴基斯坦的古代史, 轻视东巴基斯坦的领域、文化与历史传统。会议中, 诺尔乌拉曼

28 印度国大党领袖, 也是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副总理和内政部长——译者注。

29 Akhand Hindustan, 从字面上意思为“不可分割的印度”, 它也是印度国大党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用来抗衡诉求为印巴分离的穆斯林联盟的口号。它于是也与激进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印度玛哈萨芭” (Hindu Mahasabha) 产生关联。

30 巴基斯坦政治家——译者注。

31 身为该法案的实际推动者, 马姆塔兹策略性地没有在会议中介绍自己。

(Noor-ur-Rahman) 持续批评“我们有自己的历史与英雄们，例如拉贾姆·莫罕·罗伊(Raja Ram Mohan Roy)<sup>32</sup>，我们每个人，印度教徒或穆斯林，都对他们伟大事迹感到自豪。”(引述自玛里克 1963: 267) 如果泰戈尔被提到的话，可能会更贴切，考虑到他在东孟加拉邦的穆斯林联盟政府手中遭受的待遇，以及由于其所谓的“印度教”影响而对孟加拉文化的蔑视态度。

在对马姆塔兹的回应中，米安伊夫提哈鲁丁(Iftikharuddin) 精明地表示，其偏爱于西巴基斯坦的历史文化争论，在论述的某些方面是来自于马姆塔兹：“我来自旁遮普的聪明友人，剽窃了我在过去四年对西巴基斯坦的统一运动中发表的言论”(《巴基斯坦争论的制宪大会》1955-56: 608)。这样的转折是很惊人的，他语带讽刺地说，鉴于马姆塔兹的过去记录，两个版本的“基础原则委员会报告书”(Basic Principles Committee Report) 他都签署了(《巴基斯坦争论的制宪大会》1955-56: 608)。<sup>33</sup> 无论如何，声称马姆塔兹只是在重复米安伊夫提哈鲁丁的论点是一个重要警告，关键区别在于他们论述的政治项目，与应该采用哪一种统一形式，特别是“以联邦(federal) 还是统一(unitary) 的形式来整合西巴基斯坦。我认为联邦的统一形式将更为持久，也会更民主，相对于单一整合的统一，这就是差别”(《巴基斯坦争论的制宪大会》1955-56: 609)。

更不用说，这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差别！<sup>34</sup>

马姆塔兹谈话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因为他预期会受到指控(并且自

32 罗伊有印度文艺复兴之父之称——译者注。

33 两个版本的报告书都被东孟加拉反对党议员批评，因为他们认为其提出的立法机构中，孟加拉多数人变成议院少数，并且还重申乌尔都语是唯一的官方语言，有如孟加拉语言运动中的一记耳光。米安伊夫提哈鲁丁的嘲弄，是指在两个版本中，都让伊斯兰教成为巴基斯坦民族国家的核心。

34 米安伊夫提哈鲁丁的修正案突出一个事实，即特定的民族主义话语中的文化内容里，无法读出意图、兴趣与效果。注意是什么人在阐释这些话和政治项目是很重要的。

我辩护)，于是先发治人，这是一个带点冷嘲热讽，并且十分政治机会主义者的举动。“划归一省的区域整合计划”的反对党不只来自西孟加拉，即使大家都知道在人数上动手脚是整个计划背后的原因，西巴基斯坦中来自各个“小”省份的精英们并不对纳入旁遮普主导的地域管理有兴趣，马姆塔兹必须先解决这些指控。他宣称，说“划归一省的区域整合计划”是一种主张旁遮普霸权的说法并不是真的。事实上，这根本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并没有“旁遮普”这个东西（来自于经验法则：统治阶级并不会对它“自身的”文化过多依恋，并且会愉快地否认这会对其统治有所帮助）。

“……主席先生，我们所害怕的旁遮普邦并非是一个民族实体，它也不是一个语言实体……同样地，旁遮普并不是又复杂又绝望的历史经验……因此，主席先生，旁遮普是什么？旁遮普只是一个方便的词汇，旁遮普实际上是一个地域表达方式……如果旁遮普的边界不存在，就没有什么可以区分旁遮普”（《巴基斯坦争论的制宪大会》1955-56: 355）。

根据这样的逻辑，没有一个实体能够被指控试图在践踏其他省份与民族的权利，不仅如此，西巴基斯坦不同省份的整合，实际上可以被视为一次解决旁遮普邦所有不信任的方式。

“…主席先生，人们总是害怕著旁遮普，但这真的没有什么。事实上，那些怨恨旁遮普的人、那些认为旁遮普在这个国家中代表着不正当性的人，对他们来说真正的解决办法就是削去旁遮普的边界……”（《巴基斯坦争论的制宪大会》1955-56: 356）。

为了进一步证明旁遮普并没有任何阴谋，马姆塔兹指出，根据条例草案的规定，“旁遮普人”（随后多位反对党成员指出，这些人并没有经过咨询）“大方地让步并接受40%的代表比例”而不是因为他们人口众多就占有大多数（当然，这是在只维持10年的情况之下）。马姆塔兹把它说得像是一份对其他省份的“礼物”一样，特别是对东孟加拉，以及，谦

虚地，“这是政治思想史中最爱国的让步行为”（《巴基斯坦争论的制宪大会》1955-56: 356）。按此逻辑，“划为一省计划”的整合绝对不是对东孟加拉人民的阴谋，反而是确保东孟加拉的权利！这是巧妙的一手，因为西巴基斯坦的人口总和会被用来对付东孟加拉的人口优势，所以旁遮普的人口从来都不是真正的问题。另一个更惊人的无耻举动，“划归一省的区域整合计划”甚至以“刻意满足孟加拉区域自治的要求”来自我辩护。

很明显地，西巴基斯坦的整合并不是关于文化、历史，或是地理，就如同柯瑞根与萨耶尔提醒过我们的一样，融入民族国家，在本质上，并且总都是基于强制规则(enforcing rule)(Corrigan & Sayer 1985: 6-7)。在这种情况下，它改变了巴基斯坦本身的政治格局，也限制了一般巴基斯坦人的政治想像。此外，“划为一省计划”法案如同它标题明确表示的那样：“西巴基斯坦的成立之草案：借由整合各省州来建立西巴基斯坦，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用途”（斜体为我所加的重点），并不只是关心“西巴基斯坦”疆域中实质管理的巩固。事实上，“划为一省计划”中的“其他用途”，正是在“对等”系统中将西巴基斯坦新省份与正式更名的“东巴基斯坦”对立起来，也由此有效地消除了东孟加拉占据主导地位的危机。的确，如果没有西巴基斯坦的巩固，东孟加拉因为据人口比例就会取得主导地位，必须结合所有非孟加拉的省份（也刚好它们全都在西巴基斯坦）才能保证这不会发生。

由于西巴基斯坦成立的这个举动注定要被批评者理解为是“孟加拉”对抗“旁遮普”，马姆塔兹的“澄清”重申，米安伊夫提哈鲁丁被迫在回应中说明旁遮普的人民，完全地独立于西巴基斯坦的统治精英，因此，西巴基斯坦的政治阴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影响到西巴基斯坦的人民。事实上，如果他们依照统治精英过去的经验，他们什么好处都拿不到。米安伊夫提哈鲁丁提醒议院，可能这看起来很残忍，但西巴基斯坦

的人民其实比起东孟加拉，在西巴基斯坦建立的影响下遭受到更大的压迫。其中“东孟加拉人民享有的公民自由，甚至根据目前的宪法，是被西巴基斯坦的我们所否认的。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里才是现在的集团想要统治的地方，透过这个基地，他们希望保持他们的当前地位，与未来的地位……先生，我的孟加拉朋友们，原谅我，他们已经完全误解、同时也无意识地表达错误。他们混淆了最危险的部分，旁遮普的人都没有恶意，请不要将当前的领导阶级与旁遮普人混为一谈，事实上，除了统治集团，从来就没有人是旁遮普人的敌人，他们否认旁遮普人公民自由的方式，在别的地方绝无仅有……他们采用特殊方式来镇压以维持他们的权利，如果他们失去了旁遮普作为基地，他们就没有地方可以去了”（《巴基斯坦争论的制宪大会》1955 - 56: 633 - 634）。

借由将旁遮普人从统治精英中分离出来，米安伊夫提哈鲁丁破坏了旁遮普民族主义的修辞，同时也破坏了建立在区域 / 族群认同上的、集体利益的承担倾向。

民事 - 军事政府机构（这令人信服地被称为是真正巴基斯坦权力的基础）对于民主进程与宪法细节的尊重程度，可由事实证明：在“划为一省计划”法案得出结论之后，总督解散了内阁与制宪议会。国家发布紧急状态，随后不久便宣布西巴基斯坦的各省合并成一个管理单元。

### 穆斯林民族主义vs 民族主义者穆斯林： 进步论（progressive）的穆斯林与巴基斯坦概念

马克思左翼对民族主义的参与，一直都是复杂的，充斥着歧义与张力。然而，对巴基斯坦左翼分子（特别是共产党人）而言，民族主义是十分不稳定的有待谈判的地带。尽管在独立之前，印度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CPI) 就赋予了穆斯林民族主义与建立巴基斯坦组织者们正式的祝福，但是大多数的穆斯林共产党人与支持者，特别是那些在进步作家协会 (Progressive Writers Association, PWA) 的人们，皆倾向成为民族主义者穆斯林，而不是穆斯林民族主义者——意即他们给予印度人特权，不是基于他们的穆斯林身份。当然，其中许多人是无神论者，所以这并不让人意外。有些人把穆斯林联盟看做是反动派的利益政党，而巴基斯坦的建国看做是共产党的要求，或至少有可能加剧族群关系间的紧张。当然，在政治局势于 1946-47 年变得更两极化时，许多在进步作家协会的知名穆斯林也远离共产党，以及 / 或者远离印度民族主义，而接近穆斯林联盟。

然而，由于地方自治是进步作家协会致力解决的问题之一，许多人觉得穆斯林联盟中的穆斯林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是建立于共有情感之上，所以他们强烈认为这不应该被支持。<sup>35</sup> 进步作家协会中的强硬派，如贾弗里 (Ali Sardar Jafri, 1913-2000) 甚至责备声名卓绝的费兹 (Faiz Ahmad Faiz, 1911-84)，毫无疑问地，费兹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乌尔都语诗人，但贾弗里认为他的诗作有太多模棱两可的地方，可能容易被穆斯林联盟或共产党人挪用。在印巴分治之后，穆罕默德·哈桑·阿斯卡里 (Muhammad Hasan Askari, 1919-1978) 对于进步作家协会中人们被迫放弃他们身份的基础，如穆斯林文化的历史与文明，以免被地方自治主义人士当做是共产党人，对这些他所谓的特殊 (以及悲惨) 境遇，都加以批评。

独立之后，在“雷纳迪夫路线” (Ranadive line)<sup>36</sup> 的影响下，印度共产党 (随后巴基斯坦共产党也是) 采取激进的左转，使得在进步作家协会中已经存在的问题变得越来越明显，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意义。<sup>37</sup> 正如我

35 这件事似乎破坏了一般对进步作家协会的理解，认为它是受控在印度共产党之下。必须记住的是印巴分治前，印度共产党于民族论述的基础上，支持穆斯林联盟独立建国的主张。

36 雷纳迪夫为印度共产党政治家——译者注。

37 见柯波拉 (Coppola) (1975)，尤其是第五章，在印度与巴基斯坦的“进步作家协会”：1947-1970。

在上文指出的，巴基斯坦左翼对穆斯林民族主义和对特别是“巴基斯坦运动”的关系，一直暧昧不明而且越来越糟，然而如果他们希望在巴基斯坦成功的话，这绝对不是长久之计，国家概念的自然化程度，（不论倾向是偏右还是偏左）必须得在民族主义框架中被阐述的这个事实来验证；民族主义项目的定义或许会有些不同，但让这个（巴基斯坦）国家存在的概念却是不容争论的。此外，左派不能忽视巴基斯坦国家认同与文化的争论，左派不但不能忽视巴基斯坦灵魂中的意识形态困境，更要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特别是因为，文化领域正是左派最有可能在南亚次大陆与巴基斯坦政治领域中依凭其文化政治的历史成而发挥影响力的地方。即使是全巴基斯坦进步作家协会（All Pakistan Progressive Writers Association，基本上为当时巴基斯坦中马克思左翼文化的所在）的强硬派，去承认民族主义中的双面性格，以及看见巴基斯坦的实际状况——作为一个多元宗教、多元文化，而没有一个既定定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也是有可能的，并将打开更多政治的可能性。

这也就令人讶异，有着巴基斯坦的首席进步派诗人、著名的左派记者、以及活跃的巴基斯坦共产党员（直到1954年共产党被禁）等多重身分的费兹，是早期参与巴基斯坦文化全国争辩中最活跃的知识分子之一。在1950到1960年代之间，费兹写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并举办多场公开讲座，也与其他著名知识分子如贾里比（Jalibi）于巴基斯坦国家广播电台中展开辩论。1960年代晚期，费兹接受政府邀请，主持文化与艺术委员会。不幸地，他提交报告的时间正好遇上全国反对阿尤布·汗（Ayub Khan）的风潮顶点，而被暂时搁置，然而它在随后1970年代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Zulfiqar Ali Bhutto）时代时，成了巴基斯坦文化政策的蓝图。

费兹对此报告的介绍，是将文化定义为包含为物质与意识形态两种元素，并且两方都有其空间 / 地域、现况 / 历史等面向。另一方面，他认为“意识形态成分可能包括超越地域与超越时间的元素”，当然这是他对于巴基斯坦文化的定义，可以同时容纳穆斯林民族主义历史与巴基斯坦文化地理的现况；这意味同时认可部分巴基斯坦的民族文化历史可以和印度共享的可能性，并接受包括在巴基斯坦境内的文化传统原住民，尽管他们几乎与伊斯兰或印度的穆斯林高级文化无关。但这非常困难，他必须展现他超凡的言语与智慧。

借由重申巴基斯坦知识界内公认的真理，费兹认为：“在巴基斯坦成立之前，我们都可以理解，并没有巴基斯坦国家这样的实体。〔……有政治共同体，但并非民族与地域的连结……〕因此，当新巴基斯坦民族的文化出现时，它并非已经完成的、现成的统一实体……而是一个多元化模式的复合”（费兹 1968:15）。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费兹企图建立国家（主义）的方法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与充满界线的。他继续说：“尽管如此，在巴基斯坦各地的人们皆有着共同的历史经验，以及同样的道德与文化习俗，而这些来自于他们所宣称的宗教。”（费兹 1968:15-16）。

此外，“定义这种文化的方式有极大的差异，而这里似乎有一些意见一致的地方，巴基斯坦文化包含了进入我们人民血液中的所有东西：

- 1) 伊斯兰教所提供的“人们生活方式里的道德与思想基础”
- 2) 各语言地区的本土文化
- 3) 于英国占领期间内来自西方文化的元素
- 4) 同样形塑一部分巴基斯坦民族国家的、来自少数族群的特殊文化

（费兹，1968:16）

就这一点，他直接面对巴基斯坦民族文化的当代争论，追问如果巴基斯坦是一个“意识形态国家并且它的意识形态是伊斯兰教，那么“穆斯林或伊斯兰文化”是否不足以当做“巴基斯坦文化的充分定义”？此问题在之后的公开辩论中不断地被提起，并表明“伊斯兰教作为宗教认同”与巴基斯坦概念之间的紧密联系，一直是依赖伊斯兰文化影响，而不是宗教观念。

身为一个左派分子，费兹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但他不能在这个等式中将伊斯兰教完全剔除。他解释，伊斯兰教对巴基斯坦民族/国家文化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元素，但不是全部；也就是说，这是巴基斯坦建国的必要条件，但却不充分，因为对巴基斯坦而言，伊斯兰教并不“特殊”。根据定义，一个巴基斯坦人必须：“（身为）穆斯林，巴基斯坦的人民很自然地会与其他穆斯林分享，像是共同的意识形态，共同文化资产中的多个元素，这些统称为穆斯林文化。但作为巴基斯坦人，他们也有自己鲜明的文化特质并构成其社会与国家，那些与其他信徒不同的社会与国家。”（费兹 1968:17）

其次，这种认为伊斯兰教是巴基斯坦文化中唯一基础的说法，“忽略了‘建国’，这个政治事实”，而其中“体现在独立建国存在的政治事实，这就与国家同义。它是人们在国际社会中公认的身份，建国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但只要它确实存在，巴基斯坦就仍是巴基斯坦人民的。”（费兹 1968:17）事情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除非一个人更改了自己的国籍，成为了某种其他身份。

“在苏丹或者印尼，是什么使人与他的国家分开呢？因此，除了宗教之外一定还有别的什么，就是他的国家与文化，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费兹 1968:17-18。）

借由声称“国家与文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将一体的“穆斯林”

国家性给分开了，费兹反击将宗教视为唯一合法依据的这个说法。事实上，关于文化民族主义，反对者说法的重点是（或者说一如曾经，以及我们还会再看见的），诅咒那些崇拜马杜迪的人，那些人的民族主义根本就是西方（甚至是印度教或印度）的阴谋，要来破坏穆斯林世界的团结。

在当时，占据知识分子们思虑的其他相关问题，还有“民族融合”与其对立面的“地方主义”。正如我已经表明过的，对于区域自治的要求，甚至只是象征性的要求，都会立刻被政府冠上“地方主义分子”的标签，并视做反动者。阿尤布·汗充分利用了对区域需求的这一焦虑，把“民族融合”、“民族/国家文化”这些关于“国家的”危机转变为名符其实的知识分子的家庭手工业。作为他社会工程成果的一部分，他成立了国家重建管理局（Bureau of National Reconstruction），由信息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管辖。赫伯特·费尔德曼（Herbert Feldman）在对阿尤布·汗政权前四年制度的赞美中，告诉我们“国家建设即是对人民道德与公民价值观的灌输、发展社会性格、提升文化与知识水平、协助妇女克服社会阻碍、鼓励健康的民族精神；消除因派系、区域、地方主义而造成的偏见；以及施行简约、节俭、生活品味等教学”（费尔德曼 1967:84）。

国家重建管理局经常与半私人的国家融合巴基斯坦理事会、以及巴基斯坦文化自由委员会<sup>38</sup>一起举行上述这些议题的研讨会。与那些因巴基斯坦缺乏民族融合性、即使使用最激烈的方式也要实现之，因此不断绝望又自我批判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相反，费兹认为这样的整合是不能被强制执行、也不能够被策划的。

即使费兹提出了民族融合中艺术与文化的重要性，并实际地参与

38 文化自由大会（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是冷战文化组织的一个地方分会。

国家内部体制，他依然谨慎地指出了“民族文化”无法“由上而下”地演进，必须由构成巴基斯坦的所有不同族群的人民之间的辩证过程来逐步进展。根据费兹的想法，文化问题“形塑了每一个社会中社经问题的基础结构”，所以解决方案“就在这些社经问题之中”（费兹 1968:3）。因此，一个单一并且共有的民族文化这种想法，无法被用来当做一种意识形态武器，无法在面临明显的社会、经济、与政治不平等的情况下，用以强化国家团结：“这样的社会要建立一个共同或统一的文化，必须先假设有一个统一并公平的社会结构演变。”（费兹 1986:3）这样的说法，当然在 1971 年东巴基斯坦分裂之时不了了之，不管有多少关于民族融合的研讨会，都无法弥补因“功能性不平等”与“贪婪的社会功利性”<sup>39</sup>发展下的计划而造成的裂缝，就更不用说愤世嫉俗的政治精英为了掌权不惜一切代价所导致的糟糕统治了。

## 宗教权利的主张

穆斯林联盟中的现代派认为，“伊斯兰教”是巴基斯坦基础的这个观点，也许并没有传达、或赋予政教合一正当性的这个意图，但这没有阻止它成为一个规范之内的巴基斯坦愿景。毛杜迪（Maududi）是创办伊斯兰促进会过程中关于政治与文化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这也部分能够解释巴基斯坦是一穆斯林 / 伊斯兰国家这种主流 / 官方说法，就意味着政教合一。

毛杜迪本人一直强烈批评 1930 到 1940 年代的穆斯林民族主义与巴基斯坦运动，并且对第二阶段接管领导权的现代派穆斯林颇有微辞，

.....  
39 这两个皆是在阿尤布恶名昭彰的“十年发展”下的经济政策（由哈佛顾问团指导）中被宣布的设定。就连来自哈佛大学的“好人们”都算是阿尤布所谓的“基本民主”（‘Basic Democracies’）系统的幕后主导者。

包括真纳。<sup>40</sup> 毛杜迪对于穆斯林民族主义的批评为：它给了基本上是对身份认同与忠诚（“国家”）的世俗轨迹一种会破坏伊斯兰社群的排他性，而这种排他性可能是穆斯林的唯一集体认同。在现代（即“西方”）民族主义话语下、政治上将“人民”看做是主权的民主国家思维，破坏了伊斯兰教以上帝为主权的概念。

W. C. 史密斯（W.C. Smith）在早期的巴基斯坦社会的政治民族志中，发现各界的巴基斯坦人都拥护巴基斯坦是一穆斯林国家的这个想法，然而，他们也普遍认为这一穆斯林国家并非是政教合一的（1962）。同样的研究表明，普遍于巴基斯坦人民心中，对一个“伊斯兰国家”或伊斯兰社会的欲望，事实上就是对一个“好社会”或“道德”国家的欲望。很显然地，对大多数人来说，略去“伊斯兰”这个标签不看，就意味着这是一个民主的福利国家。然而毛杜迪的伊斯兰促进会与其他伊斯兰政党联盟，成功地游说本来有既定议程的政府，于重要的立法程序下引进“伊斯兰国家”的说法，例如“目标决议”（the Objectives Resolution）以及第一部宪法。毛杜迪的伊斯兰版本与巴基斯坦建国的并不一样，或者也与由促进会选民代表的团体利益不一样〔直到齐亚·哈克的戒严体制〕），我们可以由毛杜迪主张的这些政府政策，破坏了巴基斯坦人民想要一个“真正的”伊斯兰国家与社会的愿望，随后他因煽动罪名而入狱，而清楚地看出这个事实。

费兹与其他左翼分子对巴基斯坦民族认同的理解和定义，试图提议给领土与文化的民族主义一个特殊地位。巴基斯坦左派政治的必要条件，也成为对地方自治权的捍卫。费兹甚至主张，艺术为一个重要的道德社会力量，因为它“定义了好品味与坏品味、定义了人们行为

40 先进知识分子萨夫达米尔（Safdar Mir）于1960年代晚期批评伊斯兰促进会时，毛杜迪的历史评价成为很好用的例子。

中的‘文明’与‘不文明’，与物质环境中美丽与丑陋”，因此“（艺术）深刻地对社群中的价值判断与社会行为造成影响”（费兹 1968:6）。而所有的这些都因“僭越”身份妄议道德问题，注定会招惹宗教保守右派。

对毛杜迪与伊斯兰促进会的知识分子而言，“文化”这个概念成了此时期的一个诅咒，他们认为文化为宗教的世俗替代品，指责此概念煽动人心，并重申伊斯兰教的纯粹宗教观念。然而，即使这些争论都必须要被放在“民族主义”的框架下来看：文化民族主义霸权。正如布鲁斯·科普菲尔（Bruce Kapferer, c1988）通过对澳洲与斯里兰卡的比较研究，安德森（Anderson 1983）以及其他相关文献<sup>41</sup>已极具说服力地说明，民族主义并不一定被认为是一种普遍的和铁板一块的形式，民族主义的语言框架能够容纳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化符码的多样性。<sup>42</sup>促进会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基本上是基于毛杜迪自己对伊斯兰教反动派的特别理解而来的宗教民族主义，并且将矛头指向文化民族主义，认为它是霸权式的。在他们的著作与演讲，“文化”的概念直接与共产主义相关，并且意图要破坏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基础。<sup>43</sup>

这个连结在促进会的知识分子中非常强烈，强烈到 1950 年代末同属促进会的重要成员赫加齐写了一系列广播剧，讽刺两个倒楣的“同志”被他们的领导派去村庄去“发现”巴基斯坦文化。在这些剧作的前言中，赫加齐解释这些“进步人士”（共产党人）穿上了“文化的外衣”（mantle of culture），既作为他们的文学活动受到限制的结果（先进作家协会后来被禁止），也因为他们发现这是攻击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基础最有效的武器。赫加齐回忆道，这个广播剧的故事是围绕在一群共产党人之间，并且透过“文化”的能动性“暴露”出他们对巴基斯坦伊斯兰教的心计：

41 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像是霍布斯邦（1990）和盖尔纳（1983）。

42 举例来说，科普菲尔发现了一种深植于历史的、具有平等观念的国族主义。与斯里兰卡的国族主义不同，它深深地镶嵌于社会阶序。

43 部分是因为诸如萨达尔与费兹之流的共产党人士一贯地以唯物论（因此也必然是世俗的）来理解文化。

“…当时所谓一群进步者军队以‘文化’之名，向巴基斯坦的道德与精神价值宣战，这些‘伟大的艺术家’早期藉‘文学’的名义进行猥亵的交换〔即先进作家协会中的成员们〕，而现在，由于人们对他们少有兴趣而感到失望，他们转而肩负起为文化服务的重担。”（赫加齐 1978: i-ii）

赫加齐认为，人们不应该被这样的转移重点给愚弄：

“他们的目标依然和以前一样，只是方法变了。那些年的政治环境不需要释义或者分析。我们（作为国家）的每一步都越来越弱化与退化，但尽管如此，这些‘艺术家’意识到巴基斯坦有个强大的道德与精神守护，不除去此守护的话，不可能建立对他们有利的环境。为了完成使命，他们扔掉笔杆，拿起多尔鼓与塔布拉鼓<sup>44</sup>——这些进步作家与民族融合的敌人合作并不是偶然的，他们认为区域文化是引起地方性仇恨最容易的手段……〔当时〕我们的进步作家们认为，手鼓的节拍与脚铃（ghungroos）<sup>45</sup>的清脆声响就足以撼动这个新晋民族国家的基础。”（赫加齐 1978: i-ii）

进步作家们对表演艺术形式的维护与促进，包括民谣与经典（分别由多尔鼓和塔巴拉鼓象征），以及他们对区域权利的支持（特别是东孟加拉），都被赫加齐一举诋毁。

对艺术，以及更普遍的“文化”的支持，在他的语境中成为了煽动的代名词！（此时为 1956 年，我们必须牢记在心，这同时也是恶名昭彰的、西巴基斯坦“划归一省的区域整合计划”的年份。）

在第一幕、第一场戏“搜索文化”中，副司令正在对他的部队下

44 dhols 和 tablas，传统的打击乐器。

45 系在舞者脚踝上的铃铛。

达对抗共产党人的策略：“阿利夫同志<sup>46</sup>说我们必须改变工作方式，因为我们一直无法赢得人心……我们早该明白，巴基斯坦的人民会拒绝任何明确违反伊斯兰教意识形态的理念。我们不能只是借着展现共产主义来反对伊斯兰教，应该试着将我们的口号融入娱乐性，用文化这种概念来包装，让那些头脑简单的民众比较容易明白。比方说，即使是对穆斯林，我们可以跟他们说，作为人类我们有维持文化遗产的职责……我们应该要让他们觉得人类如果没有文化就不配为人。传统与文化就是我们可以误导他们的方式……”（赫加齐 1978:1）

由于我引用过的一些关于费兹的文章，也出于 1950 年代晚期，对照之下，赫加齐的讽刺几乎就是针对费兹的批判，因为赫加齐很清楚他的目标是整个“先进作家协会”，而当时费兹就是协会中最明显的标志性人物。<sup>47</sup> 费兹在他给体育、文化与艺术委员会的报告中，强烈抨击这种对文化的反动作法，认为“这是一个主张所有文化活动与特定的艺术表现都是不道德、并且反宗教的学说。”（费兹 1968:8），并指出这样的思维方式背后的政治利益：

自独立以来，这些继承自过去的反动态度，一直都因为政治目的而被某些国内派系牢牢抓住。他们首先将所有文化等同于与音乐与舞蹈，接着将所有音乐和舞蹈都与下流和粗俗画上等号。在这样的前提下，就很容易做出“艺术都是不道德的”这种结论，于是也是反宗教的、意识形态上不能接受的。（费兹 1968:9）。

当毛杜迪与他的知识分子们使用“文化”这个字眼时，毋庸置疑地，是作为“伊斯兰文化”，但他们使用这个字的方式却和当下主流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不同，即不管是由穆斯林创造、或是诞生于各种伊

46 阿利夫 (Alif) 是乌尔都语的第一个字母 (也是阿拉伯和波斯语的)，这是在暗指米安伊夫提哈鲁丁，他的乌尔都语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即是“阿利夫”。

47 在 1960 年代晚期，费兹当时在促进会的影响下屡屡被扣上红帽子遭迫害。

伊斯兰帝国时期的艺术、文学、建筑等等的总和，他们共同构成了伊斯兰文明，而不包括受那些启发的别的形式或文化艺术作品。毛杜迪的意思为，简单来说，“伊斯兰文化”就是体现在古兰经、反映在穆斯林法典中、祈祷仪式、斋戒、施舍、奉献与朝圣等等的伊斯兰宗教信条。

这就是对“伊斯兰文化”的定义，尤其是在巴基斯坦的民族主义下，费兹似乎经常在他的讲座与广播中遇到这样的说法。于是费兹试着定义、解释，并把它放在巴基斯坦文化里的“伊斯兰”面向，避免变成伊斯兰促进会那样的宗教性说法。然而，费兹对于巴基斯坦文化复杂性的入微观察，与他对边缘性的敏感，并无法吸引那些只想要简单答案的人。从广播节目上与一些大学讲座中的演说，可以看见他总是反复地、令人沮丧地，回答着相同的问题：“我们难道不能不认为巴基斯坦文化就是伊斯兰文化？”（费兹 n.d.:21）。这些状况下，费兹运用了公认的想法，也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必须对其民族国家具有特殊性，那些特质并不能与其他民族国家共享，来策略性地阐述不能被理解成伊斯兰促进会那样的方式的巴基斯坦文化概念。<sup>48</sup>

例如，在回应此类的问题时，费兹回答：“伊斯兰文化〔信仰的部分〕有一些方面是内部的，也有在历史和地理环境背景下国家的外在形式。这并不表示它们就是分开的，但这两个面向结合起来，形成所谓的‘民族/国家文化’。所以巴基斯坦文化并不只限于巴基斯坦境内，而伊斯兰教也不会被民族主义所局限，巴基斯坦文化一直都会具有伊斯兰教的特质。事实上，你可以称之它为巴基斯坦伊斯兰文化，但不能只说它是伊斯兰文化，因为伊斯兰教并不是专属于你一个人的特权。”（费兹 n.d.:21，斜体加注）

问题依循着这样的模式，“……如果每一个伊斯兰国家的文化都由

48 这些复杂的反驳也指出了将“宗教”从“世俗”中分离出来的困难，并且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费兹不断尝试从世俗/自由派/左翼观点中，各个之间做出区别，或至少就文化观点延伸其“宗教”意义。

其特定的地理环境产生，而并不是‘伊斯兰教的’？那是不是表示也就没有‘伊斯兰文化’这样的东西呢？”（费兹 n.d.: 24）。对此费兹回应：“由于伊斯兰教是一个普遍的宗教信念，因此每一个穆斯林国家的文化都是伊斯兰文化…但同时，每一个伊斯兰国家也都有其民族 / 国家的文化，这两个并不冲突。”（费兹 n.d.:24）

在此，费兹停下来，并举伊朗为例，伊朗对它的文化保持了伊斯兰教与前伊斯兰教的观念，费兹认为就是这两者的结合使得波斯文化更加独特，“如此，巴基斯坦文化同时具有伊斯兰特性和巴基斯坦特性，但你不能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就是伊斯兰文化，因为伊斯兰文化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文化……”（费兹 n.d.:24）

一位学生提问到，是不是把巴基斯坦文化想成“伊斯兰文化”也不会让事情比较简单，费兹对此宣称“……尽管两个国家之间有共同的信仰，其他共同的特性也很多，我们也无法把一个国家的文化完全套用在另一个国家身上。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或许也不应该使用巴基斯坦这个字……但如果我们这么做了，而我们也接受巴基斯坦这个国家，那么显然地，如果属于这个国家的独特文化之前不存在，我们就应该去创造它；如果已经存在，我们就必须去拥有它。巴基斯坦并不是伊斯兰教，巴基斯坦是一个地域名称，是一个国家的名字，并不是宗教的名字。如果你不称自己为巴基斯坦人，也否认你的国籍，那么或许就有可能；但如果你坚持这个国家身份，那你就必须持续你的国家文化，你也就不能认为这个国家文化是其他国家文化的一部分。”（费兹 n.d.:35）

我们在此所看到的，是将“宗教世界观”、“基本上以宗教来理解政治与社会秩序”替换掉的企图，这对民族主义的世俗化有利。但事实上这是一个相当困难并且巨大的政治进程，尽管“国家”的概念有其霸权性，由费兹讲座上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就可以看出；费兹试着尽可能地让宗教因

素从（民族）文化中脱节，以回应巴基斯坦和伊斯兰文化并不只是相关的争论，这样，巴基斯坦文化就不只是本质上是多元性质的伊斯兰文化中的一种样貌，而是同一回事。把意义局限在有限并且一神论的伊斯兰文化内，对尤其是巴基斯坦这样多元化的民族国家来说，只能灾难性的。

但是，假使我们将伊斯兰因素从巴基斯坦的建国基础中移除，又该怎么使东孟加拉之于巴基斯坦的意义合理化呢？回答为什么东西巴基斯坦应该是一体时，费兹被迫承认“共享宗教是最大的原因”，但随后又表示这并非两个地方之间的唯一关联。他想出的替代说法却不能让人信服，其中一个“历史的连结，几世纪以来我们都属于同一个政府以及国家，随后也发展出相同的文化。我们的清真寺和坟墓看起来是一样的，而我们的学者也和他的学者交流频繁，因此我们与他们之间有很多关联性，那些是我们和其他穆斯林国家之间没有的。”（费兹 n.d.:49）

然而，如果我们必须避免“宗教”成为巴基斯坦民族国家认同的唯一条件，避免以“印度河流域论述”作为一个东西巴基斯坦之间共享文化与历史的说法，那么，就意味着，两个地区之间唯一的联系，即是政治关系；而这种说法将真的成为异端邪说。此外，这些关联性的参照再一次打开了巴基斯坦那些未曾言明的、与印度共有的“文化”与“历史”，于是这也证明了，巴基斯坦的建立纯粹只是以文化为基础，是不可能的。

## 结论

就如柯瑞根与萨耶尔指出的，一旦说到“国家的名字与语言”，“都会否认被言说的特殊性（以及说的人是谁），并将替代方案与挑战，皆定义成断章取义的、自私的、局部的，最终将导致叛国的。”（柯瑞根与萨耶尔 1985:195）。当“建国”的政治修辞与“文化”结合，我们得到了一个强有力的混合物，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民族 / 国家文化”——它远

不是一种综合一体的力量——而总是成为在民族国家之中过度频繁地引发激烈争论的所在。在巴基斯坦，国家文化的定义因其双面刃的性质，对建国者与其反对者都同样重要。国 / 边界的定义同样也是强而有力的形式，界定谁在里面、谁在外面有其战略性意义，与像是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等等替代方案一样重要，这些替代方案在给定的“巴基斯坦”的定义之下，会被判定为可以接受的或不可接受的。

从充满争议的“划归一省的区域整合计划”法案与其带来的影响可以明显看出，掌权的需求可以否决掉“民族主义”与国家建立的当务之急。正因如此，为了破坏东孟加拉与消除该地区崛起的群众政治，以及平息在西巴基斯坦的反对意见，巴基斯坦的建立毫不犹豫地抛开“两国理论”，并把穆斯林民族主义的前提当做是巴基斯坦的民族国家基础。

正如费兹指出，“文化问题并不只是与艺术活动有关”，而是紧密地与社会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其社会经济层面（费兹 1968:3）。社会中的社会公平，或者说，“基本结构的社会 - 经济问题”的解决之道，才是确保文化融合问题能够解决，并且合乎正义的长久办法。由于缺乏民族融合在巴基斯坦被看做是一个文化问题，而不是社会经济或政治问题，也因此甚至是最文化敏感性的作为，都无法面对东西巴基斯坦之间持续的不平等以及东巴基斯坦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都无法产生任何效用，且慢慢地形成“内部殖民主义”这样的说法。国家对这些需求的暴力压制，同时，借此压迫差异性与不平等，最终导致发生在东巴基斯坦对孟加拉人的血腥屠杀，造成东西巴基斯坦分裂。孟加拉的建立，通常被视作为民族融合的失败例子，但柯瑞根（Corrigan）与萨耶尔（Sayer）如此反驳，“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整合是一项计划，而在这样来自物质差异所造成的危险底下；关于这个计划的官方说法

仅只是为了镇压。”（柯瑞根与萨耶尔 1985:197）

因此，再多的文化活动与其他民族团结的试图——甚至是 1965 年与印度战争之后曾短暂出现的国家团结期间——都无法掩盖、弥补这更迭的政权下失衡的经济策略所导致的明显不平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特别在阿尤布“十年发展”的政策与其他五年计划期间达到顶点。如果没有面包，人民将无法生存。

## 参考文献

- Ahmad, Aziz (1965)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trends in Pakistan', *Middle East Journal (Winter)*: 35-44.
- Anderson, Benedict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Aziz, K. K. (1967) *The Making of Pakistan: A Study in Nationalism*, London: Chatto & Windus.
- Barlas, Asma (1995) *Democracy, Nationalism and Communalism: The Colonial Legacy in South Asi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Butalia, Urvashi (2000) *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 Voices from the Partition of Indi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Callard, Keith B. (1957) *Pakistan, a Political Study*, London: Allen & Unwin.
- Chatterjee, Partha (c1993)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hatterjee, Partha (1989) 'The nationalist resolution of the women's question'. In *Kumkum Sangari and Sudesh Vaid (eds) Recasting Women*, New Delhi: Kali for Women.
- Coppola, Carlo (1975) *Urdu Poetry, 1935-1970: The Progressive Episode,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 Constituent Assembly of Pakistan Debates (1955-56) *Government of Pakistan*, Karachi: Manager of Publications.
- Corrigan, Philip and Sayer, Derek (1985) *The Great Arch: English State Formation as*

-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Blackwell.
- Dominguez, Virginia R. (1990) 'The politics of heritage in contemporary Israel.' In Richard Fox (ed.) *Nationalist Ideologi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e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130–147.
- Faiz, Faiz Ahmad (1968)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Sports, *Culture and the Arts*, Islamabad: Government of Pakistan.
- Faiz, Faiz Ahmad (n.d.) *In Search of Pakistani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Pakistani Kalcar aur Qaumi tashakkhuss ki talaash)*.
- Feldman, Herbert (1967) *Revolution in Pakistan: a Study of the Martial Law Administr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ellner, Ernest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ilmartin, David (1998) 'Partition, Pakistan, and South Asian history: in search of a narrativ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4): 1068–1095.
- Habermas, Jürgen (1975) *Legitimation Crisis*, Thomas McCarthy (trans.), Boston: Beacon Press.
- Handler, Richard (1988) *Na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Quebec*, Madison, W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Hasan, Mushirul (1993) 'Introduction'. In *India's Partition: Process, Strategy and Mobi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ijazi, Nasim (1978) *In Search of Culture (Saqafat ki taalaash)*, Lahore: Qaumi Kutub Khanah.
- Hobsbawm, Eric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alibi, Jamil. (1964) *Pakistani Culture: The Problem of the Creation of a National Culture (Pakistani kalcar: Qaumi kalcar ki tashkil ka mas'ala)*, Karachi: Mushtaq Book Depot.
- Jinnah-Gandhi correspondence (1945 [1944]) In P.C. Joshi *They Must Meet Again*.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Kapferer, Bruce (c1988) *Legends of People, Myths of State: Violence, Intolerance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Sri Lanka and Australia*,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e Press.
- Malik, Hafeez. (1963) *Moslem Nationalism in India and Pakistan*. Washington, DC: Public Affairs Press.
- Manto, Sa'adat Hasan (1990) 'Toba Tek Singh'. In *Manto namah*, Lahore: Sang-i Meel Publications (Sang-i M̄il Pabl̄ ikeshanz)
- Marriott, McKim (1963) 'Cultural policy in the new states'. In Clifford Geertz (ed.)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The Quest for Modernity in Asia and Africa*, London: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 Menon, Ritu and Bhasin, Kamala (1998) *Borders and Boundaries: Women in India's Partition*,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Qureshi, I.H. (1961) 'The problem of national character'. In *The Problem of National Character: a Symposium*, Lahore: Pakistan Philosophical Congress and Bureau of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 Smith, W.C. (1962) *Pakistan as an Islamic State: Preliminary Draft*, Lahore: Sh. Muhammad Ashraf.
- Toor, Saadia. (c2000) *Constructing the Pakistani Nation-State: the National Language Controversy, 1947–1952,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 一个离开“网络文学”的网文爱好者的回应<sup>1</sup>

陈静\*

收到2018年冬季刊的《热风学术（网刊）》后，我“意外”地读到了一组关于网络文学的专题文章。这个“意外”是因为作为读者的自己，已经在近几年逐渐不再主动地阅读网络文学，也是因为潜意识里已经认为网络文学成为了一种主流之后，没有更多可以批判性讨论的余地。但这组文章让我在重新回顾了网络文学的历程、学习了网络文学的当代境况之后，又回到了若干年前“放弃”网络文学研究的那个时刻，也让我产生了一种想要重返这场讨论的冲动：多年过去，网络文学似乎还是在那个时刻的一种状态，没有更好，也没有更糟。而心头的疑虑却依然盘亘不去：网络文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其新在哪里？其未来又在何处？

## 亲历网络文学十年：1998-2008

作为一个从DOS系统开始读网络文学的人，我可以说亲历了网络文学发展的几个阶段。时至今日，还记得98年在学校机房和网吧读网

.....

\* 陈静，200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2007-2008年赴美国杜克大学访学。2009-2013年就职于上海交通大学人文与艺术研究院。2012-2014年在美国莱斯大学赵氏亚洲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2014年起就职于南京大学艺术学院，任艺术与文化创意方向副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文化与媒介研究、数字人文、新媒体艺术。

1 在此感谢上海大学罗小茗老师的邀请，也感谢《热风学术（网刊）》允许我写就这么一篇不符合学术论文要求的回应。同时也必须说明，此文无耻地部分剽窃了我之前发表的两篇文章，“Refashioning Print Literature: Internet Literature in China”；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Volume 49, Number 4, 2012）和《作为一种“新”文学的传统回归——关于网络文学当代困境的文化解读》（《艺术百家》，2009年第2期），以及我一直未能全文发表的博士论文《“文学终结”之后：西方电子文学文本性研究》（2009）。

■ 殊音

文时的激动心情。在一个以严肃文学为主要学习对象，读着经典长大，言情、武侠都只能是偷偷摸摸的课外不良读物的时代，网络文学为我这样的文学爱好者开启了一片全新的天地。以《北京故事》《第一次亲密接触》和《华夏文摘》为代表的第一波网络文学，以个性化的视角、私人情感的描述和新奇的网络体验为当时因为网络的出现而蠢蠢欲动、兴致勃勃的青年们打开了一个新的文学世界。在这里，青年人有青年人的语言，青年人有了表达青年人自我的最佳方式。尤其是像 BBS 这样没有专家评审，没有专业要求的平台，使得那些爱好文字，热衷表达却苦于专业壁垒和发表渠道的文艺青年们有机会在文学这一原本高不可攀的圣地中登堂入室，得以自由地发表苦闷的青春物语。那时候像我们这样，对文学还抱有一种美好想象的文艺青年们，都在跃跃欲试地期待着能通过写作、参加各种竞赛成为像“三驾马车”那样举众皆知的名人。而事实上，确实也有人做到了。

然而，这种对“技术平权”所带来的文学民主的玫瑰花般的美好幻想，也在 2001 年遭遇了第一次的寒冬。这比许苗苗博士在《情感的退场——网络文学发展中关键词的转换》中所描述的净网行动还要早十多年。互联网泡沫的第一次破裂，国家对 BBS 的管理力度的加强，共同导致了这个短暂的冬天。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很多 BBS 将加强网络管理的通知挂在了首页上。随后，大量网页运营商，包括一些提供盗版小说和正版书库的运营商，因为风险投资的撤离而宣告破产。我耽美阅读的开启之地西陆 BBS 和奇幻文学的龙的天空也在这场历时几年的寒冬中越来越“索然无味”。

而与此同时，以“起点中文网”为代表的网络文学付费模式开启了网络文学的商业化、产业化的阶段。起点精心设计推出了一套全新商业模式——VIP 阅读模式。其独特性在于：一是对网上优秀作品进行签约，前半部供读者免费试阅，后半部需付费阅读；二是以章节为单位，按每千字 2 分钱的价格进行销售，如仅选择部分感兴趣章节，费用更低；三是作者可获得用户付费额的 50%—70% 作为基本报酬，且按月结算；四是作品创作、发布、销售、反馈以分钟为间隔，作者与读者实时互动；五是尊

■ 殊音

重版权、严格准入，每个作者必须提供真实身份，对新上传作品必须声明版权所有权。

这些方式一方面保证了网络写手们的权益和网络文学网站的运营，另一方面也激发了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生产所具有的商业化潜能。一时间，写作网络文学发家致富也不再是一种神话。网络平权为个体写手所带来的巨大声誉也得以在商业消费的洪流中成功变现为现实利益。而对于像我这样的网文爱好者而言，起点中文网所代表以及引发的网络文学盈利模式却逐渐让我与网文渐行渐远。这一方面是由于从免费时代走过的读者对于用互联网盈利始终有些“天然的”排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网络文学的许多写手在利润的刺激下从最初的为了兴趣和纾解情感而变得越来越为了写作（盈利）而写作。长篇连载的小说变得越发没有章法，无止尽的绵延写作改变了文学作品本身的内在张力和戏剧性，而变得冗长而拖沓。

与此同时，随着我个人生活环境的变化，以及我对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计算机技术所具有的创作潜能的深入理解，使得我不再满足于网络文学的传统特质，而更多地开始转向对电子文学的探索和研究。在经历了三年多的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我愈发清晰地意识到，网络文学虽然号称是一种新的文学形态，尽管在很多研究者那里被赋予了很多革命性的色彩和草根的气质，但从其根本上而言，依然是一种传统印刷文学。网络改变的是文学发表和发布的方式，改变的是其生产、流通和接受的机制与体制，但并没有改变的是其线性文字书写和对文本语言的强大依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网络文学不过是传统文学的一种再媒体化和复兴。

## 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

当我们谈到网络文学的时候，一般会谈到两类：一种是纸质或者说基

于印刷的文学的电子版；第二种是创作于网络，发布于网络且只能生存于网络的文学。无论是哪种，我们都不得不承认，计算机改变了文学书写的方式。计算机作为书写的工具，或者说媒介，以键盘、屏幕取代了传统印刷文学的纸笔书写方式，使得书写活动成为了一种符码成像的方式，而内在运作的机制却被隐藏在人机互动的背后。我们只需要使用软件，而不需要关心软件是如何在计算机内部运作。图形界面对文字书写的重新编码使得文字的立刻呈现，以及网络传输的便捷、快速都使得书写本身不再如“印刷”时代那样大费周章。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有人提出，“网络时代的许诺是：人人都可成为艺术家”。

但是，在网络文学以及为之摇旗呐喊的浪潮背后，却依然存在着一个悖论：人们越来越多的对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新”文学的身份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基于两点，一是网络文学大批量生产、粗制滥造，以及人们在日积月累的阅读中不断的体验到了一种落差，从文学角度来看，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并没有根本上的不同。二是随着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合流以及与印刷文学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网络文学似乎越来越不像网络文学。这是我在2009年对网络文学的所做出的观察。很有意思的是，即使在十年后的今天，我依然对网络文学有着同样的判断。无论研究界对于网络文学如何进行界定和提升，网络文学本身却依然没有走出以印刷和线性书写为基础的传统文学的禁锢。而网络文学创作自身，依然踟躇于对文学的另类形式的延展和利益模式的探索。沿用杰·戴维·波尔特和理查德·格鲁辛（Jay David Bolter and Richard Grusin）在《再媒体化——理解新媒体》中对再媒体化（remediation）的内在逻辑，即去媒体性（immediacy）和超媒体性（hypermediacy）的讨论，我依然认为“网络文学作为‘网络’（主要是互联网）这一新媒体所承载的内容，以一种新的去媒体化的方式让我们体验到了一种新的视觉文化表征方式。”网络文学在新媒体的去媒体化逻辑下，对媒介（互联网）的特性进行淡化和透明化，而放大了文学本体的精神指向。多年来对于网络文学的所谓“草根精神”“新民间文学”“大

众写作”和“人性回归”的鼓吹呐喊，恰恰是对网络文学所蕴含的传统印刷文学观的揭示：网络文学再如何新，也是文学，与传统文学并无不同。这种非媒体化甚至去媒体化的“文学”的观念使得网络文学从诞生伊始就与传统印刷文学有着无法割离的血肉联系。而文学体制在面对新生的网络文学的挑战和威胁时，逐渐采取了一种“招安”的方式。网络文学正是以一种“新民间文学”的精神成为了传统文学体制在新的信息时代的一个有益的补充。而其根本就在于两者之间分享了一个共同的理念，即传统印刷文学的本质观。正是这种基于印刷文学传统的本质观影响了在文学体制与商业力量合谋下的网络文学，并使其在另一方面促进了印刷文学的再流行。这主要表现在：一、通俗文学的繁荣与多种文学类型在网络中的再现。大陆网络原创文学除了传统的诗歌、小说、散文和剧本体裁外，带有纪实性的心情告白、网恋故事、琐屑人生、旅游笔记、校园写真一类的作品占了很大比例。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日记、笔记、游记等更多涉及个人隐私、在印刷媒介中趋于衰落的文体却因为“赛博空间”的开放性和网络文学的大众化得到了复兴；二、促进了文学的印刷出版的再流行。这主要体现在跨媒体出版上。网络文学跨过媒介的边界，以纸质媒介的方式走下网络，不仅促进了“网络文学”在非网民中间的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纸质媒介的出版，促进了文学的发展。而纸质出版所带来的网络文学变现模式在近年来也逐渐为影视剧改变所取代。然而换汤不换药的是：传统文学体制与商业力量的合谋不仅仅逐渐地抹杀了网络文学所可能具有的“新”，更使得市场利益驱动下的受益最大化成为了网络文学发展的关键。

## 网络文学与电子文学

这种对传统的回归和复兴，不仅让我与网络文学渐行渐远，也使得我更加关注另一种计算机与文学融合的可能：电子文学。在博士学习

■ 殊音

及写作的几年间，我逐渐对电子文学的历史、发展形态及其内在的文本批评模式进行了研究。正如凯瑟琳·海尔斯（N.Katherine Hayles）所指出的，“电子文学一般认为是排除了已经被数字化的印刷文学，而是与之相反地‘数字生成’的，是在计算机上创造出来并（通常）意味着在计算机上被阅读的第一代数字对象”<sup>2</sup>。她还进一步补充道，该定义参考了印刷文学关于“文学的”的定义，同时由于其是在一个网络化的和程序化的媒体中被创造和被操作的，因此也涉及到计算机游戏、电影、动画、数字艺术、图形设计及电子视觉文化等领域和技术。事实上，电子文学是一个庞大的系统，近年来更是逐渐的与数字文化、数字人文这两个更大的人文领域合流。就电子文学与网络文学的比较而言，电子文学更加强调计算机与互联网作为一种书写技术和虚拟环境为文学创作提供的技术性介入所引发的文学变革。电子文学从定义上与传统的（印刷）文学形成了一种对照关系。由于计算机等新的信息技术的深刻渗透作用，现在的印刷文学在写作、出版的过程中都经历了数字化的过程，从书面走向了屏幕。但是，这样的印刷文学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文本的性质，而电子文学不仅是在计算机上创造出来的，而且其生存也必须依赖于计算机环境。计算机硬件、软件以及网络形成了文学的新的生存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文学的创作以及我们对其的理解都必须要以理解、使用计算机、网络等技术为前提和必需条件。可以说，“电子的”这样一个形容词不仅仅凸显的新的文学形态在性质上所具有的技术性因素，而且，提醒了我们在“印刷时代”所形成的文学观对于技术对文学的作用以及文学的物质性基础的忽视。在此意义上，由于数字技术对于商业印刷过程的渗透以至于印刷可以被视为电子文本的一种

.....

2 N.Katherine Hayles, *Electronic: New Horizons For The Literature*,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2008), p.2.

特殊的输出形式，而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媒介<sup>3</sup>。根据电子文学所运用的技术的不同，可以将电子文学主要分为超文本（Hypertext），读者合作（Reader Collaboration），录音阅读/表演（Recorded Reading/Performance），动画文本（Animated Text），平面主导（Prominent Graphics）和生成文本（Generated Text）。其中每类还分为小说（Fiction）、戏剧（Drama）、诗歌（Poem）和非小说（Non-Fiction）。<sup>4</sup>作为计算机与文学的相互作用的产物，电子文学体现诸多新的特质。而对这些新特质的理解就必需兼顾计算机和文学这两极各自的特点。虽然计算机具有多重角色，但是它对于电子文学的参与依然是依赖其技术及物质特性与基础；而传统的文学本质观被解构之后，文学不再具有一种固定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但是它对于电子文学的创作与理论既然具有深刻而有力的影响。然而，新技术所引发的文学创作及其变化，都已经无法让读者回归到“文学本质论”的起点，将文学视为一种基于文字线性书写的人性的永恒表达。

尤其是随着虚拟实在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计算机技术对于沉浸性感受和算法的依赖，使得人们越来越开始忽略现实世界的存在。正如虚拟实在哲学家海姆所发问的：“诚如康德所言，崇高是意识到自己渺小时候所体会到的那种不寒而栗；当我们有限的理解力面对无限的虚拟世界时，便会产生这种感觉，因为在这里面我们随便找个地方就能安顿下来。虚拟世界的最终目标是消解所泊世界的制约因素，以便我们能够起锚，起锚的目的并非漫无目的的漂流，而是去寻找新的泊位，也许寻找一条往回走的路，去体验最原始和最有力的另一种选择，它植根于莱布尼兹所提出的问题：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

.....  
3 N.Katherine Hayles, *Electronic: New Horizons For The Literature*,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2008), p.5.

4 参见 <http://directory.eliterature.org/>.

不在？”<sup>5</sup>海姆面对这种恐惧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修炼太极，重新达到身心合一。然而，文学却不能回到手抄或者口头时代。文学所具有的电子烙印如此之深，就如同“人人都是赛博格”的主体性宣言一样，以至于我们必须要考虑如何在虚拟实在和人工智能的技术中继续前行。

然而，作为网络文学读者和电子文学研究者的我，却有着一个不怎么美好的结局。我无法再沉浸并享受于网络文学的阅读快感之中，同样的，我也无法继续我的电子文学研究之旅。前者是因为我的走出，而后者是因为我无法走入。在博士论文写作完成并通过答辩的一段时间里，每次当我被问及或者主动谈及电子文学的时候，我都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你说的电子文学是不是网络文学？我回答是“不”，然而，当我试图解释时却发现，电子文学对技术的依赖以至于我无法用语言文字去描述技术所具有的巨大可能性，同时，我却无法说服提问者在不做亲自尝试的情况下去想象一种不同于网络文学的新媒体文学的存在。这是我的悲哀，也是电子文学在跨语境旅行中的悲哀。2015年，当我看到电子文学协会的年度会议的主题是“电子文学的终结”（ELO 2015: The End(s) of Electronic Literature）时，我静静关机叹息。

5 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45页。

## 《流浪地球》的社会想象力： “先天特色”与“后天不足”

罗小茗\*

春节档收摊，《流浪地球》票房最高，引发的评论最多，收获的争议也最大。

在这里，孩子们看到了带尾巴的地球，科幻迷看到了“科幻电影元年”，媒体看到了热点，资本看到了商机。而关于电影好坏的网络大战，则让人又一次看到，今天中国社会在运用“想象力”这个词语时的巨大分歧。

倘若中国人对想象力的使用，就是这么自由散漫，也不是什么坏事。可如果仔细看看那些讨论，便会发现，不管持什么样的正反意见，好莱坞代表全人类发挥了几十年的想象力，总是在那里做着或明或暗的参照。

这也难怪。在今天，大概很难找到没有被好莱坞安利过的想象力的人。这样那样的比较，在所难免。可问题在于，一个社会的想象力，终究不是为了与别的社会比较，也不是为了要超越别的社会而存在。它首先是为自己所属于的这个社会，而不是为资本或别的什么而服务的。

以这个标准来要求和讨论《流浪地球》里中国社会的想象力，是有意义的。这是因为，带着地球流浪这样的构想，极具中国特色，是在中

.....

\* 罗小茗，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

国社会特别的条件之下才会产生的想象性难题。

首先，人类面临一个巨大的灾难，这个灾难的始作俑者，既不是资本巨鳄，也不是政府体制，而是我们的太阳。太阳就要下岗，这样的毁灭性危机，实在是谁也怨不着。如此的脑洞，在那些想象性地批评跨国公司、邪恶敌国或腐败政府，以为自己言论自由的社会里，少有开启的可能。只有在中国，方才水到渠成。

其次，人类社会自己的问题，可以由人挺身而出，追究和改正。太阳的错误，却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应该怎么办？这似乎是一个全新的命题。不过，对中国人来，这种霸气十足的错误，也并不陌生。近百年来的被动现代化的过程，突然打上门来、让中国社会和文化变得支离破碎的资本主义文明，在某种意义上，便是这个不和你讨价还价的对手。

最后，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不存在任何政府的密谋、走上邪路的领导和包藏祸心的资本家，也没有权钱之间的灰色地带。这样一来，建造飞船，让少数人脱离人民群众逃跑的方案，自然不成立。通过抽签的方式，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放弃一部分人的性命，带着地球逃跑，才是符合当前政治文化逻辑的选择。

就此来说，带着地球流浪这样的方案，倒也不一定是因为中国人特别热爱地球、眷恋家园，而是科幻在中国社会的土壤里扎根进化出来的想象性提问。如果说，一个社会总是以各种方式想象性地处理自己的危机的话，那么这个带着地球流浪的长期计划，便是中国式的危机想象。这也就意味着，上述条件，既构成了这个奇异设定的基础，也结结实实地规定了，故事一旦展开，电影需要在哪些层面上运用想象力，才算直面危机。

既然是拍电影，第一时间想到的，大概总是地球流浪后的灾难场景。海啸、地块迁移、气温骤降等等，然后把它们变成震撼人心的特效画面。

■ 殊音

毫无疑问，这一部分是电影做得最出彩的地方，也是最受追捧之处。不过，这一部分所表现出来的想象力，虽然可以极大地满足我们的视觉享受，但并不涉及上面这个中国式的危机想象的核心。这是因为，在一场无法追责的灾难里，无论地球变成什么模样，引发我们何种排山倒海的情绪，都只是那一刻的直观感受。这样的感受，没有任何后续转化的方向。既不会变成对太阳的仇恨，也不会化为对地球的珍惜。

换言之，这一层面的宏大特效，做到极致，它的效果，也只是更好地烘托这个地球流浪的难题，而不能正面回答它。特别是，当地球以这样的方式开始流浪，实际上是一个中国社会特有的想象性问题的時候，更是如此。

第二层的想象，是关于流浪后的地下社会。按照电影的设定，有待想象的是全球联合政府宣布流浪计划后17年，地下社会的模样。这不光是指技术方面的变化，也不在于生活条件如何艰苦，资源是否匮乏，而是指在这个长期危机的压力之下，社会制度、教育制度、城市空间乃至价值观念这些部分，可能出现的一切合情合理的“常理之外”。地球流浪的计划越是超乎想象，就越是给为了保存人类而艰难重组起来的地下社会，提供了巨大的发挥空间。

不过，电影展现的地下社会，却令人意外得熟悉。

它的呈现，从一个中学课堂开始。学生们依旧穿着不合身的难看校服，老师则穿成银行职员的样子。老师问“什么是希望？”一个标准的三好学生，拿腔拿调地回答。<sup>1</sup>这段场景，似乎只是要给韩朵朵一个出场的机会，给“希望是像钻石一样宝贵的东西”这个台词留一个线索（就

.....  
<sup>1</sup> 本文在网络发布后，有网友指出，这个教室的场景，是学校在cosplay黄金时代的美文教育，并非地下社会的一般学校教育的呈现。如果是这样的话，恐怕就有更多需要回答的问题，比如，地下城的学校教育为何要cosplay当代中国社会的“美文”教育，是真心认同这种教育，还是认为彼时的地下社会需要这样的教育？毕竟，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大费周章地组织一堂cosplay，体验过去黄金时代的课程，自然有它对于一系列相关问题的看法和理解作为支持。但遗憾的是，在对本国当代中学教育的cosplay或忆苦思甜中，这样的看法和理解究竟是什么样子，非但没有得到澄清，反而变得更加令人迷惑了。

这一点而言，电影的叙述属于中学生作文的模板，要求自己做到低级的首尾呼应。) 只是即便只有短短几分钟，却也清楚明白地告诉人们，17年的地球流浪，并没有改变中学教育的弊端，学校还在不紧不慢地培养着标准件，学生也还在厌学。如果考虑到，一个社会的巨变，最直接也最积极的体现者，往往是学校教育的话，那么这个场景，很难说是一时一地的想象，而是关乎危机之中，对整个地下社会的基本理解。

也许有人会说，为什么17年过后就必须有巨大的变化？只要是一个小社会，一个地下城，生活久了之后就会出现各种潜规则、灰色地带，地下社会的地下产业，这不是很正常吗？也许电影追求的，就是这种一切如常的感觉。的确如此，毕竟，地下的北京也有王府井，人们还在那里欢度新春。

可惜的是，一切如常的地下社会，并不符合“地球流浪”的提问——长期危机之下，社会为何又如何重组？它不仅和一半地球人死去、地球前途未卜的社会状况，无法匹配，甚至有些答非所问。它的出现意味着，在这个地球必须流浪的计划里，残酷的并非用抽签的方式，以一半人的生命换取另一半的未来；也不是即便如此，这个换来的未来，仍没有必胜的把握。而是，在这个长期危机之中，在一半人类的生命消失之后，保存一个松松垮垮，充满惰性，除了管制之外毫无变化的社会，并没有什么问题。地下城的日子，和今天的中国一样，该怎么还是怎么过，灰色地带和伪善的教育，不过是换了地方呆着。一种叫做“钱”的东西，也许是不见了，但其他的却一样不少。

于是，这个看起来热热闹闹、颇为应景的地下社会，更像是在暗示，此时，地球流浪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并非每一个靠着运气存活下来的人共同分享的。活下来的人，纯属运气，可以自顾自地保命，享受生活，纠结亲情。除了售卖千年蚯蚓（也许对于爱吃的国人来说，吃的变化才是真正重要的变化，其他的都可以忽略不计），其他都一切如常。紧张

感、悲剧感、使命感，在这个社会的日常生活和城市空间里，没有丝毫的痕迹。它们只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人类联合政府的事业，而与寻常百姓无关。

实际上，在小说中，刘慈欣提到了不少新社会的变化。比如，在一个人随时随地准备赴死的社会中，家庭解体了，生育制度也发生了变化。这些有意思的细节，因为“春节回家”这样的主题（这属于资本强制性的想象）没有机会出现。而电影又没有提供新的变化。于是，不能不说，地下社会这一层面的想象，基本空白。

也许有人认为，如何讲述地下社会，只是开头那几分钟的事。所有的戏份，吸引眼球之处，不应该是地表和太空吗？但问题在于，想象一个什么样的地下社会，直接关系到地球流浪之后，“地球”和“人类”对活下来继续身处危机的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倘若社会一切如旧，充满了惰性，那么故事后半部分——必须拯救地球——的叙述动力，便会不足。在毫无紧迫感的惰性社会中，地球流浪之后的人类家园，这个概念如何顺理成章地出现？为了人类，为什么这些牺牲是可以接受的？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人与那个看似抽象的人类之间的关联，如何可能？

于是，在第三个需要展开的想象的层面——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再想象之上，电影给出的实际回答是：这不可能。

刘培强中校，用自己的服役，换取了儿子和岳父在地下城的居住权。这是一桩明确的交易。当他得知儿子在地球有危险的时候，作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这件事情，对他没有丝毫的困扰。立马从休眠仓跳起来，拯救儿子，也就毫无悬念。整个过程，他的基本动力和唯一执念，只在于“我的儿子还在地球上”。

这倒不是说，他不能这样跳起来救儿子，救肯定是要救的，地球也最终不会香消玉殒。好莱坞套路也是如此，孤胆英雄，为了维护家庭而

升级打怪。但好莱坞的做法比较鸡贼。它必定会安排上几个不同肤色、不同国家的人，在每一个选择的关头，做一些思想或伦理道德上的辩论，摆出人性的两难。比如，这边是地球和儿子，是人类既有的家园，那边是联合政府收集的胚胎库和地球文明的种子，是所谓的人类未来，究竟孰轻孰重？一个人的决定，有没有可能挑战联合政府和电脑的运算？两个几率都渺小的计划，哪一个更值得孤注一掷？我，作为一个个人，如此选择的依据到底是什么？

这种斗争过程的不可避免，并不改变最后的情节：一个人拯救世界；也不改变其内含的意识形态——白人至上，美国第一。但它却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论证过程，将一个个体的决定表现为两难的抉择，凸显出人性在面临危机时的高贵与悲剧性，并暗度陈仓，让大家都信服于美国最伟大的说教，觉得这是我们大家的普世的价值观。

不过，咱们的刘培强中校显然不是这个套路。他一路心心念念的，只有自己的儿子。人类整体的命运、联合政府的决定、胚胎库和其他休眠的同事们，一刻也没有成为他的难题，更不会带来片刻的犹豫。最终，一个没有任何伦理困境的人，救了地球。这是有些可怕的事，哪怕他牺牲了自己。

在这里，可怕的倒不是这个人的胆大妄为或一意孤行，而是在对他的牺牲与拯救的叙述中，人们发现，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想要把个体与公共事业，乃至全人类关联起来，是多么的艰难。即便是拯救地球这样的事业，也只剩下了一己私利这一条通路。偏偏这套才从市场经济中锻炼出来的话语，掌握得又很不娴熟，表达起来几近赤裸。

至此，《流浪地球》的火爆与争议，与其说是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起点，不如说是这个时代中国社会想象力的标本。它极为生动地表现出，中国社会想象力的“先天特色”和“后天不足”。所谓的“先天特色”，

是在种种现实的限制之下，事关社会危机的想象，以颇为曲折也更为大胆的方式提出，比如带着地球去流浪。然而，这一社会想象力的“先天特色”，在为中国特色的危机表达带来巨大的想象空间的同时，却也因为对现实的种种刻意回避，导致在这一巨大想象空间面前，失去了聚焦的能力。于是，在这场无的放矢的想象盛宴中，特效、大片、资本、民族自豪感、主流话语，所有这些都一起跳出来晃瞎我们的眼睛。人们来不及去思考，在这个事关危机的想象中，到底哪些部分是装饰性的，哪些部分应该竭力作答，哪些又可以尽情扩展，好让压抑已久的社会，在整体性的危机面前，做一次想象性的吐故纳新。

# 一场真实的虚拟对谈

(2018 国际文化研究双年会访谈录之一)

郝玉满\*、许超\*\* 翻译整理

《热风学术》访谈小组：2018年8月12日——15日，国际文化研究学会（ACS）第12届双年会（Crossroads in Cultural Studies 2018）在上海大学召开。会议期间，就如何定位文化研究在当代思想生产中的位置，如何理解今天全球青年的文化思想状态，如何看待当代大学教育体制和其所代表的知识生产模式，如何想象共同的未来等议题，我们采访了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者。他们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回复了对这些重要议题的思考。当我们检阅这些回答，发现虽然采访是分头进行的，但彼此的回答，却遥相呼应，生出强烈而奇妙的互文性。

于是，为了忠实诚恳地记录，也为了更具火花地呈现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们选取了四位学者的采访稿件，归纳整理，让他们在半年之后《热风学术》的“现场”，进行了一场虚拟的对谈。

在进入“对谈”之前，请允许我们为大家介绍这四位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对谈嘉宾”：

白池云，韩国首尔大学统一和平研究院 HK 研究教授。她近期关注的是现代东亚文化和思想的对比研究；是竹内好的《日本与亚洲》，陈光兴的《帝国之眼》，丸川哲史的《地域主义》等的韩文译者。

吉见俊哉，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副校长，社会活动家。他的研究

领域为都市论、文化社会学。他的《博览会的政治学》、《媒体文化论》等著作都已经有了中文译本。

米科·莱赫托宁 (Mikko Lehtonen)，芬兰坦佩雷大学文化与媒介学教授，社会活动家。他的著作多以芬兰语发表。

莱纳·温特 (Rainer Winter)，奥地利克拉根福大学文化与媒介学教授，传媒系主任。自 2001 年以来一直在担任 Transcript Verlag 出版社“文化研究”丛书的编辑工作。

《热风学术》访谈小组（以下简称“热风”）：作为一种批判性的、生产性的知识活动，文化研究一直面临着许多挑战。比起传统的、“规范化”的学科，文化研究似乎有更多的解释空间，其在不同地域的脉络也各有不同。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可否请各位谈一下自己与文化研究的渊源以及对文化研究的理解？

白池云：我不太觉得自己是文化研究者，我的研究背景是文学和思想研究，但是研究文学的过程中会受到很多限制，在文学文本研究中，比如如果只看韩国或中国的文学作品，不了解社会或者 Inter-Aisa 背景，文学文本的研究会很没意思。因为文学研究的普遍限制，在十几年前，韩国一些大学的中文系、法文系开始形成一个转向，转向文化研究。

我个人认为文化研究不仅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同时也可以作为一个方法，提供研究视角。韩国的文化研究可能存在两条路径：其一是东亚研究，这是当时韩国学术界重要的议题之一，之前受冷战影响，韩国很封闭，90 年代初苏联解体后，韩国和中国、苏联、越南建交。与此同时，知识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提出了东亚论，希望结束彼此分裂的状态，创造“去冷战”的新世界。2003 年我在台湾有短暂的学习机会，

当时阅读了陈光兴的《帝国之眼》，首次开启了我对台湾的认识。我们互相学习和帮助，彼此成了很好的朋友。回国后和朋友合作翻译了陈光兴的几篇重要论文《帝国之眼》、《后殖民地理论》、《为什么大和解不可能》，将其合集以韩文形式第一次出版，陈光兴的学术思想在韩国学术界得到介绍与熟知；其二，韩国另一种类型的文化研究是韩国左派发起的，苏联解体后，过去的左派开始接触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思想，慢慢地转向文化研究。

对我而言，作为方法的文化研究是经由 Inter-Asia 的圈子产生的，Inter-Asia 对我个人的影响很大。80 年代韩国虽然封闭，但内部充满活力，我们的目标明确：反帝独裁，主张民主化。但是 90 年代后，包括知识界在内的社会整体出现了迷路的状态，失去了明确的方向。Inter-Asia 文化研究带我们找到有效方法回到过去，将 60、70、80 年代的社会运动、知识运动在亚洲的视角下重新脉络化。

米科·莱赫托宁：1972-1978 年期间，我是芬兰的学生组织中活跃的社会活动家，随后，1980-1984 年期间，我在两份偏左翼的青年学生刊物中做编辑。28 岁的时候，我进入坦佩雷大学学习文学。当时，我期待的文学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希望借助它帮我反思我的一些政治和文化经历。不过，我的想法太天真了。之后我接触到了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既可以帮我分析为什么我青年时期从事的左翼运动失败了，也可以促使我理解为什么先前学习的美学形式主义文学（aesthetics-formalist literary）的研究存在严重的问题。

也正是从那时起，我计划在芬兰和国际上建立以多学科研究为主的文化研究。可以说，文化研究至今仍然是我的知识家园。近年来，我关注的课题是研究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并尝试对它们的关系进行结构

性的分析。

我想指明的是文化研究从来不是一个单数的名词。例如，很多文化研究的关键术语通常都是沿着一条中心轴线而浮动叠加的多层次概念，它们也意味着多层的文化实践。比如“大众”这个词，它浓缩了不同的，重叠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意义。与此同时，“大众”作为一个意指实践，它可指涉“文化”，可指涉“行为”，也可指涉“群体”。

我们都知道，文化研究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旨在分析战后社会和文化的深刻变化，它对知识的追求从一开始就是批判性和非学术性的，目的是创造关于现实的更好的知识。我认为，这种批判精神仍然是当今文化研究的核心，这种精神是无法通过复制他人、他地、他时的事情实现的，批判精神是在努力构建批判性问题，并在当下语境中回应这一批判性问题的过程中建立的。

吉见俊哉：我说一下文化研究在日本的历史吧。其中大致有三个阶段：从1910-1930年代，一些包括马克思著作在内的批判性理论研究开始进入日本，东京以及其他几个大城市首先开始受其影响。当时的日本学者开始以批判的眼光来重审我们自身的社会问题与大众文化。一些类似于文化研究的工作在1920年代开始出现，比如说有人开始研究电影院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他们想要知道工人如何进入影院，如何观赏电影等等。另外，由于批判性哲学、批判性理论的影响，大城市中也开始出现社会运动，主要是在工人阶层之间。这一阶段算是文化研究在日本的萌芽。第二个阶段是1950-1970年代，战后的日本开始了第二次文化研究浪潮。这一阶段的关键词是“庶民哲学”，以鹤见俊辅<sup>1</sup>等为代

.....  
1 鹤见俊辅（1922年6月25日—2015年7月20日）日本思想家、大众文化研究者、社会运动者。曾任教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京工业大学、同志社大学。

表人物的思想家们认为哲学应源自人民并为了人民，反对只有知识精英可以做哲学的观念。他们真实地走入人民之中，去亲密接触工厂工人、军人、流浪汉、性工作者等不同身份的人群。他们也会通过杂志来与不同的人群来讨论哲学思想，《思想之科学》就是这样一本杂志。这种实践一直持续到六零年代。因此可以说，无论在战前还是战后，日本已经出现类似文化研究的学术实践；不过，是在1980-1990年代，英国的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影响日本以后，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才正式进入大学。媒介研究、性别研究等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包括社会学的研究，我在七零年代读社会学的时候，日本的社会学已经形成了批判的传统和文化视角。当时日本的社会学，跟美国的社会学很不同，而跟欧洲的社会学比较接近，比如德国和法国。如果说当时的美国社会学更多是实证、量性研究，日本社会学则更倾向于质性、历史、批判研究。1990年，我们开始思考学术工作如何能重回现实，直击当下，这时，文化研究来到日本，社会学也就开始了与文化研究的紧密联系。

我觉得做文化研究有几个关键点。第一，当然文化研究是批判性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批判什么。因为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文化，层出不穷的文化现象带来了很多的可能性，在这种前提下，我们既要时时保持敏感，也要保持一定清醒的距离；第二，文化研究一定要自我批判。这个“自我”是文化研究，是文化研究者，也是我们归属的国家、社会。就日本来说，“自我批判”最重要的部分当然是对自身历史的反省批判，我们曾经是那样一个帝国，拖着那么多人进入了战争，而我们做的批判工作却远远不够。对于中国来说，可能也是一样，在面对美国的问题时，批判可能是激烈彻底的，但当面对国内的问题时，却变得保守了。当然，在地的批判确实是有风险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找到间接的方式去完成它。总而言之，日本的文化研究要批判“日本”，中国的文化研究要批判“中国”。

热风：在中国大陆，政治上的无力感非常普遍，大多数的年轻人都认为自己无法改变社会，而只能努力地适应它。社会再生产机制让年轻人心态变得越来越老成，这种老成不但使他们在思考问题时变得很保守，而且给了他们逃避现实社会的借口，理所当然地只关注身边的“小确幸”。同时，这种心态上的虚假老成也没有让他们像个成熟的人一样扛起社会责任，反而焦虑地用消费来延续年轻的躯体。你们同意这种对年轻人的描述吗？能简单谈谈你们在地青年的普遍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吗？你们又如何看待这些年轻人所处的社会境况呢？

白池云：我从台湾朋友那里听到一个流行词“小确幸”，在韩国也有类似的流行说法<sup>2</sup>：“yolo”（you only live once）。这一流行词主张：人只能活一次，你只需要享受自己。具体的表现可能是，买不起大房子，但是我用钱买一些可爱的东西，享受现在。他们的生活无法涉及未来，也不会涉及未来。对年轻人来说“未来”一直是一个很难以讨论的事。在5年前，韩国流行一种“三抛世代”的说法：放弃交女朋友/男朋友；抛弃结婚；抛弃生孩子。后来发展为“N抛弃”，无限制的抛弃。现在大学的气氛和80年代完全不同，80年代虽政治黑暗，但是生活繁荣，一方面是政治严酷，独裁政权；另一方面则受到朴正熙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影响，青年没有工作的担忧。所以80年代的校园气氛相对自由，我们讨论哲学，讨论社会，讨论各种思想上的内容，但是现在的校园生活更多地集中在如何获得高分，获得好的简历，以期望找到工作。

可是，另一方面，我又不认为韩国的学生完全是“抛弃”和“享受当下”的，可以说，韩国的学生力量仍然充满了希望。以2017年弹劾

.....

2 现在，韩国也已经出现与“小确幸”完全对应的词汇：소확행。

朴槿惠事件为例，这一事件的爆发是从梨花女子大学的学生抗议开始的，后来逐渐才演变成一个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从这种角度来说，我认为学生对于韩国社会的变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韩国的青年有着两个不同方面的表现，我认为不能只极端地关照其中一个。

米科·莱赫托宁：最近三十年的芬兰发生的变化是：社会的主语已经从“我们”变成了“我”。可以肯定的是，在当下，有各种各样的逻辑在发挥作用——比如，芬兰人民在民意调查中总是表示支持福利国家政策，但在实际选举中，他们却将选票投给那些反对福利国家政策的政党。

从公共的角度思考，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的公民，都已经被消费者的身份所取代，对于他们而言，最重要的只是个人和当下。年轻人不相信社会能被改变，他们只能玩个人之间的竞争游戏。这并不是因为今日青年比前几代人更加自私和目光短浅，而是因为市场，甚至公共的社会机构都把他们当成“个人”来对待。现如今，最大的悖论在于：现实生活中我们越来越依赖彼此，依赖社会。然而因为作为整体的社会为大多数人提供了住所、物质营养和知识教育，反而让人们认为自己是完全可以独立自足的，并产生互相竞争的意识。

芬兰本应该是福利社会、责任政府的典范，但上述问题愈演愈烈，威胁着原有的平衡机制，这意味着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社会分化会不断加剧。如果芬兰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其他北欧国家也很可能是这样的。

吉见俊哉：2000年之后，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或者只能做一些不稳定的零工。这种情况当然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注意，文化研究者们也不例外。不过，我个人觉得，日本文化研究对于这个问

题的观察和分析存在着一些弱点。要理解青年工作生活的不稳定化，经济学、社会学的视角几乎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日本文化研究者却要么忽视了它们，要么就是掌握得不够，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运用好那些必要的分析工具，没有到位地掌握现实。

莱纳·温特：当今的青年是在数码科技中成长的一代，世界各地大多数年轻人都在过一种“媒介生活”，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我们需要更多地去研究分析它。电脑游戏和社交媒体提供了全新的互动空间，随之改变的包括学习和教育的过程形态，我们必须深入到这些变化之中，因为这些由资本主导的科技空间，不仅仅“容纳”着年轻人，而且也塑造着年轻人——进而塑造着未来。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越来越少的年轻人会关注政治的动向。然而，揭示文化与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政治面向，是我们文化研究者的任务。对自我职业成功以及消费的追求，或许导致了人们对生活中的政治因素的忽视，可文化研究的工作就是要尽量将它拉回人们的视野中心。我们并非全无希望，比如，在德国，还是有青年走上街头，抗议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西班牙，还是有年轻人组织起来，对抗高居不下的失业率。

白池云：（谈到青年社会运动）我想补充一些我对韩国社会运动的看法：目前我们的社会运动的思想处在混乱的状态，所以对新的议题和理念也需要审慎对待：社会领域方面有“社会少数人”的讨论，包括东南亚在韩劳工问题，越南等跨国新娘的身份认同问题，暂住人口被排斥的问题。韩国社会运动的历史脉络以民主主义为核心，表现为反抗压迫的进步活动，但是现在韩国出现的一些排斥压迫少数群体的现象，几乎让社会失去了历史上的进步动力。

从我个人角度认为，重新唤起韩国的社会运动的活力，最需要的不是左派的理念和领导，而是要提高社会参与度：韩国历史上有三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1960年，反对李承晚独裁统治的“四一九革命”；1987年光州民主化运动；2017年反对朴槿惠政权的烛光运动，在这些运动中，发挥制胜力量的不是拥有运动权的左翼力量，而是平常政治关注度低的人群大规模的参与。因为韩国民主运动传统和脉络，所以我相信韩国社会大众中，潜伏强大的运动力量。

热风：自从2003年北京大学第一个喊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中国大陆高等院校的管理逻辑和职能定位就开始了快速转变。高校企业化，学生人力资源化，教育收费金融化，这些都是21世纪大学的主要特征。毫无疑问，这种变化在全球范围内都在发生。大学已经不再能解放学生思想，让他们勇于改变世界，恰恰相反，大学变成了驯化学生，教他们臣服于主流社会规则的工具。在市场逻辑主导下，很多文化研究部门已经被“看不见的手”推出院校，其他传统人文学科情况也岌岌可危。作为文化研究的学者，你们怎么看待这种趋势？你们又如何理解你们社会中大学教育的问题？据你们的经验来讲，有没有哪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可以改善这种糟糕的现状？

如果说高等教育已被资本逻辑主导，“知识”与“知识生产”也不例外。在所谓的互联网经济推动下，年轻人普遍愿意甚至认为应该购买知识商品，以期获得更好的人生。愿意在互联网上为知识付费的人群在成倍成倍地增加，到2016年底，已经有5000万中国网民购买过在线课程等知识商品。“什么是知识”越来越由资本说了算，知识生产的目的也越来越模糊。你们对知识的市场化有什么看法？你们对当今的知识生产又有哪些忧虑？

白池云：韩国的大学和中国情况相似，我们也特别关注“大学竞争力”。韩国大学最看重的是自己在全球百强名校的排名，学校的国际影响力等。从教授的角度看，我认为韩国更严重的问题是知识等级化，准确来说是以美国为核心的知识等级化：在首尔大学，70%—80%的老师拥有的是美国学位，欧洲学位很少，中国的学位几乎没有。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凭的问题，在理论知识方面，我们要分析现实问题当然需要西方的理论，但同时也需要一个挪用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将西方理论消化或转化成在地的知识，而不是仅仅依靠发表晦涩的理论研究来获得学术影响力。在韩国大学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教授之间的等级化现象严重。为了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学校通过各种形式雇佣不同类型、层次的老师，他们有的是不稳定的合同制老师，工作量与教授相同，但工资待遇却有很大差别。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大学，在新自由主义进来以后，几乎所有的工作领域都存在这种情况，大量不稳定短期工，他们仅仅按时获得工资，没有其他保障，更无法形成工会捍卫自己。更令人担忧的是：很多大学老师都在80年代参加过社会运动，都有很强的社会意识，但是进入主流之后他们却没有再主动提出不平等的问题，或许是因为一旦尝试，他就会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新自由主义已经深入内化到知识领域内部。

米科·莱赫托宁：我很担心批判性学术工作的未来，以及它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影响。从学术研究的层面上，我担心的是，现在的学者越来越多地甘愿为世界生产脚注，满足于描述表面现实——我认为其他地区应该也有如我们一样的困境，我指的是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和材料，但是没有足够的批判性和综合性的工作。我们需要不同类型的知识来产生社会影响，而不是仅仅重复或者再生产所研究的现实。

最近，我在阅读硕士和博士的论文和各种研究计划时，我经常问自己和这些文章的作者：他们撰写的文章是批判性的研究，还是简单的表述性报告？甚至只是为世界做脚注，重述材料？如今，追求知识的批判性的空间越来越小，研究问题常常太过频繁地以描述性的问题开始，诸如“什么”“怎么样”“什么样的”，这些提问方式取代了思考性的问题——像“哪些人造成了这些问题”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指现今的博士学生或博士后研究人员在某些方面的批判性或反思性不如他们过去的同行。相反，我更倾向于认为结构性的压力正在迫使我们调整我们的研究。我猜想这些压力主要来自于研究的市场化，而它们威胁甚至削弱了许多学术工作的批判性。

研究应是一项政治性的活动，它表征世界，但同时也实践——即创造世界。把握现实绝不仅仅是简单描述现实是什么，而是在描述的同时塑造它。那么，如何表征和创造变化中的世界？如何才能不把世界僵化为已死亡的实体？如何描述行为和过程而不是描述静态的存在？

在原则上，未来是开放的，但它也在不断的被各种方式影响、定义乃至定下来。关于知识的政治性的基本问题在于：知识的生产者包括哪些人？谁有权力生产知识，他们以何种方式生产？什么形式的知识会被接受为“正确的知识”？

这种知识就是要探索流动，变化的世界——追踪它出乎意料一面；把握其混乱、难以治理的一面。把世界当成静止实体的知识具有有限性，明确性，分离性，绝对性，平面性，一致性，普遍性，一维性，可测性和线性等特点。但另一方面，流动的世界需要不同的知识类型——无限的，联合的，相对的，特殊的，差异的，开放的，多维的，不可预测的，多时代的和多空间的。前一种知识的目的是锁定世界，生产可测的、一

维的和可度量的现实。后一种知识面向开放性，异质性的现实，面向一个开放的世界。

要生产后一种知识，就不能认为研究者处在其所研究的现实之外，相反，研究人员是由现实形成的，是现实的一部分，并通过他们的工作创造现实。换句话说，研究人员也是被研究的历史情境中的一员。

完全不同的未来需要的是截然不同的知识。正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所说，我们用制造问题的思维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为了找到新的思考方式和全新的知识，我们需要完全不同的想象力。

想象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常常被认为是纯粹的幻想而置于一旁。它似乎并不符合那种以确定世界为目标的实证主义知识形式。然而，这种观点未免有些目光短浅了，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是因为他们有能力超越“此时此地”，去想象那些不在眼前的事物。从词源上看，动词“想象”指的是去形成各种客体或经验的心理意象。因此，想象是卓越的认知行为。

所以，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创造可以实践这样的想象力的批判性空间？如何保障学术工作的关键资源？我无法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个宏大的解决方法，只能建议我们应要求自己，坚持不懈地捍卫学术工作中最有价值的的那些东西。

吉见俊哉：在日本，大学的问题也日趋严峻。我想先说一个简单的事实：日本的大学数量规模一直在扩张，而日本新生人口——也即是大学生源，一直在萎缩，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困境。目前来看，这种情况在中国尚不算严重，但是也已经开始出现。再有，现代大学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的，它是所谓的“国家机器”，但是目前的形势是我们需

要越来越“跨国际”的知识，越来越“全球化”的叙事，现在的大学显然不能很好地应对这些任务。

我不是说大学作为一个整体最终消亡，但它的可持续性的确不容乐观。要存活，大学改革是必须的。文化研究当然不能拯救大学，但其跨学科、强调国际视野等“性格”，可能提供了某种大学改进的方向。

在“知识”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我们现在都生活在一个数据时代。科技的发展让电脑能处理人类无法掌握的大规模数据，精确、全面、有效率。这让人们开始把数据当作知识本身，我想这正“知识”面临的巨大挑战。现在，去思考和回应知识和数据的区别，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冒着过度简化问题的风险，我这里简单地试举一例：数据是一个连续的线性逻辑，但知识不是，它是断续的，是辩证矛盾的，那是因为知识——特别是人文知识——是诸多不同的视角互动而成的联结框架。它筛选、角力、有主观“偏见”，但这正是知识有创造力的地方。

莱纳·温特：在奥地利和德国，大学也渐渐变成了职业教育的场所，这当然有悖于威廉·冯·洪堡立下的德国教育传统。随着资本市场对大学的入侵，学术自由已无从谈起。面对新自由主义的种种伎俩，我们应奋起自卫，像梅尔维尔笔下的巴特贝一样<sup>3</sup>，无畏地说出“我不愿意”。同时，作为老师，我们还可以在学生的求学阶段给予他们支持，尽量为他们保存与争取空间，以展开更活跃、更有创造力的讨论和思考。

热风：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不同的人或许对于“未来”有着全然不同的理解。对于有些人来说，特别是对在后社会主义时代成长的年轻一代来说，“未来”意味着发达的西方式的现代生活；而对于另外一

.....

3 赫尔曼·梅尔维尔小说：《巴特贝：一名抄写员》。

些人，在目睹了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之后，历史就终结了，“未来”已无从谈起。在当今新世纪，由于我们面临的种种危机，人们对于“未来”的想象也更多种多样。那么，你们会怎样谈论“未来”？哪些人群或者什么事物是决定“未来”的关键？“文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呢？

米科·莱赫托宁：关于未来，我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不同类型的叙事，它应要比现在主流的叙事更好。现代性不应被视为一个单一的、不可避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脉络被转变成一段单一的历史，不同的地方被解释为同一时间发展的不同阶段。在这些叙事中，西方是“先进的”，如拉丁美洲这样的地区是“落后的”，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这样的地方则是“退步的”，或是“孤立的”或“微不足道的”。在这种单一线性发展的概念里，时间性本身并不是真正开放的。未来已经被内嵌在叙事中而可以预知。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谈论未来时会觉得尴尬。要么是觉得未来无非就是现在的线性延展，几乎和过去、当下没什么两样，除了好奇什么时候会推出飞行汽车这种琐事之外，我们对未来也没什么大的兴趣。要么就是认为它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现实是彻底不同的，现在的人甚至无法想象它将以何种形式出现，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对于未来也无话可说。

事实上，未来永远是开放的，就像空间永远是开放的，不断地在被创造的过程中一样。所以，想要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就需要有更好的未来叙事，这一叙事是不能预先确定历史和空间的，但是却能让这两者完全打开可能性。

要获得更好的未来叙事，我们还需要关于过去、关于现在的更好的叙事，去揭示多元、纠缠的现状背后那些复杂的、相互矛盾的过程和力量；

同时，尤其注意抵制那种单一的叙事逻辑，这种叙事总是使一些偶然之物看起来是必然的。坦率地说：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组织整个社会生活的方式，其实只有几百年的历史，为什么我们好像已经忘记这一点？为什么想象资本主义末日变得比想象世界末日还难？

当然，对另一种未来的希望不能建立在空洞的乐观主义之上。由于世界是通过人类行为改变的，希望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实践基础上。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而是行动——为了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思考如何改变当前的现实，我们需要文化研究从业者做这样的批判性工作。

白池云：这次 Crossroads 会议，特别是最后的两个演讲，让我感觉到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些变化。以前文化研究分析的是资本主义如何控制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现在文化研究谈及的是未来的“希望”和“可能”。过去强调我们无法摆脱资本主义的控制逻辑，现在，随着资本主义越来越精细的渗入日常生活，我们开始想文化研究应该做的是做什么？我们可以不断发现自己的能力，去行动，去反抗。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则要努力不断地把更好的知识变成一般常识，才有可能推动社会的变化。以前的运动总是借助知识精英的哲学、思想，但事实上只有把“哲学”变成内化于大众之中的普遍常识，让更多普通人参与进来，“未来”才有可能。

# 危机感与互助： 一个美国博士生在中国的访学感想

Jennifer Macasek \*

尽管我已经来中国留学了两次，但是这次的留学经验跟前两次的很不同。因为前两次都是来学中文，生活经验也比较有限，老师们都是语言老师，同学们都是外国人，我也住在留学生的宿舍。这次是全然不同的。我在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访学，同时，经由朋友介绍，我寄宿在一个中国家庭里。这样的我，有机会接近中国大学与中国人日常的方方面面。虽然我依旧是一个外国人，而且是个白人，在街上还是很容易被认出来，但这一次我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共同体的一部分，而不只是普通的留学生或旅游者。

当你在共同体里，你能更直接地体会文化的异同，感觉到周围人的希望与困惑，同时反思自己的希望与困惑。在我寄宿的中国家庭，有一次我听到大学毕业的姐姐批评初中的弟弟不努力学习：“你怎么没有危机感？”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要有危机感。几个月以后，我慢慢了解到，危机感其实已经席卷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青年的工作与婚姻，国际关系，学术世界，甚至到小孩的日常生活，而

.....  
\* Jennifer Macasek,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攻读文学博士,2018-2019 至上海大学访学。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乡村文学,研究兴趣是 1950 年代至今中国文学里的乡村形象变迁。

且我发现自己也有危机感，尽管我本来没有用这个词来形容它。

当姐姐认为弟弟缺乏危机感的时候，这背后其实可能是她对于自己未来的危机感。如果姐姐感觉到竞争激烈对自己的生活有那么大的影响，她可能想要弟弟早点做好准备。我不知道这种姐姐批评弟弟的做法对不对，但是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跟我小时候比，现在世界经济情况比较严重，这个情况也影响到美国青年的生活。但是在美国，亲戚不一定会管你，你也不一定会管他们。在中国，我跟朋友们一直谈各种青年问题：找工作，工作的压力，租房，买房，婚姻与生孩子的压力。在美国，我知道我的朋友都有同样的问题，但是我平时只考虑我的问题，担心自己的未来。我后来发现跟别人公开谈这些问题可以打开找到解决办法的可能性，而且没有自己只管自己的做法那么孤独。

在中国，我也经常感觉到比青年问题更大规模的危机感。看公众号、新闻、电视的时候，常常看到中美关系或者国际政治经济紧张恶化的消息。跟出租车司机聊天时，他们听到我是美国人有两个反应：“美国伟大，世界警察”或者“贸易战争，中美关系。”一开始这让我不舒服，因为他们好像把我当做美国的代表人，要我告诉他们为什么我的政府会这样做，或者他们以为我一定支持美国政府的每一个行为。在美国，我与朋友最常见的政治讨论是国内的不同冲突，因为这些冲突对我们的生活有最大的影响。但在中国，我发现无论我支持还是反对美国政府的做法，我都有更大的责任感说清楚自己的想法，因为对方可能没有很多机会跟别的美国人交流。这些交流也给我一个机会，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世界如何看待我的国家，而我的国家正在给世界带来什么影响。

我来中国的原因是学习，所以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跟老师们与同学们交流，旁听课，读书，旁听会议之上。而我在学术的领域里也感觉到不同的危机感。我刚来的时候，正好赶上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主办的 Crossroads 国际文化研究大会。一个常常听到的话题是文化研究的未来。这个学科有什么样的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想象另外一个世界？学者在自己的周围有什么具体的权力改变世界？在另外一个人文学科的会议上，我听到一个教授颇为着急地说“我们的研究有什么用？我们的贡献是什么？我们不是跟社会学一样，具体研究怎么解决社会问题的，所以我们学科的特殊性怎么能帮助别人？”这些危机感让我想到在美国的人文学的危机感：我们在大学的地位越来越低，因为选择人文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少。在美国，“有用”的意思是能不能让别人看到你的价值，你能不能给大学带来利益。在发展高科技与追求利益的环境中，对普通的大学生与普通的大学行政人员来说，人文学科没有用。这不是因为人文学科无法直接决社会的问题，而是因为它不会赚钱。同时，我也觉得人文学者担心自己的研究其实没有用，但这样的身份危机实际上也表示出我们的希望：我们想要用我们的研究帮助社会。问题是怎么做。

我说这次来中国以前没有用过“危机感”这个词，不仅是没使用过这个中文词，也是说在英文中没有合适的翻译。当然可以说“sense of crisis”或者“feeling of crisis”但是我以前不会这样说。我有“危机”的概念，也有“紧张”与“沮丧”的概念，而且我知道这些概念常常在一起。但危机感在我的经验里还是一个新的概念，而且我很快发现它也比较清晰地表示我的紧张或沮丧的来源。这个概念指明了外面的危机与内心的感情有那么深的关系。我一直想危机是跟紧张与沮丧有

关系的，最后也可能会造成绝望。在中国的这几个月，我的危机感有时候开始让我绝望。

如果说我没有被危机感淹没，那是因为我在中国体验到的另一个概念。从寄宿的情况到学习的情况，我不但感受到别人对我的关心，而且看到朋友，同学，老师们之间的关心。跟朋友们讨论青年问题的经验、跟司机试图了解对方的国家与政治经济情况、还有跟学者想象学科的未来，都可以算是互助的行为。这些讨论让我思考危机的时候一定会碰到很多很难解决的问题。但是这些讨论恰好证明，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还没有放弃，因为如果放弃了，就根本不会讨论。

我在中国收到的互助，当然不只是抽象的讨论。我的中国家庭来机场接我，房租也不多，如果他们做饭也欢迎我跟他们一起吃。我也常常跟姐姐与弟弟说英语，有时帮助弟弟做作业。这不是一个正式的合同，而是互相商量着达成的状态。现在我的中文有很大的进步，孩子们的英语也进步了；我深入了一个上海家庭的日常生活，他们对美国文化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也很高兴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变成了我第二个家：这个共同体从一开始就欢迎我参加很多活动，包括会议、讲座、答辩、听课，甚至一起吃饭，出去玩儿。我也想回报，校对了会议的英文材料，给同学开一个英文角。给我留下最大的感想，是跟同学非正式的语言交换与写作修改交换。看起来简单的词汇与语法讨论，变成了深刻的文化、历史与价值观的讨论。他们欢迎我提问题，我也欢迎他们随便问我。这样我们慢慢建立了一个互相信任的关系，而且这个关系是我能写这篇文章的重要基础。

我从大学本科开始明白，我长大的文化环境过分强调的“个人”是一个历史性的意识形态，不是纯粹的真实。相反，社会是一个巨大

的体制：法律、经济、文化，都塑造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强调个人的意识也比较容易让我绝望，因为看不出来个人要改变体制能做什么？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能找到更多的互助的机会、能多相信他人、也能用每天的行为来建立那样的信任，那将是一个很重要的改变世界的方式。我不只是从个人的力量来解决问题，而是跟别人一起建立一个合作的集体。这个希望没有完全安抚我的危机感，也不应该。因为危机感也可以指出解决问题的方向。当然，共同体也会发生冲突和分裂。在美国，这样的冲突经常被用来讽刺合作的可能性。我在中国也碰到这样的怀疑别人的概念。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谈合作坏处的同时应该更多注意合作给我们带来的那么多的好处。这样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坚持克服正在面对的危机。这些挑战不能证明合作的失败，也不能让我们完全绝望。

我回美国要带走这次在中国经验到的互助感，要找更多的机会帮助我的邻居、同学、老师，以及来美国的移民和客人。面对困难的时候，要多注意别人在我旁边也面对一样的困难，找办法一起克服。我知道这是可能的，因为这次访学带给我很多这样的例子。

# 大学 / 城：考文垂随记

## Univer/City, or Coventry

毕文灏\*

从抵达考文垂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身上的“游客气息”已经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以本地居民( dweller/resident )的方式感知和面对生活。而越是如此，越是明显地意识到，尽管我的生活主要还是围绕大学转、集中在考文垂市内，但仅仅透过这个区域，却可以看到很多。

### 1

考文垂坐落在英格兰中部的西米德兰郡，没有国际机场，从中国出发有两个选项，直飞首都伦敦，或者到临近的伯明翰，尔后转汽车或者火车。我是从伯明翰机场入境英国的，从机场边的火车站出发，十分钟之后就到达了考文垂市中心南侧的火车站。也就是说，考文垂的市中心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我对英国城市的第一印象。此后的日子里虽然也探索了考文垂的其他区域，也到过一两座其他城市，但考文垂市中心作为认知和理解英国城市的蓝本，这一地位几乎未曾撼动。

考文垂的市中心是被一条环路( ringway )圈起来的，环路宽阔( 主路双向六车道，还有多处供进出环路的匝道 )又起伏( 有高架段，也有地道段 )。市中心接近一个直径 1.5 公里的圆形，走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能基本看完市中心的全貌：中心略偏东是考文垂大教堂( Coventry Cathedral )，大教堂以东是考文垂大学( Coventry University )，以北

.....  
\* 毕文灏，英国华威大学跨学科方法学研究中心( Centre for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ologies, University of Warwick )博士研究生。

是考文垂市内巴士总站（Pool Meadow Bus Station），巴士总站对面是考文垂交通博物馆（Coventry Transport Museum），大教堂以西是汽车禁行的购物区，其中还有一小片广场，以南是市议会（Coventry City Council）和银行汇集的商街（High Street）。

虽是市中心，却很少有超过四层楼的建筑：商店基本都只有地上的一到二层，即便是四层楼的商场里也是如此，三层和四层是停车场；需要抬起头来才能看到屋顶的基本只有大教堂和学生公寓。建筑的外立面多是红棕色的砖墙，相比于混凝土外墙或者玻璃幕墙，看上去更温暖、更柔软一些。

也因此，购物区西南角的宜家（IKEA）所占据的庞大而突兀的蓝色立方体很难被忽视——大面积的蓝色色块破坏了红棕色所营造的和谐感，却似乎又昭示了这座城市的多元与活力。看看都有哪些人在宜家里寻觅合意的物件吧！挑选锅碗被褥的有黄皮肤的，有戴面纱的，有裹头巾的，即便是高鼻子蓝眼睛的白人，说的也未必是英语——这座城的新移民们正在琢磨怎样让自己尽快安顿下来。而本地人也在挑选花草和饰品，好让自己在周末忙碌一番。

是的，“移民”是这座城的一大群体。这一方面是因为这座城里有两所大学，每年都会有大批留学生流入；另一方面，在英国现行的工作签证政策（Resident Labour Market Test）下，来自欧洲国家（如欧洲经济区 EEA、瑞士等）的国民可以如英国国民一般自由流动、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考文垂这座位于英格兰中部、没有国际机场的城市，其国际化程度反而颇为耀眼。

## 2

考文垂的夜晚来得很早。这并不单是地理条件——纬度高，10月末夏令时结束之后，下午四点半以后天色就渐渐暗淡下来——也是人们的生活习惯。下午五六点，大小零售商店就陆续打烊。市中心的服装零售品牌普利马

克（Primark）和宜家（Ikea）是极少数营业到七八点的，余下的除了乐购（Tesco）或者阿斯达（Asda）这样的大型连锁超市营业到晚上11点之外，就只有餐馆和酒吧坚持到午夜前后。有些店家的营业时间更短，有些一周只开一两天，或者非预约不接待。如果是星期天，就更加冷清，甚至可以说萧瑟破败：上午11点之前开门营业的绝对是少数中的少数。

这和我之前到过的许多地方都不一样。在香港、东京、首尔，晚上六七点，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即便是福冈、那霸或者仁川这样的非首都地区，虽然称不上灯火辉煌，街上也都还残存着一些生气。两相对照，“不夜城”大概最能概括东亚城市的共性，而考文垂的“城市气质”也变得清晰。

商场、便利店、影院、KTV……东亚城市的“不夜城”，似乎构建出或者依托于白领式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人们的工作和休闲很大程度上围绕商业和消费展开，并由此塑造了一种以消费者身份为主的甲方乙方式的人际交往方式。而在考文垂，商业和消费尽管依然存在，但明显不占据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工人阶级气息”。它首先直观地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穿着打扮上：在考文垂的街头，最常见到的是配有反光条的黄绿色或者橙色的荧光马甲，或是防风防雨、标识出躯干、前臂和脚踝的荧光套装。从建筑工、安保人员、环卫工到铁路职工、公共事业的司机，似乎只要有可能到户外作业，带反光条的荧光服几乎就是标配。另一大类是各式工作服，外套依然多是防风防雨的，里面则多是方便活动的套头衫或者帽衫。一般市民的打扮也颇为朴素，虽然商店里有许多颜色艳丽、款式多样的衣服，却并非都会穿到本地人的身上。相比之下，学生——尤其是商科学生——是少数衣着光鲜亮丽的群体。

在考文垂市中心的购物区，很少有卖一手电视、电脑、相机、手机或其他数码产品的商店，但如果是二手电子产品，就有四五家，而且种类比较齐全。电子产品以外，二手衣物、二手家具等等也在市中心有店铺。这

样看来，购物并不一定是购买崭新的东西，而是以“实用主义”作为主要的考量。

由此重新观察考文垂的城市布局，这种“工人阶级气息”也是相当明显的。市中心的写字楼屈指可数，白领很难以一个阶级或者阶层的面貌出现，稍微透露出“白领感”的，除了几大银行、BBC 一间小小的分站和本地新闻机构 Coventry Telegraph 以外，只剩下房产中介，并且很少见到加班。而招聘网站和职业中介的橱窗也可以和这种城市布局互相印证：各式的操作工和技工是绝对的多数，文员之类的岗位则难觅踪迹。

### 3

在英国的旅游广告所塑造的刻板印象里，红色双层巴士和米字旗是英国街头随处可见的标志物。用这些街景来代表伦敦是恰当的，但考文垂的街头，是另一番景象。

考文垂的公共交通系统非常简单，没有地铁，没有电车，有的只是巴士。主要的巴士公司有三家，车辆以双层巴士为主，也有一些单层的，但都不是红色涂装，且都只有一扇供上下车的车门。车票的种类不少，在总站可以买相对更便宜的周票、月票或者年票，配合照片本人多次使用，也可以在车上买单程票、日票或者团体票，投币不找零。

当然也可以刷卡，并且每天搭乘公共交通的刷卡金额有上限，但相比周票、月票或年票的优惠还是小一些。比较特殊的是刷银行卡——英国发行的银行卡大多支持非接触式支付（Contactless Payment），30 英镑以下不需要插入读卡器、输入密码或者签名，将卡片放在感应区上方即可完成扣款。不过，这样高效的银行卡并不是走进银行立等可取的，需要三四天甚至更久的时间。先是网上填写信息、预约见面时间。到了银行，职员

也只是核对信息（身份和地址），如果一切正确，也只能拿回一份包含账户号码和条款说明的协议副本。至于那张实体卡，则是通过邮局寄出——更准确的说，银行卡、银行卡密码、网上银行密码、电话银行密码分成四封信寄出。

巴士总体是准时且可靠的，但遇上高峰时还是有些捉襟见肘。考文垂的马路不宽，小路的两侧一般可以停车，路中央也不画线，所谓的大路一般也不过是双向两车道，只有极少数是双向四车道甚至六车道的。英国的交通法规强调路权，过马路的行人优先于车辆，大路行驶优先于小路转入大路，转盘（roundabout）里的车辆优先于转盘外的……这些加在一起，高峰时的走走停停也就不足为奇了。也因此，骑自行车成了通勤的另一选项；而自行车骑士也是荧光服大军中的重要成员。

至于另一个标志米字旗，在考文垂几乎消失了。市中心只有三处能见到，分别是市议会外、市中心警署和宜家门口。除此以外，米字旗就仅仅出现在少数模仿欧盟样式的车牌上，和牛奶桶、鸡蛋盒上标明产地的贴纸上。而这也几乎可以看作地方政治的某种象征。考文垂的政治并不是大鸣大放的，而是有些内缩的。即便是人流较多的市中心，除了一两个街头表演的常客以外，至多是宣扬教义、传播福音，不曾见到过表达政治立场的展板、摊位或演说。国家机器也不主动展示或者炫耀他们的力量，街头的执法者，大概只有停车管理员。警车虽不罕见，但几乎都是闪烁着警灯呼啸到某一个特定的地方。夜幕降临以后，倒是能见到巡逻的警车。

这种相对内缩的政治也有爆发的时候。十月初的一个周六午后，当我在 Earlsdon（我的住处在这个区域）中心闲逛，竟然遇见统一穿着“人民投票”（People's Vote）T恤的团体在派发传单，呼吁人们在后一个周四的晚上到市中心的一所教堂里参加集会，并于10月20日的下午加入在伦敦进行的游行。对我而言，直到那一刻，英国的政治——尤其是脱欧

进程——才不再游离。

每个参加“人民投票”的人都有自己的理由。有些人在2016年的公投中就选择留在欧盟，有些人认为52%对48%的结果对任何一方都不具有绝对的说服力，有些人基于最近两年的切身感受改变了看法，有些人对保守党的政策失去了信心，有些人对议会的小圈子政治（即Westminster Bubble）感到不满，有人担忧脱欧以后爱尔兰岛上将重演70年代的血腥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说，2016年的公投是在两种承诺（promise）当中做选择，而“人民投票”则是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承诺无法得到兑现时的“反向运动”，恰好，“回到人民”又是英国人对于政治的感觉结构——不仅仅是民主一词的本意，同时也包含了某种社会历史经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到了10月20日下午，从海德公园到议会一共3公里的路程，竟塞下了近70万人的游行队伍，欧盟旗数不胜数。所谓“社会运动的美学”（aesthetics of social movement）也在彼时得以展现：在废旧硬纸板做成的标牌上，标语或简洁（EU Unity）或辛辣（Brexit）或幽默（who needs Airbus when you've got Spitfire），也有一些漫画，等候出发时有表演杂耍的，乐队则在缓慢移动的队伍中穿梭。

#### 4

考文垂的租房市场非常活跃：走在住宅区，时不时可以见到屋外立着或挂着的待租的牌子或房产中介的名字；而住宅区中心的商业街上，也一定有好几家房产中介。租住在这些房子里的主要是城里两所大学的学生，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少房子是专门为学生租客准备的。房屋外墙或者广告上醒目的“Student Accommodation”便说明了一切。

其中最为夺目的，是名为 Study Inn 的学生住宿供给方。除了考文垂，他们也为剑桥、诺丁汉、谢菲尔德和布里斯托的学生提供住宿。在考文垂的六处 Study Inn，无一例外坐落在市中心，七八层高的大楼创造（或破坏）了考文垂的天际线。底层公共区域的墙壁和沙发颜色明亮，健身设施和台球桌整洁，不管有没有人使用，都可以透过临街的巨大的玻璃窗进行展示（或者更准确地说，炫耀）：有人时，是入住学生的年轻、朝气、阳光、活力，无人时，是管理的有序和服务的精致。这种被观看、被赞赏的渴望也同样出现居住区域的布局以及网站上的照片展示中：推进门便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活区域，厨卫独享，生活独立，照片里偶尔出现的学生，或者喜气洋洋地端坐在空荡荡的书桌前读着厚厚的书，或者围坐在一起似乎讨论着什么。其他“服务”还包括免付账单、前台值守、定时清洁、入户回收垃圾等等，至于冰箱空间的争夺、食物的失踪、餐具的“借用”、分摊账单的争执等等烦恼，轻轻松松一笔勾销。简言之，Study Inn 是以酒店式公寓的方式运营学生住宿。对于人生地不熟的国际学生来说，这无疑是舒适的。可这种舒适是以什么为成本的呢？生活中真实发生、必须要面对的烦扰，被抹除的代价是什么呢？更进一步说，这和观光客又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考虑英国的学制以及留学生的整体状况，就不难理解。相比于本科和博士，英国硕士阶段的教育“性价比”最高，一般只要一年就可以拿到学位。一方面，硕士阶段的学习可以拓展本科时产生的对某些领域的兴趣，这些兴趣或许是由本科的课程学习中激发产生，或者因课程而埋没。另一方面，硕士学位在就业市场中可以换得一个较高的起点，又不需要像博士那样深入钻研，因而一年时间的“投资”是相当划算的，对于留学生而言更是如此。也因为硕士学制短，一部分留学生在开始学习之前就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而没有充分的时

间——或者他们不觉得需要花时间——基于英国的在地状况和更为复杂的比较视野重新分析判断这些规划，英国的求学，不过是客居、是跳板。就此而言，相比于“客居”期间的磨合，“舒适”或许更加重要；诸如预付一整年住宿费之类的条件，也并非不可承受。

但也并不是所有留学生都把求学看作跳板，就像并不是所有人都住在 Study Inn 一样；如果选择进入本地的租房市场，便是另一番景象。最明显的，便是和本地人一样入住真正的二层或三层的房子，而非酒店式的公寓大楼。这类房子里或许会有一些设施的改造，虽然仍可以终日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但因为厨房、客厅和邮箱大多共用，与其他住户完全隔绝隐身几乎没有可能。也因此，或多或少接触到本地生活的细枝末节：垃圾分类与回收、照料花园、账单、餐食和商品的配送、派对……

只是在房租议价上，住户们处在劣势中，并且这种劣势不限于学生住户群体。一年制硕士对于房东而言，无疑是优质客户——总会有不知道行情、无法做周期性比价的留学生。房租的增加因此无可避免，当然也会影响到非学生群体的租住需求。住户们的搬入搬出，或许是这座城的常态；11月已经有不少人开始为明年9月开始的租房合同而忙碌了。

## 5

基于前面这些观察再来认识考文垂，不难发现大学其实是这种城市的发动机：一座，是镶嵌在考文垂市中心的考文垂大学，另一座，是坐落在城市西南角、校舍相对独立的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两所大学所倡导的国际化，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

正是这颗发动机内不断燃烧的燃料。

但对于留学生来说，要跟上英国的大学节奏并不那么顺畅。这种不顺畅并不完全是个人积累的差异，也有一些系统性因素。以我所旁听的数字媒体（Digital Media）方向硕士课程为例（这里插一句，这门课程一共大约50人选课，约90%是中国学生），十周的课程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两个小时的集体讲授（Lecture）、一小时的小组讨论（Seminar）和相关的实验课（Lab）。课程有一个专门的网页，授课老师在学期初就已经上传了所有的文献，平均下来每周两篇，每篇20页左右。如果只看数量，这个阅读量是必要的，属于适中（偏轻）的，但如果综合课程所覆盖的范围而言，阅读的要求并不低。从福柯开始，后结构主义、网络协议、平台化、文化研究、情感研究、监管/监控等领域都要涉及。集体讲授只做综合性的导览，主要阐释这些文献之间、文献和课程设计之间的关联，并粗略介绍这些文献或理论与现实状况之间的联系，更像是一篇文献综述，对于文本本身则不做过多的分析或逻辑推演。小组讨论时要求学生导读、提问、答疑。概而言之，授课老师主要负责启发学生钻研。而问题也在于此：从不同地域相关研究的整体进展到具体的学术流派，再到教学方法，这些差异都不是短期内所能调适的。

对学生主导性的强调更加明显地体现在对博士生的要求上。博士生刚入校时只被承认硕士学位（如MPhil），如果第一年结束的升级考试（Upgrade）通过，才正式获得博士生（PhD）身份。除了升级考试和最终的论文口试答辩（Viva）以外，不再有更多硬性要求（包括但不限于论文发表、会议宣读论文）。整个博士生期间的安排都默认由学生主动提出，导师根据学生的要求配合；换言之，导师始终处在从属的、被动的地位。而且这种师生关系是默认的，如果留学生没有

受到专人点拨，很可能要花不少时间才能顿悟。

学校的运作、学生的自我组织，虽然与中国的方式有较大差别，但多少都在预期之内。比较出乎意料的一点，是大学对于 Wellbeing 的重视。按字面，这个词是“幸福”“福利”的意思，但从学校各个部门的实际运作来看，似乎又包含了学生的身心健康以及是否被良好对待。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微妙的感觉。开学前欢迎周的每天中午，“幸福小组”（Wellbeing Team）在户外搭出大棚，只要有学生路过就招呼他们到棚下喝个茶喝个咖啡，还可以帮忙按按手指放松肌肉。在礼拜堂，除了茶和咖啡之外，还有面包和小点心。等到开学以后，每周三的下午有一个小时专门针对研究生的“幸福时间”（Wellbeing Hour），每周四的上午则是针对博士生的。除此之外，每个科系都有专门负责 Wellbeing 的教职工。一句话，就好像如果学生受了什么委屈，就等于学校犯了十分重大的过错。或许，这是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中的一部分？

生活还在继续，考文垂的故事也在继续。更新的故事、更新的观察，留给以后再写。

Earlsdon

注释：从写完初稿到确认刊登之间的三个月间，无论是英国整体的政治环境、城市生活的细节还是我的个人经验都发生了不少变化，比如从巴士总站开往华威大学方向的11和12X两条线路的用车已经基本更换为黑色车体的新款，但这些方面在定稿中均不做调整，为的是尽可能保证写作当时的原汁原味。同时，这篇文章更加侧重于个人化的随记（尽管它确实有引发更多人思考的意图和可能）、是一个被讲述的故事，因而优先考量写作/阅读的相对顺畅，没有采用更加“多媒体”的呈现方式。



# 反戈一击

一个来自“亚际”的故事

罗小茗\*

197

《反戈一击：亚际文化研究读本》序

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跟着起来便该不同了，倘非天纵之圣，积习当然也不能顿然荡除，但总得便有新气象。

鲁迅：《坟·写在〈坟〉后面》

\* 罗小茗，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

## 一、活生生的“亚际”

最初听闻“亚际”（Inter-Asia），是在华东师范大学文科大楼的一间小会议室里。那个时候，21世纪刚刚开始，“911”还没有发生，大学还不知道自己会搬迁到郊区，中文系的学生们，仍徜徉在鲁迅振臂一呼过的礼堂和《子夜》描述过的丽娃河之间，固守着自己的“鄙视链”；计量与考核的制度，还没有来得及在大学里招募大批的信徒，大学和每一个人都必须国际化的意识，也没有那么炽烈。就在这种散漫、自由也因此不知道应该做点什么才好的气氛中，一位叫做陈光兴的台湾教授，突然出现在那间小小的、堆满书柜，因此显得杂乱而拥挤的会议室里。那是一个略显阴沉的下午。因为不是教室，也就没有什么黑板，唯一有的是一块临时搞来的小白板。这位教授，以他特有的手舞足蹈，画出勉强能看明白的台北、首尔、上海、北京、香港、东京、加尔各答……，然后告诉我们说，这些地方应该串联起来，成为“亚际”。地图成型的那一刻，外面已是黄昏时分，却突然有了太阳。于是，一抹淡淡的阳光打在“地图”上。想来那一天，他一定讲了更多的什么是“亚际”，为什么要“以亚洲为方法”之类的事吧。然而，对我来说，记忆里最鲜明的，不是那些道理，而是这样的一个场景：阳光打在一张奇怪的“地图”上，“地图”旁站着一位精力旺盛、踌躇满志的“怪叔叔”。

这便是我和“亚际”最初的遭遇。或许这样一个具体而形象的开始预示着，此后十多年，在中国大陆文化研究以及对此感到兴味的年轻人的生长过程中，“亚际”将以这一特别的方式在场。因为自那之后，陆续便有来自新竹、香港、冲绳、首尔、东京和加尔各答的朋友，讲他们

的思考和那个他们眼中正在起变化的世界；有专为年轻学生举办的各类暑期班和联合课程，拉着大家在亚洲的地界上跑东跑西，“在地”一把；又有定期的刊物、会议和工作坊，把人拢到一起，碰撞、“吵架”，喝酒、“和解”。以此面目出现的“亚际”，既非绕口的字句、抽象的概念，也非课堂里的正襟危坐、暗暗较劲，而是充满了情感的个体、场景、事件、论争，以及由此而来的相互“看见”与彼此“惦记”。

于是，对我来说，“亚际”是白元淡老师宽厚的肩膀，哭泣时最好的依靠；是梅根（墨美姬）永远的兴致勃勃，是 Grace 的高效干练、以一当十；是 Ashish 令人眩晕的印度英语，是慢悠悠的陈清侨茂密的大胡子，也是专心致志的池上胡乱扣起的衣扣。“亚际”是07年的圣勋说“小茗，明天的发言，我好紧张”，是15年的圣勋，在商量“热风学术”的工作会议前，自告奋勇弹唱的那一首歌。“亚际”是新竹的小酒摊，是花枝丸和空酒瓶，是光兴老师对老板大声说，“她，上海来的”，老板则回答，“我的女儿在上海工作噢！”。“亚际”是一群马来人、香港人、台湾人和大陆人开会，现场忽然用粤语热烈争论起来，听不懂粤语的我，感到的满满的错愕与惊讶。“亚际”是最初亚洲其他城市让人咋舌的物价，大陆学生的囊中羞涩，也是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抱怨上海的物价，觉得“来不起上海”。“亚际”是亚洲各地的文化研究者跑来向中国大陆的同行“讨债”，提出我们无法回答的问题，“嫌弃”我们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检讨工作，大大落后；也是我们对于那些“想当然”的批评予以反击，在焦虑和反思的夹击中，还之以一个我们理解的“中国”。

几乎同一时段，中国大学开始了“争创一流”的国际化征程。回顾起来，彼时懵懵懂懂，只想“更好玩一点”的我们，正是被这些里里外外的力量推动着，忙碌起来，却并不十分清楚，自己正在加入和经历的，实际

上是活生生的“亚际”与由官方校准的“国际化”之间那一场漫长的较量。

## 二、“看见”之后

过分美化这个磕磕绊绊地“相互看见”，终于“彼此惦记”的过程，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毕竟，亚洲各地的经济、历史、文化政治状况与连带关系，与人心一样，凹凸不平，起起伏伏。至今记得，2006年的冬天，博士论文写到一半，正是艰难的时候，却被王晓明老师派去首尔开会。那时，恰逢第二年亚际文化研究年会在上海大学召开，“亚际”的老师们别出心裁，在大会之前设置了为期一天的“青年场”（pre-conference），让我们自己玩。具体的做法，是研究生们组成委员会，共同决定“青年场”稿件的取舍，组织这一日的学术活动。于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天南地北，新竹的Emma（纯瑀），香港的小岛，东京的小泉，上海的小茗，以及本应是东道主，却因在日本掉了护照只能临时找朋友代为出席的韩国同学，大家挤在光州的一间小旅馆里，像模像样地“工作”起来。在决定一组中国大陆的投稿时，有人提出拒收，理由是这样的城市空间议题已经过时了。而我只能用蹩脚的英语据理力争，强调城市化和空间生产的问题，对中国大陆来说正当其时。就这样，彼此争执了好一会儿，方才决定录取。那个panel的内容，没多久便忘记了。念念不忘的，是这个争执的场景和当时心里的复杂感受。

彼时的世界图景，还不是2008年之后的模样。对中国大陆而言，无论是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仍是有待接轨的一部分。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也刚刚开始。尽管“亚际”的野心，是要通过亚洲各地区之间彼此“看见”，以及由此而来的相互参照和自我理解，打破“先进”与“落后”的

桎梏，打掉由欧美学界遥控垄断的判断标准，但要实现这一点，却远没有那么容易。这是因为，理念与行动之间的转换，仍有待时日，参与者自身要破除惯性，理解对方的“想当然”，便有很长一段路有待摸索。更多的时候，即便是自认为揣满了友爱和善意，彼此真正“看见”的瞬间，却也可能是忽然降临的疏离、轻慢、自满、大惊小怪，乃至过分自尊。

对我来说，光州小旅馆里的争论，正是这样一个忽然“看见”的瞬间。自晚清以来，中国人勉力趋新，在骨子里认为“新的总是更好的”，且以这样的心思去打量世界，判断高下，既有害怕落后于世界潮流的卑微，又由此生出对更“落后”者的轻视与冷淡。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不例外。也许，只有在“亚际”的框架内，这样彼此“看见”过，才会意识到，去正视这一类新/旧的说辞以及潜藏其后的卑微与轻视，替之以相对中正的态度——既非理所当然，也非刻意反其道而行之，对大家来说，都是这么的不容易。并且，这样的遭遇，也不会立即诞生一种所谓的“正确”态度。更多的，倒是一份情感上的警惕。比如，等到之后看到越南来的投稿，发现自己的第一反应居然也是“这样的研究有点过时吧”，此时生出的，就是对自己的不满意和对这个反应的大大的怀疑了。

在我的理解中，这就是“亚际”创造的彼此看见与相互参照。它从不担保友谊与美好，离很多人担心/憧憬的“大同”，更是遥远得很。许多时候，“亚际”是在这个纷乱下坠的世界中，把青年人之间展开思想交流的现实基础，努力夯实，以便每一代的后来者，在除却幻象之后，果断地去承担自己的那一部分历史责任。这一夯实的过程，既不“高大上”，也无从保证结局的圆满。然而，通过彼此看见而意识到的自身位置与身心结构，对此展开反思和厘清，却是“亚际”夯实与站稳的第一步。

如果说，一开始，身处其中的年轻人难免将信将疑，在这些不够圆满的过程中徜徉或抱怨的话，那么，慢慢地，便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身体感觉、个人情感和思考意识，已不知不觉卷入其中，被这一过程重新编码。

比如，就在前几天，一位认识了很久的台湾朋友告诉我，2007年她们因亚际的“青年场”来大陆时，最大的感受是，“原来大陆人长这个样子。”在今天听来，这个遭遇的起点，还真是有点“low”，一点都不学术。这或许是因为，那个时候世界还不是平的，彼此间仍有缝隙，让人继续怀揣对他人的奇异想象。然而，也就是这几位前一年还在讶异“大陆人面目”的台湾同学，在上海参加过暑期班后，隔年便在台北“自食其力”，把大家组织去一个废弃的游乐园参加夏令营，邀请年轻的研究者和研究生们参加。他们自己写提案，自己找钱，自己安排议程，也自己跑“外事”。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开始发现，要让“彼此看见”得以发生，原来要经过那么多科层化的手续与人事，这背后是满满的曲折的“政治”。即便是拿到了所有的公文，也还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状况。本来，受邀前去的大陆同学不少。可在申请手续的道道关卡和“什么样的学习更有价值”的自我审查之下，如约前去的人越来越少。等到最后，只剩下了三位。更没想到的是，最先要入台的那位同学，在香港机场转机时被告知，必须等到通关文件上所有人员到齐，方能过关。于是，他只能在机场板凳上过了一夜，静候其余两位的到来。当时，这位同学，年纪轻轻，却意外地留着一大把络腮胡子。等我第二天在候机大厅找到他的时候，第一眼的反应是，“这些胡子不会是一夜之间愁出来的吧？”

多年之后，我们会时不时地怀念这场游乐园里的夏令营，感叹当时彼此之间的“无知”“相敬如宾”和“大惊小怪”。也是因为这样的经历，我们很难再把“亚际”视为安排好的理所当然。显然，在与官方校准过的“国

际化”的这场较量之中，除了老师们的鼓励、年轻人对“别样之地”“他乡之人”的好奇与热情之外，“亚际”没有其他保驾护航的法器。政策、行政、官僚、人事、财务，总是有各种理由跳出来捣乱添堵，而我们自身的自以为是、理论崇拜、知识（特别是书本知识以外的其他类型的知识）匮乏、“优等生”心理，以及抗压能力不足，也常常会对它发起突袭。然而，这些不足，又恰恰是亚际继续充满活力的缘由。在磕磕绊绊、远远不那么美好的遭遇中，给了青年人无处不在的机缘，去锻炼一种更加稳定和健康的精神状态。

### 三、“旧垒”与“新气象”

在某种意义上说，陆续出版中的“亚际文化研究读本”，既是这个活生生的“亚际”的一部分，也是为这一类“遭遇”更鲜活持续地发生而准备的知识上的条件。

自2008年以来，两年一届的暑期班（summer school），由参加亚际机构联合体的大学轮流主办，已经进行了六期。在此过程中，发现的一大问题是，亚洲各地的学生，往往“自带”西方学界的理论资源、话语方式和对本地经验的兴趣。在此之外，对其他社会中既有的思想文化脉络，以及正在发生的研究状况，则普遍缺少了解和学习的途径。这一状况，显然受制于当前全球范围内的知识图景和可能的交流语言。不同语言和版本的亚际文化研究读本，则是针对这一状况，为建立一个亚洲不同社会之间可以分享与“对视”的知识谱系，做最初步的工作。

2015年，受亚际文化研究机构联合体的委托，由特贾斯维莉·尼南贾娜教授和王晓明老师主编的《Genealogies of the Asian Present:

Situating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作为亚际文化研究读本的英文版出版了。《反戈一击：亚际文化研究读本》同样是这一委托的产物。不过，中文版的读本，并非英文版的照搬翻译，而是根据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需要，重新挑选和组织的结果。在这里，也就有必要说明一下，什么是编者研判的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需要。

首先，对中国大陆的思想界和新兴的文化研究领域而言，“亚洲”，乃至在此基础上推进进一步的“亚际”，并非一个深入人心的概念。整体而言，在世界格局正迅速发生变化的时间节点上，比照框架的改变，知识谱系的调整乃至“国际视野”的重新调校，正变得越来越举足轻重。近年来，随着孙歌、陈光兴等老师的推介，竹内好、沟口雄三、新崎盛暉、陈映真、白乐晴、查特基等思想者，正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阅读。然而，随着中国崛起，这些改变的发生，是将更加自觉从容，还是越发局促困难，这一点却远不是那么清晰的。如何思考何谓“亚洲”，不仅急需了解在被动现代化的过程中，早期思想者对于文明和国家的态度，也需洞悉进入21世纪以来，亚洲各地正在遭遇的变化。不仅需要从受侮辱和受损害的角度去理解“国际”，也需要从那些似乎富强起来或富强过了的国家与地区的现状，去把握中国当前的位置。或许只有如此，方能回答在中国最贫弱的时候，孙中山提出的问题——“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因此，在中文版的“亚际读本”中，第一辑和第二辑的内容，便明确围绕这一需求展开。

其二，在此过程中，什么是文化的作用？或者说，在社会文化的巨变过程中，文化是如何积极/消极地参与和推动这一重构的？对于文化研究来说，这无疑是最核心的问题，却很难说在中国大陆得到了持续的关注。这或许与文化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被引进、推介和就此展开批判的现实脉络相关。从早期的符号学操作，到对政治经济学的强调，

再到对于社会学人类学方法的青睐 / “嫌弃”，作为一个不断检讨，因而极有动力趋新的研究领域而言，文化研究总是希望找到更合适的理论工具和思想方法，去思考和介入当代思想文化的生产。然而，这一心急火燎的过程，也往往使得“文化”如何在社会巨变中发挥作用，这一问题失去准心。更多的时候，“文化”看起来像是在思考开始之前就已经被设定完毕的武器，以便研究者拿来跃入现实的阵仗，挥舞一番。于是，在这场看起来很热闹，而且恐怕会越来越热闹的战事之中，作为武器的“文化”，到底如何在这个社会里生成和成立？为什么偏偏是武器而不是桎梏？它被审视、珍惜或摒弃的缘由是什么？它究竟如何在这个过程中篡改或创造？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追问，常常阙如。第三辑“文化的力量”，便提供了“亚际”范围内，这一部分的相关思考。而其他各辑中，也不乏可以从这一角度获得借鉴的文章。比如，南迪的《确信的曙光》、莎拉·雷蒙的《在全球经济的子宫里》、阿西什·拉加德夏沙的《何时宝莱坞？文本分歧与历史分歧》等。

其三，如何摆脱过于厚此薄彼的“文本”选择？对中国大陆文化研究而言，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开始的这一研究思路，存在着一个先天的不平衡。那就是，过于重视狭义的符号化的文本——文学、影视作品、广告等等，而对于实际的城市空间、社会事件、市场机制、认同模式等广义的社会文本，既缺乏兴趣，也缺乏观察、分析和把握的能力。这种先天的不平衡，既导致由对符号学的批评而来的“政治经济学”调整，常常变成了相对简单粗暴的阶级划分，文化在这一划分中被取消了位置；也使得原本应该是看家本领的符号分析，失去了广义的社会文本的支持，难以维系其应有的政治维度，退化成了学院式的技术操演。当前，随着越来越多不同学科背景的青年学人的加入，这一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然而，如何更好地协调不同的文本类型，使之相互支撑，形成更为整体性和有生产性的思考，这一问题仍然十分紧迫。针对这一状况，读本既编选了一组将城市作为一种媒介/文本展开讨论的文章，也提供了对诸如“世界杯的女性化”（《2002 世界杯足球赛的“女性化”和女性“粉丝”》）、日本临工运动（《让我们活！日本临工运动的培力和生活修辞》）等等广义的社会文本展开考察与研究的范例。

其四，与第三类问题相伴随的一个表现，是中国大陆文化研究对于制度、政策的忽视。尽管在研究“过去”时，把制度、政策、法律法规等文件纳入视野，已经蔚然成风，但在研究“现在”时，这样的习惯，还远没有形成。其中的缘由，大概是两个。一个是，中国社会的现实，虽无一不是受制于这些官方文件，被其指导或规整，但“名实不副”的广泛存在，往往让生活于其中的研究者，对之产生轻慢之心。另一个是，事关制度政策的文献，大多枯燥，越是当代，越是官气十足，阅读和视听起来，自然没有小说、电影那样令人愉悦，容易产生兴味。而在这之后，实际上是所谓的“兴味”和文化研究所欲正视和勾勒的“现实”之间，究竟应该是何种关系的问题。至此，当我们鼓励学生，要按照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兴趣，去发现和思考现实的时候，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恐怕是，当依据兴味的探索，终于挖到了制度和政策的高墙之下的时候，下一步的突围，应该如何进行？对此，中国大陆版的“亚际读本”选择了一些侧重于制度、机构和法律条文的研究，以供参考。比如，项飏对跨国之间劳动力流动机制的讨论（《劳工移植：东亚的跨国劳动力流动和“点对点”式的全球化》）、何春蕤对台湾的立法和媒体何以生成娇贵化主体的回顾与批判（《公民情感的娇贵化与新兴民主的治理》），以及王晓明对文化研究在中国大陆高校体制内遭遇的建制问题的思考（《文化

研究的三道难题》)等。

其五，如何展开对于文化的流动性的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流动，无疑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无论是早先的“哈日”“哈韩”、如今印度电影在中国院线的傲人战绩，还是中国游戏业对亚洲其他地区的渗透，不同社会之间的文化流动以及由此形成的资本与文化之间相互牵制、彼此支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使得当代的文化，特别是流行文化的生产和消费，不再是一国之内的事业，而势必隶属于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基于既有的体制磨合而成的一套文化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庞大的国际机制。一方面，正是这一机制，使得“丧”和“小确幸”这样的命名，通畅地流动在亚洲文化圈内，引发新一轮的商机；另一方面，这些命名也经由这一机制，在流通过程中被持续地填充、改写和进一步传递扩散，引导不同社会状况里的年轻人对于自己的状况，做出判断和思考，遥相呼应。至此，如何把握在此过程中，文化的流动性赋予年轻人的力量、视野和新的可能？对于这一点，“亚际”的“彼此看见”提供了什么样的新的解释框架？显然，这一部分的工作刚刚开始。目前看来，也是文化研究所能提供的整体性理解中，最落后于现实的部分。就此而言，《K-pop的亚洲化：在泰国青年中的生产，消费与认同模式》、《印度二线市场中的香港动作电影》等文章，做了别具意义的尝试。

最后，是中国大陆文化研究对于表达形式的“不假思索”。在越来越多的青年学人的手中，一板一眼、注释规范的学术论文，似乎正在成为文化研究最自然的表达形式。然而，不得不指出，这一变化，既是学术体制变革的一个结果，也是文化研究需要定睛思考的越来越铁板一块的现实的组成部分。这一变化的利弊是非，此处无法展开详细的讨论。而读本中的几篇选文，比如，《学作工：研究所的论文指导与学术工作》

等，则提示了，文化研究理应对表达形式做更为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希望这一类模样特别的选文的存在，可以为今后更多的文化研究式的表达，埋下一点伏笔。

眼前的这一中国大陆版本的“亚际文化研究读本”，便是根据以上六类需要，选编而成。整个读本分九大专辑，每一辑旨在提出一个值得文化研究特别关注的核心议题。这些专辑，有些和上述“需要”彼此重叠，有些则同时肩负回应几种不同“需要”的职责。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这个读本中，性别研究并未成就一个专门的议题，而是被分散到了不同的问题之下。这并不意味着，性别议题不重要，而是说明，按照专辑来读，实际上只是对读本的一种使用方法。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使用者在此之外，通过自己的问题——既可以是对文化研究的理解，也可以是对自身学习的设定，将读本内的选文，重新排列组合，使它们在被阅读和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呈现出新的结盟方式。

#### 四、历史的“一页”

如今，那些经由“亚际”而认识的朋友们，彼此聊天时，一个经常出现的话题便是，对于成长于斯的“亚际”，我们这一辈人究竟可以做什么？在此背后，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尽管各地的状况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经由上一辈人的努力，文化研究在亚洲经历了将近20年的引介、推动与建制的兴盛。在此之后，特别是当社会形势普遍右转、各种体制内外的可能性一再紧缩之时，各地的文化研究可能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如何彼此合作与遥相呼应？

2018年8月，由ACS和上海大学合作举办的第12届世界文化研究双年会 Crossroads 将在上海召开。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是，从大会收取稿件和招募志愿者的状况来看，文化研究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和扩散程度，大大超出了主办者的预期，越来越多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和青年学生正汇聚于此。然而，与此同时，同样可以鲜明感觉到的，是近十年来，在国家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和热衷于智库建设的大潮之下，研究“文化”正在成为一桩热门生意。如果说，文化研究在大陆初兴之时，彼时的政府正疏于对文化议题的兴趣和理解，一门心思搞经济的话，那么现在，政府越过资本，直接干预和争夺对于文化的定义，已成定势。

于是，一方面，跨学科的研究被积极倡导，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日益吃香，另一方面，却是理论和研究思路越发趋同，学术科层化越来越严重。在这样一个学术环境再次急速变动的时代里，保持一种批判的思想特质，赋予其有效的传递和扩散形式，正变得越来越艰难。在这一新形势下，“亚际”的联合，对于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意义，便不仅指向一种另类的“国际化”，意在锻造不同寻常的国际视野，同时也指向一种依靠不同社会间的对视和联动，持续制造一种无从驯服的气质的组织方式。在这一意义上说，如何保持“亚际”既有的知识生产和组织方式，乃至创造出更新的积极形式，也就成为后一代人的任务。

大概两三年前，尽管大多数选文还未确定，我便早早定下了亚际文化研究读本的书名——“反戈一击”。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在进化的链条上，所有人都不过是中间物。而文化研究者，大概算得上是这个变动的时代制造出来的半新半旧、无所适从的中间物中一类特殊的物种。然而，真正的致命一击，却也只能在这半新半旧之中酝酿和发生。就此而言，在

读本内外、“亚际”周遭，所发生的一切阅读、思考、研究乃至组织工作，既是半新半旧者们书写的历史，也是为反戈一击做着绵延的身体、情感、思想和心力上的准备。

显然，较量远没有完结。“亚际”的这一页，还有待我们定神书写。

2018年5月

# 读本目录



## ● 何谓“文明”

1. 甘地：印度自治（节选）
2. 章太炎：俱分进化论
3. 幸德秋水：论爱国心（节选）

## ● 何谓“亚洲”

1. 陈光兴：亚洲作为方法（节选）
2. 孙歌：东亚视角的认识论意义

## ● “文化”的力量

1. 特贾斯维莉·尼南贾娜：文化为何重要：对女性主义政治语言的反思
2. 墨美姬：地方狭隘主义的未来：全球化、《古惑仔之四》以及屯门的电影研究
3. 江莉莉：从文化产业到创意产业及回归？廓清理论与政策再思考

## ● 民族主义与现代性

1. 阿希斯·南迪：确信的曙光：世俗主义、印度教民族主义以及其他去文化的面具
2. 米山丽莎：围困下的解放：美国的军事占领与日本的妇女解放

## ● 主体性的生成

1. 金贤美：2002 世界杯足球赛的“女性化”和女性“粉丝”
2. 何春蕤：公民情感的娇贵化与新兴民主的治理
3. 莎拉·雷蒙：在全球经济的子宫里：《孩子》和跨国想象的建构
4. 卡尔·卡塞格：让我们活！日本临工运动的培力和生活修辞

## ● 流动中的文化生产与消费

1. 阿西什·拉加德夏沙：何时宝莱坞？文本分歧与历史分歧
2. 乌汶叻·希里玉瓦萨、申炫准：K-pop 的亚洲化：在泰国青年中的生产、消费与认同模式
3. 金素荣：亚际比较框架：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后殖民电影中的历史学
4. S.V. 斯瑞尼瓦斯：印度二线市场中的香港动作电影

## ● 媒介 / 城市

1. 梅拉尼·布迪安塔：钱之重要：文化身份认同与现代化
2. 吉见俊哉：遗迹的市场，或者文化城市的破坏
3. 阿比丁·库斯诺：民族主义都市主义何去何从？——苏迪雅梭市长主政下的雅加达的公共生活
4. 邱林川：十年一城：南海互联网发展的公与私

## ● 工与农

1. 项飏：劳工移植：东亚的跨国劳动力流动和“点对点”式的全球化
2. 卢晖临、潘毅、当代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情感与集体行动
3. 陈瑞桦：以农之名：台湾战后农运的历史考察（节选）

## ● 回归教育

1. 王晓明：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
2. 陈清侨、罗婉芬：文化教育中的叙事与表演行为：写作教学作为批判传播
3. 蔡如音：学作工：研究所的论文指导与学术工作

热  
风

# 文化研究 ROUTER

## 又穷又厌世：当代青年的情感政治与贫穷化问题”论坛征稿启事

### 一、征稿说明

你生活时代的关键词是什么？台湾的“小确幸”、“厌世代”；中国大陆的“丧”文化；韩国的“全抛世代”；日本的“宽松世代”等世代关键词指涉了现下青年的生活状态。2011年，“崩世代”一词描述台湾经济贫富差距扩大、政府财政赤字、以及社会福利破产的危机，而以“小确幸”的情感与生活形态回应“只要努力就能成功买房、成家立业”已不再是人生成功的保证。“厌世”与“厌世代”的出现是“小确幸”的另一面，描述着充满不确定性与未知的过劳、穷忙与贫穷的生活处境，也隐含了台湾在国际与两岸政治经济矛盾下“困住了”的处境与寻求自我定位及认同的焦虑。

《文化研究》Router 学刊将于2019年3月8日举办“又穷又厌世：当代青年的情感政治与贫穷化问题”论坛，从情感政治的角度，欲理解近年于台湾流行的“厌世”与“厌世代”一词，以及分析当中的政治想像与青年文化，并参照中国大陆的“丧”文化、韩国、香港等青年状态。同时，本论坛试图进一步分析“厌世”现象所指涉的政治经济问题，以及思考贫穷化的阶级问题与不稳定的生活状态。

与论坛举办同时，我们邀请对本议题有兴趣的各方人士参与本论坛，书写与论坛内容相关的论坛评析、心得感想。我们也欢迎稿件延伸论坛对话，从跨领域观点提出具开创性，与历史或当前议题贴合的实验书写。

## 二、稿件资讯

1. 对象：不限。
2. 稿件：中文书写，字数需在 3000 至 5000 字内，力求清楚的文字表述。
3. 征稿截止日期：2019 年 4 月 10 日周三。
4. 审核公布日期：2019 年 5 月 10 日周五。

## 三、奖项

我们将邀请相关学者专家针对稿件进行评选，择优颁发奖金以资鼓励( 亦可从缺 )，获奖文章未来将会刊登于本刊网站及脸书粉丝页。奖项分为两组：

1. 第一组 3000-5000 字 ( 总奖金 10000 元 )  
首奖一名，每名 5000 元新台币。  
特奖一名，每名 3000 元新台币。  
优选两名，每名 1000 元新台币。
2. 第二组 5000 ~ 10000 字 ( 总奖金 17000 元 )  
首奖一名，每名 8000 元新台币。  
特奖一名，每名 5000 元新台币。  
优选两名，每名 2000 元新台币。

## 四、相关资讯

1. 来稿寄至：[router.tw@gmail.com](mailto:router.tw@gmail.com)
2. 来稿标题请注明：“又穷又厌世论坛投稿 \_ ( 投稿人名 ) ”
3. 以中 / 英文电脑打字，档案格式以 MS Office Word 软体编辑。
4. 请提供电子邮件帐号，以便于联络。
5. 相关网页：<http://routerjcs.nctu.edu.tw/router/submission.asp>
6. 论坛当日未参与者，可透过影片收看论坛内容：[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uLflGvSwBLG1AuDFrj678g?view\\_as=subscriber](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uLflGvSwBLG1AuDFrj678g?view_as=subscriber)

## 《热风学术（网刊）》稿约

**1** 本刊为立足于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和思想议题的文化研究类刊物。这一立足，不仅是指聚焦于中国的当代性，关注中国问题，解析这一快速变动社会中的文化现象，更是指，在“亚际”、“第三世界”、“全球”等这一系列既是历史又是虚构的框架的选择和比照之下，重新放置和结构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和思想议题。

**2** 为保持文化研究的野气和灵气，本刊对来稿有两个“不在意”。一，不在意是否一定写成论文模样，欢迎以生动、恰当的文体形式，呈现“问题意识”和清晰思考的文字。二，不在意是否一定是首发稿，提倡各个友邻刊物和网站之间的资源共享和推广。

**3** 在此共识之上，本刊欢迎各类来稿，来稿请注明是否首发。凡首发稿一经采用，即奉薄酬。其中，“专题”一栏为特约组稿栏目。如有专题的组稿建议和想法，欢迎来信，来信请注明“专题”字样。

**4** 来稿请用 word 文档发送至《热风学术（网刊）》邮箱（[refengxueshu2017@163.com](mailto:refengxueshu2017@163.com)）。本刊会在收到稿件的一周内确认收到投稿；并于收稿后一个月内，回复作者是否用稿。

**5** 来稿一经录用，除在本刊刊登之外，也将在当代文化研究网及其微信公共号陆续发布。同时，本刊拥有授权友邻刊物和网站共享的权利。

**6** 为促进中国大陆文化研究和世界同行的交流，“当代文化研究网”将在当年的《热风学术（网刊）》中选取优秀的文章（每年4篇左右），翻译并上传当代文化研究网的英文网页“文章”栏目，供对相关议题感兴趣的英文研究者和读者阅读。

## 封面故事

```

from sklearn import svm
from sklearn import datasets
dataset = read_csv('iris.csv')
values = dataset.values
result = svm.SVC(C=0.8, kernel='rbf', gamma=20, decision_function_shape='ovr')
result.fit(x_train, y_train.ravel())

```



下载数据；导入数据；取出数据值；分类。小 F 的程序员朋友正在电脑上辛勤耕作。据他说，用“码农”这个词形容大部分程序员都是相当贴切的，这个工作看似是个技术活，实则更像是某种体力活。

小 F 想起从前朋友开玩笑发给她的图片：一个人弯腰站在深坑中，坑边站了四五个指手画脚的人。坑里的那位便是可怜的程序猿，周围指挥的则是项目经理、销售经理、乃至财务、人事。人人都在发出指令，干活的却只有坑里那位。她问朋友，这样岂不是太累？朋友笑笑说，哪有轻松又好赚的工作，码农算不错了，至少没有太多勾心斗角的事，只要技术好，不愁没前途。

然而，如今技术再好的程序员也都内心不安，最近互联网企业正在一波接一波地裁员，市面上对程序员的需求突然间供大于求。浪潮来时，满地都是急于开工的大坑，如今这些坑要么被废弃，要么被填平，想跳都无处下脚。小 F 安慰朋友，工作嘛，找找总是有的，毕竟从前太辛苦，每天熬夜加班，万一被裁了，只当休息一下。朋友苦笑道，公司业务最近下线了不少，有些还在筹备的，也都被砍掉了，估计也快轮到自己了。

和朋友聊完，小 F 想到手机里塞得满满的 APP，电脑上一个接一个的跳转链接，偶尔 APP 升级出问题，电脑页面碰到 404 或其他乱码，总感到一阵心烦：现实生活已经足够添堵，网络里怎么还这么多限制？互联网许诺的自由总是忽隐忽现，时有时无的。现在看到朋友的处境，才突然想起这些问题背后大概都是一个个熬夜改 bug 的人，所谓网络生活的自由，也不过是一个人的工作罢了。

正在想着，无意识的鼠标滑动中便点出一个页面，蓝色的背景里，一个不高兴的反向笑脸出现，“该业务尚未上线”——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朋友公司里，那被砍掉的业务呢？又或许，这仅仅是网络世界的常态，就像现实生活里，不也常常碰壁吗？想到这，小 F 略感无聊地合上了笔记本电脑。

(感谢上海大学计算机系博士生余璇提供代码及相关帮助。)

 热风学术网刊

主 编 \_ 罗小茗

学术编委 \_ 包宏伟 Fran Martin (澳) 雷启立 孟登迎 潘家恩 朴姿映 (韩) 王智明 章戈浩

责任编辑 \_ 王欣然 美术编辑 \_ 刘睿 编辑助理 \_ 李许涛

《热风学术(网刊)》来稿邮箱 refengxueshu2017@163.com

本刊每年 3 月、6 月、9 月、12 月 15 日上线。

版权声明：自由转载 - 非商用 - 非衍生 - 保持署名。



请登陆“当代文化研究”网 - “网刊”栏目，下载《热风学术(网刊)》杂志：

<http://www.cul-studies.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47>



扫描二维码，回顾往期。

```
<html>
<head>
<meta charset="utf-8">
<meta http-equiv="X-UA-Compatible" content="IE=edge">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 initial-scale=1">
<style type="text/css">
  body
  {
    background-color: #0099CC;
    color: #FFFFFF;
    font-family: MicrosoftYahei, "Helvetica Neue", Helvetica, H
    margin-left: 100px;
  }
  .face
  {
    font-size: 100px;
  }
  p
  {
    font-size: 24px;
    padding: 8px;
    line-height: 40px;
  }
  # tips
  {
    font-size: 16px;
  }
  # plot each column
  @media screen and (max-width: 600px)
  {
    body
    {
      margin: 0 10px;
    }
  }
  p
  {
  }
}
</style>
</head>
<body>
  <h1>
  </h1>
  <h2>
  </h2>
  <h3>
  </h3>
  <h4>
  </h4>
  <h5>
  </h5>
  <h6>
  </h6>
  <h7>
  </h7>
  <h8>
  </h8>
  <h9>
  </h9>
  <h10>
  </h10>
  </body>
</html>
```

```
from pandas import read_csv
from matplotlib import pyplot
# load dataset
dataset = read_csv('pollution.csv', header=0, index_col=0)
values = dataset.values
# specify columns to plot
groups = [0, 1, 2, 3, 5, 6, 7]
i = 1
# plot each column
pyplot.figure()
for group in groups:
    pyplot.subplot(len(groups), 1, i)
    pyplot.plot(values[:, group])
    pyplot.title(dataset.columns[group], y=0.5, loc='right')
    i += 1
pyplot.show()
```